

敬愛的毛主席
历史系教材
范达人

「文革」内幕曝光：
「梁效」是毛澤東的御筆
還是江青的班子？

為何批判林彪、
又批周恩來？
到底反鄧小平、
還是反華國鋒？

一段「文革」秘辛，由此鋪陳演繹、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明報

「文革」神筆何況做 ——「梁效」往事

范達人

「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

作 者：范達人

責任編輯：蒙 憲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 次：一九九九年五月初版

ISBN : 962-973-220-3

承 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序

《「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一書，敘事真實確切可信，文筆流暢。我認為可出版，應出版，以示人真實歷史，以正視聽。

周一良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Wt29/07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自序

應邀到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後，我先後遇見不少中外專家、教授。他們都對顯赫一時的「梁效」懷有濃厚的興趣，希望我能寫本書，揭開它神秘的面紗。這使我萌生了將這段經歷，如實地告知天下的念頭。為今人，也為後人，為世界上一切有志於研究中國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人，提供一份原始真實的史料。這份史料，便是自己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三年及其後若干年的親身經歷。

由於種種原因，一拖就是十年，今天終於脫稿，希望這本書對中國這段歷史的探討，有所裨益。

范達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於美國



作者簡介：

范達人，一九三五年二月生，浙江紹興人。在家鄉讀小學和中學。一九五一年參軍後，在三野衛生部學習和工作。一九五五年考入北京大學，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北大歷史系，同年留校任教。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寫作組長。一九七九年後繼續在北大歷史系任教和從事研究，著有《當代比較史學》等書，並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在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之後，在美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的教學與研究。

與總書記談心 (翁杰明等)
中國最新國情大透視 (翁杰明等)
跨世紀中國最新領導人手冊 (華 明)
世紀末大預測——中國最新國情手冊 (張西明等)

中國當代神話錄 (楊魯軍)
中國社會主義新路向 (吳 江)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王 山)
第四隻眼睛看中國 (王 山)
解釋中國——評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劉智峰)
中國可以說不 (宋 強等)
中國還是能說不 (宋 強等)
二零三零中國第一 (張小波)

歲月蒼蒼 (王凌雲)
在秦城坐牢——自己的故事 (戴 晴)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目 錄

序	周一良	I
自序		II
「梁效」落網		1
工字廳會議		5
毛家灣之行		10
「梁效」的架構		19
誰家的班子？		34
轉向大批判		42
奉命撰寫〈孔丘其人〉		48
一段插曲		56
批儒評法		59
幸獲殊榮		73
何以批「小國師大國」？		82
《歷史研究》復刊		84
難得的清閑		89
評《水滸》		98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文」往事

反擊「右傾翻案風」	104
從周總理逝世談起	121
試圖跳出漩渦	128
「按既定方針辦」	132
觸景生情說挨鬥	143
一張難得的大字報	153
從嚴發落	175
鐵窗風光	180
走出大牆	192
為何啓用我？	207
附錄：旅美歲月	222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梁效」落網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晚，京城許多消息靈通人士正在家中或餐館與親朋好友開懷暢飲，歡慶「四人幫」覆亡，而我卻對外界變化懵然無知，仍像往常一樣，從家返回「梁效」駐地。途中，在北大哲學樓附近，我遇到了北大黨委組織組的劉隆亨。他問我：「你還去上班？」我說：「是呀。」他有點不解地又問：「你沒有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答道並反問：「你聽到了什麼？」他便告訴我：「遲群、謝靜宜反黨奪權搞陰謀，被抓起來了。」「哦，抓起來了。」我為之一怔。當時劉隆亨未告訴我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已經被捕。

獲悉遲、謝被捕之後，我並未立即轉身回家，而是依然返回「梁效」所在地北大朗潤園的北招待所。到駐地後看到大部分「梁效」成員已先我而回。因為「梁效」早有規定，星期日晚，大家定要返回大批判組。晚八時許，我把遲、謝被捕之事告訴了我的組員何芳川。當時，大批判組內已有不少人得知這一消息，人們悄悄地、帶着憂慮的神情談論着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遲、謝被捕之事。大家知道出事兒了，氣氛驟變。

當日午夜十二時整，正值夜深人靜之際，軍隊突然包圍了「梁效」駐地北招待所。六、七輛軍用吉普和摩托車駛抵門口。進來了七、八個人，其中有軍人，有北京市委的人，他們將樓內大多數已進入夢鄉的「梁效」成員，召集到一樓會客室內，其中一位幹部聲色俱厲地宣布：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已經將「四人幫」隔離審查；遲群、謝靜宜也被隔離審查；現在中央決定查封「梁效」大批判組。查封者責令我們當即攜帶洗漱用具和幾件換洗衣服離開北招待所，不許帶走任何文件資料。我們就這樣灰溜溜地被押出了「梁效」駐地。事後，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張由多人署名的大字報描述：「人民解放軍把三十九名學士從他們盤據了三年之久的一座別墅大樓裏趕了出來」。我們走出這座灰色大樓時，附近已有許多人在圍觀，有的人還在指指點點地議論着，頗為高興。離開北招待所後往何處去呢？只能回家。可是，我的家遠在北京東部，深更半夜，無法回去，我便摸黑回到了原在北大三十六樓的宿舍，躺了半夜。

次日，查封者將我們三十九人安置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紅二樓（才齋）暫住。這裏原來是學生宿舍，與旅館型的北招待所無法比擬。兩三個人合住一室，頗為擁擠，更難適應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是身邊還有軍工宣隊成員和各系的積極分子晝夜監視。工作組安排我們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時間集中學習，要求我們這些「梁效」成員緊跟黨中央，反戈一擊，將「四人幫」的內幕，將遲群、謝靜宜的一切陰謀活動統統揭發、交代出來。

面對上述突如其來的斷然措施，我並不驚慌，心境尙較平靜，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已受過驚濤駭浪的衝擊，見過世面，加之毛主席逝世後，我曾有某種預感：國內局勢



作者七十年代於北京家中。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會出現變化，甚至反覆。再聯繫到當日晨，我聽到兩報一刊重要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其中有一段話：「歷史的經驗證明，要搞垮我們的黨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感到它是有針對性的。此外，毛主席逝世後，「梁效」的一位頭頭對我們小組同志說：「最近遲群讓我們搞兩個材料，一是馬恩列斯在處於少數、困難形勢下堅持鬥爭的情況，一是毛主席處於少數、困難情況下堅持鬥爭的材料。」因而可以說，對於國內局勢的動盪，已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是，事變來得如此之快，卻是我始料未及的。

「文革」柳華流浮錄
「梁效」往事

工字廳會議

「梁效」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記得，有一天，北大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徐華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華大學工字廳去開一個會。這個會很重要。會議內容，你不要對別人講，回來也不需要向我匯報。」這一番話使我感到奇怪，



這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北京大學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一九六七年第七期人民畫報）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錢」往事

特別是無須向他報告會議情況。因為按照常規，他作為基層黨組織的書記，我作為一名普通黨員，應該把參與的一切活動如實地向他匯報，而且把匯報視為黨性的表現。可是，這次卻如此地反常，足以顯示這個會議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我好奇地做了種種猜測，但均猜不透其中的奧秘，也就不去枉費腦筋。第二天，我到達清華大學工字廳時，會場內已坐着年逾古稀的魏建功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大副校長，在古文字學領域內很有建樹，他的名聲也由於魯迅曾與他有過論戰而遠揚。會場裏還有一位老教授，他就是我的老師周一良。周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不但精通魏晉南北朝史，而且也精通日本史、亞洲史，堪稱第一流的專家學者。六十年代國內各大學歷史系所用的教材《世界通史》便是周一良教授和武漢大學吳於廩教授主編的。哲學系的湯一介先生也在座。他是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著名學者湯用彤之子，家學淵源，中國哲學史造詣深。會議尚未開始，我環視會場，發現徐琳就在不遠處坐着。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師，後來人民大學撤銷，就轉到北京大學從事馬列主義研究。我當時在北大歷史系算青年教師，其實也已三十八歲，近不惑之年，但在中國人眼裏，四十歲以下可稱為青年。與會的北大人當中，最年輕的是龍協濤，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他是北大政工組幹部，二十七、八歲。

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二人，北大、清華各一半。在清華那邊，到會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孫中原、和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等六個人。人到齊後，**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黨委副書記謝靜宜**走了進來。遲、謝我們都認得，因為他們曾到北大介紹過清華大學革命大聯合的經驗。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還記得當時的「六廠二校」。「六廠二校」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文革試點，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華。毛澤東派他的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幹部，抓兩校的試點工作，具體由遲群、謝靜宜二人了解情況，傳達指示，貫徹政策。遲群年約四十歲上下，原為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女，一九三五年生，一九五二年參加革命，一九五三年軍委機要學校畢業，一九五九年任毛主席的機要員。**毛澤東**對她非常信任和愛護。

他們倆人先後講了話。遲群說，把你們清華、北大的同志找來，是為了編一份材料。前一段，我們去林彪住處發現他有尊孔的思想。我們向上（指毛主席）匯報了，上頭要我們組織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繼續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遲群特別強調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洩露。謝的講話內容與遲群相仿。

「文革」御筆沉浮錄

「榮近」往事



「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的革命師生紛紛寫大字報，熱烈歡迎工人階級佔領學校陣地，堅決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版」往事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遲、謝指定王世敏負責。王世敏，女，四十歲左右，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員，人大撤銷後，她轉到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遲、謝在毛家灣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時，先在清華範圍內組織了一個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幾個有關歷史和社會科學的問題，當時在場的王世敏反應敏捷，口齒清晰，對答如流，備受江青賞識，冊封為「女狀元」。從此，「女狀元」就成了王世敏的桂冠，江青也就記住了她，以至後來提名她為四屆人大代表。我們這次參加會議的人組成了北大、清華批林批孔材料小組。

會議開得不長。會後不幾日，王世敏將我們召集到北大俄文樓的一間教室內，展示他們已經找到的幾條林彪尊孔材料。數日後，大家覺得現有內容太單薄，難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灣找一找，看看能否進一步發現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遲群、謝靜宜向上面請示後，同意我們小組再去毛家灣查找。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效」往事

毛家灣之行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一天，我們北大、清華批林批孔材料小組一行十多人前往林彪住地。林家大院位於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的毛家灣。五十年代初，這裏曾是高崗的公館，林彪當國防部長後，住進此院。林宅擴建後佔地面積約一萬九千多平方米，建築物面積約為一萬一千平方米。從外觀看，林宅灰牆灰瓦，平淡無奇，但內部裝修、設備卻相當講究。

一進大院，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邊廂房駐紮的警衛連，再往裏走，才是林彪的辦公室和臥室。林彪有一些怪癖，最為令人詫異的是控制溫度的辦法。在牀頭上方貼着一張表，上面標明每加一條毛毯增加多少度，每加一條毛巾被又增加幾度，林彪據此調整室溫和體溫。他怕風，怕光，平時窗戶緊閉，但又需要陽光，為此便在臥室旁專門安裝了一間石英玻璃房，使紫外線透射進來。據說安裝這一小房耗資幾萬美元。林彪有一部美國製造的豪華轎車，價值十萬美元左右。在林家大院內，還建有恆溫游泳池，專供其家人享用。

葉群在自己的臥室裏，掛着許多仕女圖。她也有怪癖，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晚上非要抱着枕頭才能入睡，那枕頭兩頭稍粗，中間略細。她的牀邊另放一張按摩牀，每晚令小戰士為她按摩。葉群牀上還配有洗漱設備。衣櫥中，掛着數以百計五彩繽紛的衣裙。鞋子之多也令人咋舌。這些東西與報紙上、熒屏上穿着軍裝，戴着軍帽的葉群很難聯繫在一起。

在林彪宅院內，專門陳列着古玩字畫等珍奇瑰寶，琳琅滿目，猶如一家小型古董店。當我看到這些物品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文革」破「四舊」，查抄的東西，多為林彪等人據為己有。

大致參觀之後，我們開始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首先抄錄了一些掛在牆上的條幅，如「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等，然後與其他同志一起抄下了葉群房內張貼的「四書集句」。十月中旬，我們第二次去林宅查找，發現了大瓷缸裏林彪書寫的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一月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林彪和葉群將上述內容寫成四條條幅，相互贈來送去。我們認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無遺。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克己復禮」，要害就在於「復禮」。根據楊榮國的說法，孔子的「復禮」就是恢復周禮，就是復辟西周腐朽的奴隸制，也就是復辟。因此，這句話便成為我們日後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的中

「文革」御筆沉浮錄

「效法」往事

心。我們還看到林彪臥室掛着（三國演義）中的一首詩：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

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此外，我們還看到林彪的筆記本上記有孔子的「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警句。大約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們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葉群書上的批語，發現有問題的，即抄錄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閱《史記》，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語。最後，我們發現葉群的筆記本上記着林彪口授的「韜晦」二字。

根據在毛家灣收集到的材料，我們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經過一個多月日夜苦戰，材料編妥。它以對照格式編就，即將孔、孟和林彪的言論進行對照，然後加上標題和一段按語。具體寫作方法是大家先討論，然後一人執筆寫成。當時我年輕氣盛，在前輩面前不知謙遜，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個標題：「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和按語：「克己復禮是孔子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和葉群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一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寫下了以上四條。這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野心，把復辟資本主義作為萬事中的大事。」這一材料共分八個部分：

「文革」御筆沉浮錄

「效法」往事

- 一，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論，陰謀篡黨奪權；
- 三，宣揚「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惡毒污蔑勞動人民；
- 四，宣揚「德」、「仁義」、「忠恕」，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 五，販賣「中庸之道」，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
- 六，用孔孟反動的處世哲學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
- 七，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攻擊「五·七」道路；
- 八，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們又到林彪住處核對《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編出後的一天，江青要謝靜宜去看她的女兒李訥。謝說，她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與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後，當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插了一手，將此材料上呈毛澤東並附信說：「主席：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匯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覺得它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各地也迫切需要這樣簡明扼要的材料。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把這份材料轉發全國各省市、各大軍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時參考。現把材料呈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澤東與林彪在中共九大主席台上。

上，妥否請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轉發」。從此，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批林批孔運動。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機關、駐京部隊幹部會議，由遲群、謝靜宜宣講這份材料。次日，一月二十五日又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幹部萬人大會，周恩來總理主持，參加大會的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錫聯、紀登奎等黨政領導人及國務院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大會還是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這份材料，動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在遲群、謝靜宜宣講材料之後，江青在主席台上問編寫材料的班子來了沒有。我們這些匯編材料者均非機關幹部，全是北大、清華的教員，因此，當時無一人在場。遲、謝立即通知北大、清華黨委，要他們迅即將編寫材料的人送到首都體育館。周總理表示沒有將我們請來開會是他的疏忽。小汽車立即將我們中間能夠找到的人送到了體育館會場。我們進館時，周總理正在講話。他說這個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稱讚，編得很好。大會結束後，中央領導人在休息室與我們一一握手，集體接見。

「文革」初，由於反對聶元梓等人題〈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馬列主義大字報」，我被打成「黑幫」、「修正主義苗子」，受到揪鬥。此時，自己參與的工作，榮獲毛主席的首肯。我便簡單地以為現在大方向正確，路線問題已獲得解決，今後的問題該是自己如何好好地為毛主席革命路線努力奮鬥了。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我應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必須把批林批孔鬥爭進行到底〉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必須把批林批孔鬥爭進行到底

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當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前，蓬蓬勃勃展開的批孔鬥爭，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義根子的一場戰鬥。林彪這個政治騙子，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是個什麼學問也沒有的大黨閥、大軍閥，他指使一些人搜羅孔孟的黑貨，醉心於孔孟之道，決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從孔孟的破爛武庫裏，吸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尋找陰謀篡黨奪權、實行反革命復辟的反動思想武器。

林彪在政治路線上效法孔子的「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就連續三次寫下了三條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他把孔子的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克己復禮」，作為他萬事中「唯此為大」的最大之事，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的狼子野心，不打自招地供認了林彪的路線是一條極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如果林彪的反革命陰謀得逞，在國內，他必定按照孔子「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反動政治主張去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把毛主席領導下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再扶植起來，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投靠蘇修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共反革命。「五七一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所供認的一切，就是鐵證。

在思想路線上，他妄圖用孔孟之道，篡改和反對我們黨的理論基礎。他鼓吹「中庸之道——合理」，反對革命的辯證法，他宣揚「受命於天」的天命觀和「生而知之」的先驗論，反對唯物論，他還胡說什麼「德、仁義、忠恕」是「歷史唯物主義」，用儒家的人性論，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居心險惡地夢想使我們黨變質。

林彪還極力向其黨羽灌輸孔孟的「忠君」思想，要他們「敬上」、「無違」，「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想藉此結成死黨，拼湊反革命階級隊伍，以維持其法西斯集團內部的「人和」。在其反革命鬥爭策略上，則把孔子的「小不忍則亂大謀」等奉為信條，大耍反革命兩面派，完全是一副陰謀家、兩面派的醜惡嘴臉。

林彪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一樣，由於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倒退的反動本性，都乞靈於孔孟之道。今天，深入批林、批孔，對於揭露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我雖然小時候沒有讀過「四書」「五經」，但是孔孟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交」往事

「學而優則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等反動思想，對我還是有影響的。至於在歷史學科中孔子的唯心歷史觀和反動人性論的流毒則是廣而且深的。我一定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地投入批林批孔鬥爭，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中，排除敵人的毒焰，清除自己身上的污濁，努力改造世界觀。

（原載《光明日報》1974年2月6日）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梁效」的架構

我自一九七三年十月參加清華大學工字廳會議後，便進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材料小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發表之後，我們開始寫批判文章，自此，這一小組改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該組後來常用筆名「梁效」。

「梁效」有三個頭頭，即李家寬（原為中央警衛師八三四一部隊文書科副科長，當時是北京大學黨委常委、軍宣隊代表）任大批判組黨支部書記，實際負責人；宋柏年（原為北京大學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北大中文系畢業，曾任外國留華學生漢語教師）任大批判組黨支部副書記；王世敏任大批判組黨支部副書記。名義上，「梁效」還有一個黨支部委員會，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湯一介、范達人、楊克明、王朝文和盧振義均為黨支部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盧振義作為工人代表參加支委會含有「摻沙子」的意思。支委會不常開會，大批判組支部的領導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負責。他們三人的直接領導是遲群、謝靜宜。謝

「文革」御筆亂浮錄

「總效」往事

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頭頭下面，又分成兩個大組：材料組和寫作組。材料組組長湯一介，負責編《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進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組當時有十餘人，其成員主要是原先參加編寫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湯一介二位先生外，還有清華大學圖書館長史國衡等人。寫作組組長范達人，負責撰寫批判文章。為了加強寫作組力量，當即又從北大、清華增調了一批筆桿子。他們是楊克明（哲學系教師）、葉朗（哲學系教師）、孫慶升（中文系「文軍」寫作組長）、胡經之（中文系教師）、朱耀庭（歷史系教師）和清華大學李潤海、張德等人。另外，抽調了一些剛留校的工農兵學員，如中文系的盧永麟、哲學系的穆少安和歷史系的馬朝軍。寫作組約有十五、六人。

由於形勢發展，後來寫作組又分為幾個小組。**歷史組由我負責，主要寫史學方面的文章**，如評介秦始皇、孔丘、農民起義等；哲學組由楊克明負責；《紅樓夢》組由胡經之負責。毛澤東很欣賞《紅樓夢》，他看了多遍，一再提倡研究《紅樓夢》，他說《紅樓夢》這部書產生在封建社會沒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裏面的人物，左、中、右都有。林黛玉、賈寶玉、晴雯是左派，封建社會的叛逆者；賈政、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色事

王夫人、王熙鳳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義的維護者。《紅樓夢》是一部名著，要讀五遍才能把裏面的人物搞清楚，分清好壞。

材料組後來分出一個註釋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中國文學史教員孫靜負責，其任務是註釋詩詞，供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參考。註釋組有時還要將詩詞譯成白話，以便工作人員先理解詩詞含義，然後給毛澤東誦讀。為了加強力量，高質量地完成任務，後來又從中文系調來林庚教授和吳同寶先生。

「梁效」後期，據說，中央為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需要查閱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原著，由於他們不可能去閱讀全文，因此專門從北大經濟系調來王俊宜，要她在《資本論》等書的重要段落下面劃紅線，標重點。此時，除少數人作註釋和劃線外，其他人全併到寫作組，主要任務轉向寫文章。當時寫作組發展到三十多人，比較龐大，為便於工作，分成九個寫作小組，直屬李、宋、王領導。每個小組各有側重，詳見下圖：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毛澤東

江青

遲群 謝靜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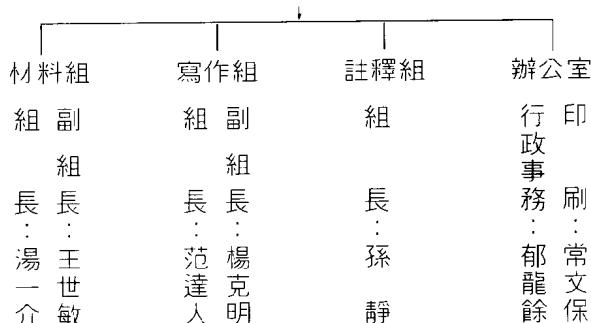
「梁效」核心組

(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梁效」黨支部委員會

(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周一良、湯一介、范達人、楊克明、三朝文、盧振義)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效」往事

各寫作小組：

- 范達人小組（側重史學）
- 鍾哲民小組（側重政治）
- 葉朗小組（側重哲學）
- 胡經之小組（側重《紅樓夢》研究）
- 徐琳小組（側重馬列主義理論）
- 孫慶升小組（側重文學）
- 梁英明小組（側重政論與國際問題）
- 湯一介小組（側重哲學史）
- 孫靜小組（側重文學史）

九個寫作小組長均是些「筆桿子」，大多數是教師，唯鍾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政工幹部，此公相貌平平，矮矮的個頭，鼻樑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視鏡，說起話來帶有濃重的湖南口音，可是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當年黨內批判赫魯曉夫，常有內部報告，只能聽，不能記，他聽完三個小時的報告，在沒有任何筆記的情況下，回來可以再傳達兩個半小時。粉碎「四人幫」後，「梁效」有兩個小組被稱為「尖刀班」，我和鍾哲民均擁有尖刀班長的頭銜。可能由於我們兩個小組出手的文章比較多些，加上「態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鬥，吃了較大的苦頭。九個小組，每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組三至四人。我們這個「尖刀班」最後僅三人：陳先達、何芳川和我。

據《歷史的記錄》統計，從黨的十大以後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梁效」共發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當時的重點文章很多出自我們小組之手。我本人參與撰寫的文章共三十四篇。其中已公開發表的二十八篇（詳見後文）。

「梁效」後來還做了些與大批判無關的工作。例如全國各地有不少人給中央寫信，其中一部分群衆來信就轉到了「梁效」，由我們摘其要點，綜合上報。這超出了「梁效」作為大批判組的職責範圍。粉碎「四人幫」後，有人說「梁效」不僅是一個寫作班子，也是一個秘書班子，此話不無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還曾要「梁效」做過一件與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華印刷廠，不知怎麼疑神疑鬼，認為新華印刷廠有特務，有人收集她的情報，她將此事告訴了遲群、謝靜宜。他們便派宋柏年兩次去新華印刷廠調查。最後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文革」御筆沉浮錄
「桀效」往事



作者。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范達人在「梁效」期間參與寫作並已發表的文章目錄：

秦始皇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 1973年 《北京大學學報》第3期

孔子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派 1973年 《北京日報》

秦始皇是打擊奴隸主復辟勢力的政治家 1973年 《教育革命通訊》

略論秦始皇的暴力 1974年1月21日 《人民日報》

試論歷史上關於秦始皇的兩派論爭 1974年 《北京大學學報》第2期

林彪與孔孟之道 1974年 《紅旗》第2期

林彪再三揮舞「克己復禮」的破旗居心何在？1974年1月29日 《人民日報》

1974年《北京大學學報》第1期

林彪鼓吹的「小國師大國」是叛徒、賣國賊哲學 1974年 《北京大學學報》
第1期

孔丘其人 1974年 《紅旗》第4期 1974年 《北京大學學報》第2期

讀《鹽鐵論》——西漢中期儒法兩家的一場大論戰 1974年 《紅旗》第5
期

論商鞅 1974年 《紅旗》第6期

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 1974年 《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

有作為的女政治家 1974年 《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

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點體會

1974年 《歷史研究》第1期

評林彪賣國哲學 1975年 《紅旗》第8期

陳勝、吳廣農民起義的歷史功勳 1975年 《歷史研究》第1期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效」往事

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培養接班人——批判神童詩 1975年2月24日

《人民日報》

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 1975年3月3日 《人民日報》

無產階級專政與叛徒林彪 1975年 《紅旗》第5期

投降主義的讚歌——評《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 1975年9月

《人民日報》

林彪與《水滸》 1975年 《北京大學學報》

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戰勝的 1975年12月19日 《光明日報》

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 1976年 《紅旗》第2期

評「三項指示」為綱 1976年2月29日 《人民日報》

黨內確有資產階級——天安門事件剖析 1976年5月18日 《人民日報》

在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中佔領和改造上層建築 1976年7月27日

《人民日報》

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 1976年 《紅旗》第9期

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1976年10月4日 《光明日報》

「梁效」最後的成員有：

李家寬 北大黨委常委

宋柏年 北大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

王世敏 (女) 清華大學哲學教員

馬栩泉 清華大學電子計算機教員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莊事

- 王朝文 清華大學國際共運史教員
龍協濤 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盧永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田餘慶 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員
史國衡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葉朗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
盧振義 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
孫中原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員
孫慶升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員
孫靜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員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員
陳先達 北京大學馬列主義哲學研究所教員
吳同寶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員
何芳川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
李潤海 清華大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教員
陳熙中 北京大學留學生漢語教研室教員
周一良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郁龍餘 北京大學東語系教員
張正釗 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教員
范達人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

「文革」禦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 洪兆龍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員
張世英 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楊克明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
林 庚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 根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員
羅祥文 北京大學法律系國際法教員
張 德 清華大學教員
趙齊平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鍾成勛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員
胡經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鍾哲民 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常文保 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梁英明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員
穆少安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
魏建功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教授、原北大副校長

在上述成員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張世英、史國衡。馮友蘭是「梁效」顧問。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馮府請教，例如《孔丘其人》寫成後就曾派人登門徵求馮老的意見。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在「梁效」期間，與部分成員合影。左二為作者。

「梁效」成員均由黨組織選調而來，個人無任何選擇權，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衆組織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意願。

這一組織最初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後來用了許多筆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施鈞、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筆名是「梁效」。為什麼取「梁效」這一筆名呢？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初，我們發表了一系列批判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名義。當時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筆名。他說如果報刊上經常出現「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署名文章，有點不大好。姚將其意見通過《紅旗》編輯告訴了李家寬，李向遲、謝作了匯報。遲、謝同意用些筆名並說這樣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參加大批判，而不僅僅是兩校。於是，後來一些份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筆名。用什麼筆名呢？在一次會上遲群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當時建議用「梁效」，因為一則北大、清華是兩個學校，「梁效」與兩校諧音，再則「梁效」兩字從語音聽亦不錯，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當時，遲群對我的建議未置可否，李家寬等人倒同意用這一筆名。後來，「梁效」竟成了我們的主要筆名，人們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這一名稱漸漸淡忘。國內外索性將這一組織稱為「梁效」。如社會上廣泛流傳「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有人還用「寫梁效式文章」的語句，諷刺他人。

「梁效」在組織紀律性方面，要求甚為嚴格。大批判組內編寫什麼材料，撰寫什麼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沒有公開發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組內與此事無關人員談及。基本上是各幹各的，互不通氣。除非需要，才在較大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的範圍內討論。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第一號文件向全國下達以後，我們搬進了北大朗潤園北招待所，從此，這裏便成了兩校大批判組的辦公地點。此樓原為專家招待所，專供國內外著名學者、教授、專家到北大講學和學術交流時下榻，樓內裝飾較為高雅。大批判組的中、青年成員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寫作組佔用了一層樓。二樓除李家寬和宋柏年外，多數為材料組佔用。三樓住着王世敏等少數女同志，偶而遲群、謝靜宜也在三樓小住。



圖中建築物為北京大學朗潤園北招待所，「梁效」駐地。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版」往事

二層與其他樓層相比，戒備更為森嚴，因為擋置了許多材料。閑人不能隨便入內，會客只能在一樓客廳。大樓門邊設有傳達室，晝夜有人值班，這座灰色的大樓的確籠罩着一層神秘的雲霧。

中、青年成員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時間工作，非常緊張。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則必須返回駐地。有時為了趕寫一篇文章或準備一份材料，甚至連星期日也要加班。當時我們的伙食費每人每月自交十元，公家每日補助四角錢。兩者相加每月約二十二元人民幣。就當時的生活水平而言，我們的伙食相當不錯。早餐有稀粥、豆漿、油餅、雞蛋等，中、晚餐均為一葷一素一湯，夜間加班則有餛飩、包子等夜宵。逢年過節另有豐盛的會餐。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誰家的班子？

粉碎「四人幫」後，人們視「梁效」為「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江青也曾稱「梁效」為班子，意指她的寫作班子。

誠然，江青與「梁效」關係密切。她與「梁效」三位頭頭的關係，我不知情，不便妄論。她與「梁效」一般成員的接觸，據我所知，大致如下：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在人大會堂一個小會議廳裏召開座談會，討論如何深入批林批孔，通知了「梁效」和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常署名「唐曉文」）部分成員參加。當時，江青坐在台上中間位置，左邊是王洪文，右邊是葉劍英。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姚文元等也在場。「梁效」參加此會的成員有魏建功、周一良、湯一介、田餘慶和我。當江青提出如何深入開展批林批孔問題時，有些老教授反映出版書難，她立即就此作了一番指示。江青在這次會上的講話，事先似無準備，內容零亂，未給我留下完整的印象。座談會結束前，王洪文說，江青同志的發言和她所主持的這個座談會很好很重要，要求大家吃透精神，將批林批孔運動進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一步深入開展下去。接着，葉劍英亦作了類似內容的講話。
兩位黨的副主席為江青捧場，當時給我的直觀印象是她代表
着毛澤東主席。

同年六月十七日，座談會後不久，我突然接到通知：帶上洗漱用具和換洗衣服，準備參加重要活動。十多分鐘後，我們接到通知的人，上了汽車，就直奔火車站，以為去見毛主席。汽車開得非常之快，以致患有心臟病的鍾哲民頗感不適，他請求司機放慢速度。汽車一到站，我們立刻登上一趟專列。上車後方弄明白，我們將跟隨江青去天津旅行。專列上有會客室、辦公室、娛樂室和臥室。據說，只有黨和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才能單獨乘坐專列，政治局委員則需兩人以上同行方能調用。江青此次邀了紀登奎同行，才撥了一輛專列。到天津後，多數人住進天津市委招待所，少數人跟隨江青在天津賓館下榻。「梁效」此行前往天津的有魏建功、周一良、湯一介、田餘慶、鍾哲民和我等。

第二天，天津市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江青在會上大談儒法鬥爭。她在強調批林批孔的重要性後說，儒法鬥爭是歷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而且這種鬥爭一直貫穿到現在。儒家主張復辟倒退，法家主張改革革新，現在也還存在着復辟倒退與改革革新的激烈鬥爭。她還特別談到婦女的地位問題，江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青這次雖然講的是古代婦女地位問題，但是，人們意識到，言下之意，她本人依然受到歧視。

天津市批林批孔大會結束後，我們隨同江青到了天津郊區的小靳莊，接待者是黨支部書記王作山。他是一名復員軍人，向江青匯報了小靳莊批林批孔的情況。江青把小靳莊定為她的革命試驗田，因而，小靳莊的評法批儒小組、革命文藝小組、農民詩歌小組等形式形式的組織紛紛展開了活動。不久之後，甚至在全國掀起了十學小靳莊的熱潮。



此為當時一景：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大隊女青年批判林彪、孔老二宣揚的「男尊女卑」的反動觀點，破舊俗立新風，同舊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

（新華社記者攝影）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天津駐軍部隊將江青一行接到了他們的駐地，給予熱情而又隆重的接待，特地從北京請來了軍樂隊、藝術團體和高級廚師。當我們走進部隊駐地時，歡快悅耳的軍樂悠然奏起。高級廚師準備了規格甚高的宴席，桌面上擺滿了山珍海味、美味佳肴。餐後還有雪糕、冰琪琳等冷飲招待。宴會期間亦有軍樂助興。江青即席賦打油詩一首：

× × × 軍戰鬥隊，能文能武啥都會。

能文超過隋陸賈，能武嚇得絳灌退。

× × × 軍立即找人譜曲唱了起來。晚宴後舉行文藝聯歡，× × × 軍文藝工作者和江青隨行人員均表演了節目。

這次隨同江青到天津、小蘄莊、× × × 軍參觀的人馬相當之多。除「梁效」部分成員外，還有「唐曉文」部分成員和中央文化組負責人于會泳、浩亮、劉慶棠等。國家體委負責人莊則棟和遲群、謝靜宜也在隨行人員之列。在聯歡會上，大家要浩亮表演節目，他便從「謝謝媽」開始叫板，唱了一段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的唱段：「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糾糾……」。粉碎「四人幫」後，有人說浩亮將江青稱作媽，指的大概就是這次演唱。劉慶棠在聯歡會上表演了〔紅色娘子軍〕中一小段芭蕾舞。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後，江青於八月二十六日到了北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色事

大，專門到「梁效」駐地北招待所看望。遲群安排我們一個個單獨與江青合影，具體辦法是：當每個人與她單獨交談時，校刊攝影記者從旁拍照。後來有人稱此照為「升官照」，說誰與江青一起合影，就列為親信，日後她當政，照片上的人便將受到重用云云。這些照片，在粉碎「四人幫」後，全部上繳。在我與江青談話時，她問：「你是幹什麼的？」我回答道：「搞寫作的。」她似乎不大明白，楞了一會兒後說道：「哦，是寫文章的。」此刻，我找到一個話題問她：「李訥是我的同學，她現在情況怎樣？」一提到李訥，江青立刻激動起來，她說李訥在上大學時，受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迫害，後來到了解放軍報社又遭到打擊，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此時，「梁效」另一位成員上來與江青合影，我們的談話就此中斷。

江青還給「梁效」送過小米、芒果等。另外，「梁效」一些教授和教員曾到釣魚台給江青上過古典名著的輔導課。

儘管江青與「梁效」來往不少，但是，在我看來，「梁效」應是毛澤東通過謝靜宜、遲群掌握的寫作班子。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指示和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頭頭傳達、貫徹。「梁效」所宣揚、倡導的是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事隔二十多年後，謝靜宜於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告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訴筆者：「早在一九七三年秋，毛主席對我說，聽說林彪家裏有尊孔的條幅，你們去看看。然後，我便找了清華大學幾個人去毛家灣林彪住處查找，發現了幾句零星的林彪尊孔言論，毛主席看後說，你們應該找北大文科教師一起查找、整理，光找清華的教師不夠。於是，我們組建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材料小組。小組的同志幾次去毛家灣，發現了更多的林彪尊孔言論。毛主席看了很高興並要我們把林彪的言論與孔孟言論兩相對照編出一份材料。《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編好之後送給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細審閱並指示我通過北京市委組織系統報到中央。」謝還說：「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就『梁效』今後的任務請示毛主席。主席說一、繼續寫文章；二、選一些好的文章給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些人做點古詩詞註釋；四、江青如果找你們選文章和做註釋，可以幫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義寫信、送材料，你們就不要替她做了。毛主席說最後一番話時邊笑邊拍着我的肩膀。江青在一次會上把『梁效』稱作她的班子。我當時反駁說，這個班子是毛主席提議建立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工作的。江青聽後馬上改口說，那就更好了。」

至於「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和張春橋與「梁效」則無甚

「文革」御寒流浮集

「梁效」往事

直接關係。姚文元與「梁效」也談不上有什麼領導關係，他只不過是通過《紅旗》和《人民日報》向「梁效」約稿或提些建議而已。



「文革」時毛澤東坐車在北京長安街檢閱各地來京群眾。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轉向大批判

爲配合《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發表，「梁效」準備寫些大批判文章。第一篇綜合性的批判文章是發表在一九七四年《紅旗》第二期上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此文發表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北京週報》也將它譯成多種外文發行。參與寫作這篇文章的有我、鍾成勦、朱耀庭、楊克明和錢遜，由我執筆寫成。



1974年1月，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效」往事

該文一開頭就對林彪尊孔的問題作了概括：「林彪一伙無論在政治上搞資本主義復辟，在思想上篡改黨的理論基礎，還是在組織上招降納叛，結成死黨，拼湊反革命隊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兩面派，搞陰謀詭計，無不乞靈於孔孟之道。」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們曾遇到一個難題：林彪為什麼要乞靈於孔孟之道？為什麼黨內的修正主義頭子無不乞靈於孔孟之道？這個問題頗費思索。經過反覆討論，我們終於找到了兩點原因。一日，我在路上碰見了一位老教授，便就這一問題向他請教。這位教授是我非常崇敬的老先生，在學生時代，我曾聽過他作的關於怎樣寫學術論文的演講，收益匪淺。他說，一篇文章寫成後，不要急於去改，應該放一放，然後到頤和園逛一逛，使腦子輕鬆一下，過一段時間再來修改，便會有一個新的境界。這個方法，我一直牢記取，屢試不爽。在路上，我求教於他：林彪為什麼要尊孔？我首先拋出我們的看法：林彪之流之所以尊孔是與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特點和階級地位，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階級特點。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沒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絶命」往事

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體系。在舊中國佔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和封建文化結合的產兒，買辦性和封建性是這個階級的根本特性。他們歷來是帝國主義奴化思想與尊孔讀經的封建文化的頑固維護者和狂熱的推銷者。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誰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必然要實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那裏尋找武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陳獨秀、王明、劉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義，乞靈於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這樣一個階級的特點。出身於地主兼資本家家庭而又長期抗拒世界觀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這是第一點，我們試圖從階級根源上進行分析，找出原因。

其次，再從歷史根源上去尋找原因。從歷史根源上來看，孔孟之道原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具有極大欺騙性的剝削階級思想體系，它的實質是主張倒退，反對進步；主張保守，反對革新；主張復辟，反對革命；是剝削壓迫之道，反革命復辟之道。它後來被腐朽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所利用，也被妄想滅亡中國的帝國主義所利用，成為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成為歷代統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鎖，成為一切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筆事

搞復辟搞反共的反動派的思想武器。由於歷代反動統治者大力提倡，強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滲透到舊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了一種年久日深的傳統觀念。一切主張開倒車的反動派，總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計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騙群衆，蠱惑人心。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反對革命，主張倒退，他們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義頭子林彪是一個不讀書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的大黨閥、大軍閥，但他到處搜集孔孟言論，大講孔孟之道，這完全是由於他和孔孟的反動思想一致，要搞復辟的反革命本性決定的，完全是出於利用反動的傳統觀念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險惡用心。

我扼要地將上述兩點考慮向這位老教授作了介紹，他表示贊同我們的看法。當時，我自以爲我們的看法很深刻，現又得到一位我所尊敬的學者認可，心中頗爲得意。

當時我們撰寫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據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講話精神進行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社有的人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一段時間以來在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中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月十七日，毛澤東提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

「文革」御筆流傳錄

「總效」往事

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向江青唸了自己寫的兩首詩。一首是〈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另一首詩是：

郭老從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
崇拜孔二先。

毛澤東又指出：「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都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娼，都主張厚古薄今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子。」

上述內容，一九七四在「梁效」內部均作過傳達，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

奉命撰寫〈孔丘其人〉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幫」後受到重點審查的文章之一。人們認為它是影射史學的代表作，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該文的寫作經過如下：一九七四年二月底的一個晚上，大約十一時左右，李家寬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對我說：「上面交給我們一個任務，寫一寫文章，題目是〈孔子其人〉（後改為〈孔丘其人〉）。這個題目有來頭，氣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題目。文章要全面介紹孔丘其人，要寫他稍一得勢就殺少正卯，要寫他到處碰壁。三月八日前發表。這篇文章由你們小組寫。」當時，王世敏在場。我回到組內，即向何芳川、朱耀庭、盧振義、張學政傳達了李家寬的要求。由於時間緊迫，我們決定集體湊寫，由我執筆。我們開了三、四個夜車，終於寫出一稿。李家寬和王世敏對初稿基本滿意，李認為寫得不錯，開頭和結尾均有氣勢。李要我們向大批判組全體成員唸一遍初稿，大家聽了後提了一些意見。李家寬指定楊克明和湯一介兩人再與原寫作小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後我們將鉛印送審稿交李家寬，李再送遲群、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謝靜宜。次日，李傳達說：「遲群認為根本不行。謝靜宜說差得遠呢。」他們的評價像一盆冷水潑將下來，使我們很掃興。我們小組只得繼續修改。李家寬、王世敏與我們討論了一次。王世敏認為寫孔丘其人應概括孔子的幾個特點。我們根據王的意見在文中列出五個小標題，又打印出一稿，發到各組徵求意見。在修改稿件的過程中，李家寬又下達兩條指示：「一、寫一段孔丘壓迫婦女的情況；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過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時，江青通過遲群催稿。她說：「我叫你們寫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們寫不出來，我就叫別人寫了。」三月十日左右，遲群又找寫作小組談了一次，他先逐一詢問我們的姓名和原來的工作，然後，要求查一下孔丘父親的名字，寫入正文。他還說，看過修改稿後再提意見。隔了兩三天，遲群對李家寬說，他對修改稿的意見已經對葉朗談過了。原來，一天晚飯後，遲群在葉朗房間內，看到葉對〈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見，甚為欣賞。遲群認為，文章平得厲害。此刻，我已感到無能為力。何芳川卻說：「我來衝一下，單獨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進，但仍未達到要求。李家寬鑑於單靠原寫作組人馬，難以完成任務，便調動大批判組各組力量進行改寫或另寫。一天，在會客室內，各小組宣讀改寫或另寫的稿子。李家寬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效」往事

比較欣賞葉朗、楊克明小組的稿子，認為改得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葉朗、楊克明小組的稿子為基礎再去加工。楊克明等同志怕挫傷我們小組同志的積極性，建議仍由原寫作小組繼續修改。最後，李家寬決定除原寫作小組范達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葉朗和張德兩人，綜合各組成果，特別吸收葉朗、楊克明小組的成果，寫出一稿來。新的一稿，李家寬看後表示滿意，鉛印後送遲、謝。他們亦認為基本可以。遲群通過他的秘書莊昂告訴我兩點意見：在「兇狠殘暴的大惡霸」一段後面，有點概括為好；另將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論，二不會生產勞動，三不會用兵打仗」中「三不會用兵打仗」刪去。我們按照遲群的意見，作了改動。大約在三月二十日左右，此文終於印成送審稿。李家寬除通過遲、謝上報外，特派我將稿件送《紅旗》徵求意見。他還給《紅旗》負責人寫了信。江青收到送審稿後，批給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紅旗》採用。《紅旗》編輯黃達強告訴我：姚文元認為文章寫得比較生動，決定在一九七四年《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人民日報》隨後轉載了這篇文章。李家寬表示不悅，他說怎麼把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發表後不久，遲群秘書莊昂在大批判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對我說：「〈孔丘其人〉寫得真妙，孔丘參加政變那

「文革」御筆沉浮錄

「榮返」佳事

段，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組會客室召開的一次會上，當談到對〈孔丘其人〉一文的反應時，遲群說：「你看像誰就是誰。」同年六月，江青在人大會堂舉行的批林批孔座談會上說：「我叫遲群組織寫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寫得生龍活虎，但有一個缺點，外國人看了說，沒有引孔丘的原文。」

人們認為這篇文章名為批林批孔，實為反對周恩來總理，主要依據是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隸制的一切，從井田到法律，從音樂到酒杯，都是盡善盡美、神聖不可侵犯的。對於新興地主階級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任何一項革新，對於在這場大變革中湧現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卻瘋狂地跳出來反對。學生要求去幫助革新，促進封建生產關係發展，他就惡狠狠地要門徒『鳴鼓而攻之』；晉國鑄了刑鼎，破壞了奴隸制的貴賤秩序，他詛咒人家要『亡國』；甚至在他七十一歲重病在牀的時候，聽說齊國新興地主階級殺了奴隸主頭子齊簡公，奪取了政權，還拚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再三請求討伐。」

一些人認為「七十一歲」、「重病在牀」是影射周總理。這段話出自自我手，後來成為本人的一大罪狀。我從上海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學習與批判》刊登的《孔子傳》中看到類似描述，然後查閱《孔子年譜》，進行核對，認為材料可靠且刻畫孔子復辟形象生動，才加以採用。退而言之，當時總理根本不是「七十一歲重病在牀」。

人們認定「梁效」影射攻擊周總理還有另一個依據，即葉朗等人寫的一篇文章，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報》發表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據當時在註釋組工作的周一良教授回憶：

關於反總理還有一段值得提及的插曲。「四人幫」把孔子與林彪拉到一起，不僅舉「克己復禮」等口號為例，還想從生活上牽強比附，說林彪是儒家。其實林彪生活上倒確有一些怪癖。如他的衣服每件上都標有若干度的記號，他機械地按照加在一起保持多少度來穿衣，但這卻與孔丘無關。大家知道，記述孔子生活的，主要為《論語·鄉黨》一篇。因此，江青命令把《鄉黨》篇譯成白話，供廣大群眾批判。這個任務當然落實到註釋組。篇中講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態，有一句「趨進，翼如也」，描寫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幾個人反覆推敲捉摸，想不出恰當譯法。魏建功老教授靈機一動，說「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張開兩臂，形如鳥之雙翼。但直譯「如鳥張翅」不太雅馴。不如說「端着兩個胳膊向前急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走」，更為傳神。魏老說着站了起來，端起雙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幾步。大家連忙一致贊成他的說法，就這樣定了稿。誰知「四人幫」倒台後，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學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兩個胳膊」是影射周總理，對他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因為總理右臂受過傷，總是彎曲像端着（據說是在延安時，江青騎的馬驚了，把總理從馬上撞下受傷。）雖然總理只是端着右邊一隻胳膊，但批判文章對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顧不得那些了。魏老當然多次被審訊，異常緊張。註釋組的每個成員也都被提問。大家一致承認這句譯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決無藉此攻擊總理之意。退一萬步說，總理也不是端着「兩個胳膊」呀！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史學理論研究》）

粉碎「四人幫」後，還有人揭發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時曾有人提到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據我所知，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內，王世敏給我們唸一些文件，其中第一份是毛主席與李政道博士的談話，第二份是新華社的《國際內參》。她在讀世界對中國的評論時，的確唸到「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與以周恩來為首的溫和派鬥爭」的內容。當時，謝靜宜說：「那是胡說八道，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胡說八道。」並要大家不要相信這種妄評。在場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並未意識到是授意我們反對周總理。

現在再回來談談〈孔丘其人〉這篇文章。有的人還認為我們借批判孔丘「述而不作」來影射周總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是我們的文章在談到孔丘是不學無術的寄生蟲時，套用了毛主席「一不會種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用兵打仗」，將孔丘寫成「一不懂革命理論，二不會生產勞動，三不會用兵打仗」。遲群看稿時，刪去了「三不會用兵打仗」。當時我還想不大通，認為一、二、三點連下來形容很好，為何刪掉呢？遲群的用意，我不清楚，然而就我本人而言，毫無以此攻擊周總理之心。

我與《紅旗》編輯王達強核對清樣時，甚至特地在這篇文章引言「對於識別王明、劉少奇、林彪一類政治騙子、反擊開倒車、搞復辟的逆流，很有意義」中的「一類政治騙子」前加上「這」字，旨在避免引起人們的誤解。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曾向謝靜宜問及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她說：「〈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議寫的。目的在於簡明扼要地介紹孔子。我就此事專門請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寫這篇文章。文章在公開發表前，我們曾將文稿報送毛主席和周總理閱審。」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如果要問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麼，坦率地說，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從內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談會上罵他是「大惡霸」。一九七四年二月間，江青叫陳亞丁到她那裏開會，她說：「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理。」會一開完，總政就貼出了大標語：「打倒大軍閥李德生」。這事傳到了「梁效」大批判組。在此影響下，我們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個「兇狠殘暴的大惡霸」的小標題，影射李德生，這是實情。

〈孔丘其人〉一文發表後，我們參與寫作的人方得以鬆口氣，稍事休息、調整。一天，我到二十一樓歷史系教師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間內坐了一會兒，突然感到渾身不舒服，隨即躺下，呈輕度休克狀，郝斌忙問我怎麼啦？怎麼辦？我使盡力氣請他打電話告訴寫作組。後來，李家寬派了輛汽車將我接回駐地。這次休克並非什麼病症引起，而是一個多月夜以繼日寫〈孔丘其人〉的結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後，我又回到了寫作組。當時，我的工作勁頭很大，曾說過「我們不能在這兒吃乾飯。」這句話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後來則成為我的一條罪狀。

一段插曲

批林批孔運動中還有一段插曲，就是批「走後門」。在「一、二四」、「一、二五」大會上遲群、謝靜宜作了長時間的講話，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且大批「走後門」。遲群說，「走後門」問題，有的單位比較嚴重，譬如說，「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檢查」。此後不久，我們發現遲群有時到「梁效」來，精神不佳。後來得知，一月三十日，葉劍英曾致函毛澤東，講了這個大會上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的事情，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對他的幫助。二月六日，周恩來總理寫信給毛澤東也談及「走後門」問題。信中說，如果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這又太狹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葉劍英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着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毛澤東將此稱作「三箭齊發」。他反對在批林批孔的同時，聯繫實際去批「走後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結仇」往事

門」。

事隔多年後謝靜宜解釋說：「毛主席認為『走後門』是錯誤的，應該批判，但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要與批林批孔這一敵我矛盾混在一起批。很多幹部有『走後門』的問題，批林批孔運動還要靠他們主持。」

當時，「走後門」的現象是比較嚴重的。參軍「走後門」，上大學「走後門」，甚至買火車票、買緊俏商品也都要「走後門」。一言以蔽之：一些人以權謀私。廣大群衆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我也覺得「走後門」敗壞黨風，應該加以批判。可是，毛澤東卻反對批判，令我費解。多年後，我看到一份材料方知毛澤東本人也「走後門」。

毛澤東對王海蓉、唐聞生說：「走後門」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你們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得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

看到這段談話後，我才恍然將「北大的幾個女孩子」與他聯繫起來。一九七三年，北大招收第三批工農兵學員，歷史系來了三位女學員。她們的年齡約在二十七、八歲。三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而來，有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三人均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她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准她們在系裏學習。校黨委得知後，派人與這位班主任談話，作了一番勸說。

那麼這三個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後來我與她們有過幾次談話。原來她們均來自杭州，其中一位曾與我的親戚在杭州機床廠共事過。我的親戚告訴她，如遇困難，可到歷史系找我幫助。她們到校後找過我，未果。因為當時我在「梁效」大批判組上班。後來，我的親戚寫信給我，要我主動去找找她們。大概由於有這一層關係，她們向我道出了實情：原為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中央領導人在杭州休養時與她們結識，後來毛澤東要她們去工廠當工人，在做了五年工人之後，她們提出了上大學的要求，毛澤東應允，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歷史系學習。

在上學期間，每逢節、假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經常派人接她們進城。周恩來、毛澤東逝世後，有人接她們去向遺體告別。在歷史系，一九七二級還有一位女學員，情況與她們相似，她原是江西廬山賓館的招待員。另外，哲學系也有一位類似的學員。毛澤東對王海蓉、唐聞生說的「幾個女孩子」大概指的就是上述這幾個人。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色事

批儒評法

繼〈孔丘其人〉之後，「梁效」所寫的較為重要的文章是〈讀《鹽鐵論》——西漢中期儒法兩家的一場大論戰〉。這是一篇《紅旗》雜誌的特約稿件。一九七四年四月初，《紅旗》編輯部的邵鐵真同志打電話給我，約我們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寫一篇讀《鹽鐵論》的文章。我將此事向李家寬作了匯報，李把這一寫作任務交給了我們小組。由於何芳川和我過去是從事世界史的教學和研究的，不太熟悉中國古代史，於是，我們便先把《鹽鐵論》原文找來仔細閱讀，然後按照自己的構想，討論出一個提綱。我們的主導思想是批判賢良、文學們所鼓吹的復辟倒退，肯定桑弘羊的革新進步，將兩者之間的鬥爭說成是儒家和法家的鬥爭。大約在四月五日左右，我們寫作小組四人（范達人、鍾成勛、何芳川、朱耀庭）到《紅旗》雜誌社與邵鐵真、何望賢商量如何撰寫此文。邵是《紅旗》的老編輯，何則剛從湖南調來。邵鐵真提出兩點要求：一、強調中央集權。他說毛主席關於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措施，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二、批匈奴，影射

「文革」御筆沉浮錄

「炮灰」往事

蘇修。關於霍光問題，我們提出，這個人物是儒家還是法家，看法有分歧，不好寫。邵說，不好寫，暫時避開也行，或者按你們的意見寫上也可以。邵還給我們唸了江青於一九七四年初對宣傳口負責人關於儒法鬥爭史的講話。

我們小組返回駐地後，就分頭起草。由於我當時健康狀況欠佳，商定由何芳川起草開頭和第一部分；鍾成勦起草抗擊匈奴部分。何芳川在草稿中把霍光寫成儒家。我記得他當時的根據是：一、《漢書》一個傳內說霍光是支持召開鹽鐵會議的；二、桑弘羊是被霍光殺害的，他們是對立面；三、漢宣帝是法家，他視霍光「如芒在背」。我們在通稿時同意何的意見。文章初稿約於四月十五日左右送到《紅旗》。一、兩天後，邵鐵真和何望賢又找我們談了一次，他們認為初稿不太理想，要改寫，並且對第一、二部分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還要求增加第三部分，談談儒法兩家思想、路線方面的對立。我改寫了第一段中關於批判「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部分，何芳川增寫了第三部分。我們四人集體通稿一遍後，將定稿送到《紅旗》，《紅旗》認為可以，略作了一些修改。關於霍光的一些提法便是《紅旗》加上的，如「霍光沒有出場，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孫賢良、文學作為他的炮筒子」；「霍光大權到手，很快就糾集一個山頭」。

「文革」御筆流傳錄

「絕效」往事

此文發表在《紅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上。文章發表後，受到了江青的稱讚。她曾兩次提到這篇文章。一次在天津萬人大會上，江說：「《紅旗》雜誌的文章叫〈讀《鹽鐵論》〉我建議同志們看一看。」另一次她說：「現在報刊上的文章都比較平，我看到《紅旗》上有一篇〈讀《鹽鐵論》〉的文章，還寫得不錯。第一次講到儒家是對外投降的，是賣國主義的。」這裏就引出了賣國主義的問題。我們的文章是這樣寫的：「匈奴是西漢北方一個奴隸制軍事政權。它擁有幾十萬騎兵，奴役壓迫着當時幾十個小邦，儼然是北方一霸。由於西漢社會制度比匈奴進步，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先進農業國，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西漢看作是一塊肥肉。他們經常發動突然襲擊，對西漢北部進行武裝掠奪，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構成了對西漢王朝的嚴重威脅。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當時匈奴和西漢的矛盾，是匈奴奴隸主貴族和西漢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是落後的奴隸制度和新興的封建制度之間的矛盾。因此，漢代對匈奴的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

我們把西漢反對匈奴的戰爭，說成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我們系（北大歷史系）有些人讀後有不同意見，引起了爭論。他們的觀點是不能將匈奴說成外國，因為它的一部分

「文革」御筆沉浮錄

「殺父」往事

後來並入了中國版圖，怎能將其視為外國，將西漢與匈奴的戰爭稱作是反侵略呢？我們對此進行了考證。當時的匈奴佔地很廣，有一部分人後來歸到中國版圖內，一部分人則往西遷徙，走得很遠。據此，匈奴所包括的民族和所佔領的地盤，不能完全說成是中國內部的民族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西漢和匈奴就是兩個國家。所以我們說，西漢對匈奴的戰爭是反侵略戰爭。

所謂賣國主義問題，我們是指賢良、文學們反對對匈奴作戰。賢良、文學鼓吹「抗戰亡國」、「領土無用」論；散布失敗主義情緒，什麼「大軍之後，累世不復」，「田地日荒，城郭空虛」，什麼「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把一場正義戰爭描繪得悽淒慘慘。我們認為賢良、文學們主張罷兵休戰，「兩主和好」，拆除防禦工事，用重金與匈奴講和，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我們把桑弘羊與賢良、文學們的後台——霍光之間的鬥爭，認為是儒法鬥爭。於是就有人認為，我們批霍光就是批周恩來總理。就我個人來說，在寫每篇文章時，均未想到要用它去攻擊、反對周總理。記得此文初稿中有一句描寫霍光「小心謹慎，唯恐有過」的話，我改稿時刪掉了。

還有人說，我們文章中的「反對封建割據」是影射八大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社」往事

軍區司令員的調動。我們的文章中確有「在歷史上，凡是對內搞分裂、搞割據的反動勢力，對外大都是投降主義者」這麼一段話。我認為毛澤東當時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用意就是為防止出現山頭主義。他倡導大家讀《鹽鐵論》，讚賞桓寬的《鹽鐵論》這一本書，其出發點也是為了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紅旗》編輯在與我們一起討論稿件時，何望賢曾說：「要強調中央集權，反對地方割據，今天八大軍區司令員也調動了嘛。」我們在寫〈讀《鹽鐵論》〉一文時，確想使文章含有這樣的寓意。「吳王劉濞把持了海濱，大官鄧通霸佔了西山。這些人役使大批貧苦農民，使用大量奴隸勞動，大發橫財，有的甚至富埒天子，財過王者，他們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私門成黨，逆節之心作，大搞分裂割據活動，一再發動和參與叛亂，成為威脅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禍根」。這段話的含意是很清楚的，就是要防止封建割據、山頭主義的出現。至於是否具體有所指呢？否。

我們寫完〈讀《鹽鐵論》〉後，迅即着手寫〈論商鞅〉。這也是一篇《紅旗》雜誌社的約稿。約稿人是黃達強和余征。他們要求全面介紹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肯定他的歷史功績。系統闡述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具體內容和鬥爭過程。他們還說，《紅旗》以後要逐一介紹法家人物，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效」往事

下期將刊登中央黨校撰寫的〈苟況〉。

〈論商鞅〉一文由何芳川、鍾成勛兩人同時起草第一部份，朱耀庭起草第二部分，我起草第三部分。在寫作過程中，《紅旗》曾要求我們查查蘇修攻擊商鞅的材料並可以有針對性地批判幾句。五月中旬，文章初稿寫成，經李家寬、王世敏、宋柏年審閱後送《紅旗》。余征認為寫得一般，理論分析不夠，我們又根據他的意見作了修改。此文發表在一九七四年《紅旗》第六期上。我寫的第三部分從初稿到定稿無大變動，它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認識，現附錄於後：

三

在商鞅變法的整個過程中，始終貫串着兩個階級、兩條政治路線極其激烈的鬥爭。商鞅的一生就是在與奴隸主反動勢力頑強鬥爭中度過的。

變法前，在秦孝公面前，商鞅與舊貴族政治代表甘龍、杜摯就「要不要變法」問題，展開了一場尖銳的論戰。鬥爭的結果，商鞅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的革新理論，擊敗了儒家鼓吹「法古」、「循禮」的陳詞濫調，從思想理論上為變法掃清道路。變法剛開始，奴隸主貴族利用傳統習慣勢力，煽動成千成萬人在首都

「大革」御革沉浮錄

「終返」往事

鬧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史記·商君列傳》）妄圖一舉扼殺初試鋒芒的變法運動。後來，他們又唆使太子犯法，公開挑釁，蓄意破壞變法路線的貫徹。面對着這種嚴重的政治形勢，商鞅沒有被反動保守勢力的其勢洶洶所嚇倒，也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他敏銳地抓住問題的癥結，指出：「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史記·秦本記》）決心狠狠打擊那些破壞變法的頑固派。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孫賈臉上刺字（黥刑），嚴懲了太子的兩個師傅——真正的幕後策劃者，還殺了犯法的奴隸主貴族祝權，並把捕獲的七百多個破壞變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在渭水邊鎮壓了。商鞅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對奴隸主階級復辟勢力實行專政，對舊社會舊勢力的垂死掙扎實行革命鎮壓，充分表現了商鞅作為地主階級上升時期政治代表敢作敢為的戰鬥精神。

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公子虔八年閉門不出，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糾集一小撮死黨，繼續策劃反革命活動。一些本來「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的舊貴族改變策略，裝作奉公守法的樣子，擠出一副笑臉，竟娓娓動聽地論起變法的好處來；而反動儒生趙良則是另一副面孔，在奴隸主貴族指使下，赤膊上陣，舔起儒家唾餘，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里地咆哮：「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指責商鞅變法不得人心，要商鞅棄政下台，隱退歸田，否則就要來收拾他，反動氣焰囂張已極。階級敵人軟硬兼施，又是阿臾奉承，又是威脅訛詐。商鞅頭腦清醒，堅持了法家路線，他痛斥那些「當面捧場、背後罵娘」的舊貴族是「亂化之民」，把他們統統遷到邊城去，摧垮這伙地頭蛇的老巢；並斷然拒絕奴隸主復辟勢力的「最後通牒」，以把變法事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行動，回敬了趙良這幫反革命侏儒。

然而，商鞅變法畢竟是地主階級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有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支持變法的秦孝公一死，與舊貴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駟上台執政，階級鬥爭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牛鬼蛇神紛紛從陰溝裏爬了出來。公子虔們立即大肆造謠，誣告「商君欲反」（《史記·商君列傳》），秦惠文王（即太子駟）下令逮捕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反動派用「車裂」的酷刑殺害了這個傑出的法家戰士。商鞅以身殉職，為新興地主階級革新事業獻出了生命，結束了戰鬥的一生。

殺害商鞅，是奴隸主復辟勢力對新興地主階級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繼孔丘殺少正卯，楚國舊貴族亂箭射死著名法家吳起之後，又一起嚴重的反革命暴行。這些歷史事實告訴我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們：儒家與法家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大搏鬥，沒有調和的餘地。蘇修叛徒們宣揚儒法合法論，說什麼儒法兩派「追求同一目的」，這種拙劣的謊言，卑鄙的伎倆，既不能抹煞血跡斑斑的歷史事實，也絲毫無助於掩蓋他們自己今天對革命力量的法西斯暴行。

商鞅被害後，秦惠文王推行了一條排斥法家、信用舊貴族的政治路線，秦國的政局出現了暫時的反覆，這說明「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迂迴的」（列寧：《當前的主要任務》）。然而，「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韓非子·定法》）。商鞅被害，「秦法未敗」，商鞅的路線和事業並沒有被消滅。這一點，值得分析和研究。

列寧說：「革命愈深入，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即使發生復辟，保留的成果也會愈多。革命把舊地基掘得愈深，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商鞅在變法期間，從開阡陌封疆、獎勵耕戰到廢除奴隸主貴族世卿世祿制度，從建立縣制、加強中央集權到「燔詩書而明法令」，總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都深深地掘了舊地基，給奴隸主階級以強有力的打擊，使新興地主階級成為左右秦國政治的強大力量，使商鞅之法的繼續推行有了一個牢

「文革」御筆沉浮錄

「殺父」往事

固的階級基礎。同時，商鞅在變法過程中，比較注意宣傳，他認為「為法，必使明白易知」，使「萬民皆知所避就」（《商君書·定分》）。因而使得「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戰國策·秦策一》）。人民群眾從切身經驗中體會到變法革新的好處，就成為抵制和反對舊制度復辟的巨大物質力量。總之，秦法之所以未敗，根本的原因在於，商鞅之法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復辟勢力只能得逞於一時，決不能倒轉歷史的巨輪，決不能改變封建制度必然要代替奴隸制度的歷史規律。

商君身死法未敗，秦皇終奏統一功。儘管出現了一些波折，秦國還是繼續沿着商鞅變法的法家路線前進。王充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頒布「使黔首自實用」的法令，乃至採取焚書坑儒的堅決鎮反措施等等，都是在更大的範圍內，更深的基礎上，成功地實行和發展了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線並沿着這條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路線前進，秦始皇為祖國統一、歷史進步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成為封建社會的「千古一帝」。

對於商鞅這樣一位在歷史變革激流中鬥爭一生的人物，千百年來，衆說紛紜，褒少貶多，但卻營壘分明。歷史上那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絳故」往事

些主張革新的進步人們，大都肯定商鞅的歷史功績。戰國末年的韓非在自己的出色著作中，記述了商鞅的英勇業績，發展了商鞅的先進思想，成為法家理論集大成者。西漢著名法家桑弘羊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豐富了商鞅的學說，他針對儒家賢良文學攻擊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的謬論，指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傳後世」（桓寬：《鹽鐵論·非鞅》）。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頑固黨對商鞅一片咒罵聲中，以大無畏的精神，寫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戰鬥詩篇（《商鞅》），並在變法實踐中，貫徹商鞅的理論。與此相反，歷史上那些守舊、復古派則從反動的政治需要出發，往往大罵商鞅變法。西漢的「孔老二」——董仲舒就惡毒攻擊說，秦國「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造成了禍國殃民的後果（《漢書·食貨志上》）。宋代保守派蘇軾，攻擊商鞅變法使老百姓「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藉此發洩對王安石革新事業的刻骨仇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們手中沒有真理，只得撿起這些儒家骯髒武器，妄圖借攻擊商鞅，來詆譭我們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看，這批馬列主義的叛徒，已經墮落到何等地步！

「大革」抑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儒家的對立面法家。正確評價和闡述法家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法思潮，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戰鬥任務。

（原載《紅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宣揚法家的文章還有一篇〈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這篇文章也出自我們寫作小組之手。後來，有人批判此文名為頌揚武則天，實則吹捧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底，當我從天津返回北京時，何芳川立即告訴我，各組都在寫法家人物的文章。我們決定按原計劃，介紹和評論唐朝女皇、法家武則天。何芳川已開始閱讀有關唐史的資料。由於我對唐史所知甚少且又比組內同志晚看了幾天，所以我們商定，由我起草開頭和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問題和談談當時儒法鬥爭的歷史背景。何芳川起草鬥爭內容和局限性，即第二、三部分。文章寫成後，我們兩人通了一遍稿，由我執筆。題目定為〈法家女皇武則天〉。初稿打印後，曾拿到大批判組範圍內討論過一次，楊克明等人認為此文寫得一般，陳先達不同意文中「階段性轉折」的提法。按照大家的意見，我們又進行了修改。最後，李家寬將文章題目改為〈有作為的女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政治家武則天》，經遲群審稿後送到《北京大學學報》和《教育革命通訊》發表。這篇文章倉促而成，質量不高。李家寬曾專門拿來一篇清華大學幼兒園老師寫的文章，題為〈談談對武則天的幾點看法〉，說我們的文章還不如她們寫得好。後來，清華大學幼兒園的那篇文章與我們的文章同時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四年第四期上。

在我們撰寫這篇文章之前，江青曾在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談會上講到武則天。我未參加那次會議，江的談話內容，我是事後聽傳達得知的。她說：「當時二十萬人上書要武則天當皇帝嘛，這一定有她的社會基礎，她的政策符合更廣大的地主階層。」後來，在天津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江青又一次提到武則天，內容與前次相仿。我們在起草〈有作為的政治家武則天〉一文時，將江青的講話視為「精神」，貫穿在文章之中，但無意把武則天與江青作歷史的比擬，在我們看來，封建皇帝武則天和毛主席夫人是不能比附的。另外，文中點出武則天的局限性與過失，亦非影射江青。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召集十二省、區會議，發表長篇講話，再次談及武則天。她說：「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我是呂后。」

「文革」御筆流傳錄

「朱故」往事

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幸獲殊榮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我接到周恩來總理的請柬，邀請出席九月三十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的盛大招待會。那年，「梁效」受到邀請出席國宴的還有王世敏、湯一介和田余慶。我們是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參加的。除我們四人外，北大黨委書記王連龍（原八三四一部隊副政委，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長期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身邊做警衛工作，多次立功受獎，曾被評為勞動英雄。一九六八年他受毛主席委派，作為軍宣隊代表，進駐北大。）和幾位師生代表也出席了這次國宴。據說這次出席國宴的名單是經過毛主席審定的。

在宴會上，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致祝酒辭，他說，二十五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二十五年來，全國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他向全國各族人民表示節日的祝賀，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國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到會的數千名中外來賓以熱烈的、經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久不息的掌聲歡迎周恩來總理。出席如此隆重的國宴，對我來說，是生平第一次，因此，自始至終我一直處於激動和興奮的狀態之中。我注意到周總理雖然面容較前消瘦，但依然神采奕奕。

國宴規格雖高，但菜譜一般，無山珍海味。出席國宴者當晚在京西賓館下榻，因為次日還有活動。國慶節當日，我們應邀到中山公園音樂堂觀看演出。林彪事件後，取消了國慶遊行，否則我們可以登上觀禮台，檢閱國慶遊行隊伍，領略壯觀盛況。

十月一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出席國宴者的長長名單，我的名字出現在「科技、教育界代表」一欄內。這樣，我出席國宴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播到國內外。遠在浙江紹興家鄉的親朋紛紛來函致賀，寄居在南通的我十歲的兒子和其他在國外工作的親友也得知此消息。一時間，我成了新聞人物。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屆全體代表大會。我作為四屆人大代表出席了這次盛會。三屆人大是一九六五年召開的，按憲法規定本應四年換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四屆人大無法如期舉行，會期一延再延，人大代表的成員也隨着形勢的變化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趣事



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全國第四屆人大會議期間，與北京市部分代表合影。第二排右一為作者。

而不斷更動，最終得以在七五年召開，其間相隔竟達十年之久。

在大會正式召開前，先組織我們集中學習。當時我們在北京市委黨校招待所食宿，與我同室的是一位台灣籍代表，他是一位工程技術人員，出生於台灣，後來到了大陸。當時的工作單位好像是北京內燃機廠。

大會前首先召開預備會，討論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張春橋的《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與我同一個小組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的，有馮友蘭教授和北京郊區的一位農民代表。我們大組的組長是北京東方紅煉油廠一位姓楊的廠長。大家對兩個報告沒有提出什麼意見，順利通過。

人大正式開幕後，我們親耳聆聽了周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還聽了張春橋所作的《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兩人的報告均未全文宣讀，因為報告內容已經預備會討論通過，現在代表們又人手一冊，所以報告人僅唸了開頭和結尾部分，十多分鐘便告結束。

下一個日程便是選舉國家領導人。在選舉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之前，專門召集人大代表中的中共黨員開了個會。會上王洪文代表黨中央作了一番講話，王說選票上的候選人名單是經過黨中央討論的，毛主席批准的，黨員應該遵守黨的紀律，選舉這些人。大家就按照這一要求在名單上畫圈。

會議期間，我見到了不少社會名流。坐在我右手的代表是位女性，約四十餘歲。我問她的職業和姓名，她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告訴我，她是衛生部門的代表林佳媚。這個名字耳熟，但我一下子未及想起她是李先念副總理夫人。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我遇到了魯迅之子周海嬰，我們相互自我介紹後，他說：「范達人，聽說過你。」原來他與我的捷克文

「文革」御筆流傳錄

「朱姍」往事

老師周志堯頗為熟悉。他給我的印象是，興趣多在理工科方面。我還見到了李瑞環、莊則棟、薛菁華、謝芳、張鈞等名人。使我格外高興的是，在會議期間我見到了妻子的堂兄顧懋林，他是一位工程技術人員，山東省青島市的代表，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一直勤勤懇懇工作。他經常出差來京，每次均來我家暢敘。

會議期間的一個晚上，大會組織者專門安排代表們到王府井百貨商店、東風市場採購。當時已過下班時間，商場沒有其他顧客，代表們可以從容選購。「特供」商品與一般商品相差無幾，唯品種稍為豐富些，但價格一樣。我在王府井百貨商店選購了一件朝鮮產的灰色尼龍背心。另外，在大會小賣部，我還買了一個保溫杯，人大代表享受的特權僅此而已。聽說過去人大代表每人每月有五十元人民幣的車馬費，供視察用，我們這一屆並無此項補貼。至於人大代表的作用我未能發揮，既無深入選區聽取群衆意見，也沒認真負責地向上提出政策性的建議。

四屆人大閉幕後，安排代表們到工廠、農村參觀，我們到新華印刷廠、重型機械廠和北京郊區一個家畜飼養場走馬看花地參觀了一番。

這次大會使我感到遺憾的是，未能見到毛澤東主席。當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時代表們雖然一再要求見毛主席，但不知為何始終未能如願。

在「文革」那個年代，我能遠涉重洋，到拉丁美洲考察訪問，能應邀出席隆重的國宴和當選人大代表，出席莊嚴的四屆人大，可謂大紅大紫，內心感到萬分榮幸和異常興奮。當時的心情可以用「受寵若驚，感恩戴德」八個大字來形容。至此，我由一個初期對文化大革命抱有抵觸情緒的人，變成一個積極的擁護者。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新北大》校刊發表的一篇題為〈牢記黨的基本路線 更加猛烈地向修正主義開火！〉的文章，充分反映了我當時的心境：

牢記黨的基本路線

更加猛烈地向修正主義開火！

參加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四屆人大，使我激動得熱淚盈眶，久久不能平靜。

這次團結、勝利的盛會，給我的教育是極為深刻的，最根本的是受到了一次黨的基本路線的教育。

大會的三個主要文件，貫串着一條紅線，就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黨的基本路線。新憲法明確地把它寫入序言，周總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結逆」往事

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反覆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張春橋同志在《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中，把黨的基本路線提到黨和國家生命線的高度。會議期間，許多代表在發言中，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情況，以生動、雄辯的事實證明：黨的基本路線是照耀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燈塔。哪個地方、哪個單位，貫徹執行了黨的基本路線，革命和生產就蓬勃發展，背離了黨的基本路線，就會受到挫折，就要走到邪路上去。

回顧解放以後自己走過的曲折道路，也深切地感到黨的基本路線的極端重要性。人往哪裏變，看走什麼線。什麼路線，培養什麼人。解放初期，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受到革命的薰陶。一九五五年我進入北京大學學習，起初，我比較注意思想改造，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一九五七年，當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和全系革命同志一起積極地反擊右派。一九五八年，響應毛主席關於「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號召，我和幾位同志到工農兵中去，向工農兵學習，受到深刻教育。可是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領導，卻反對我們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胡說什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已經基本解決了」，「主要問題是要多唸點書，提高教學質量」，等等。由於我身上

「文革」御筆亂浮錄

「始效」往事

存在「唯有讀書高」的剝削階級烙印，在這種修正主義思想的腐蝕下，失去了警覺，一頭扎進修正主義泥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業務書」。當時，我身為團總支書記，對如何做好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考慮很少，而對個人業務學習卻廢寢忘食，在路線上分不清是非，以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開始很不理解。從我入學這些年來前後的表現，深刻地反映了自己立場、感情和世界觀的變化。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把我往火坑裏推啊！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猛醒過來，開始懂得了黨的基本路線，懂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工宣隊和軍宣隊的同志多次找我談心，耐心熱情地幫助我，用毛澤東思想、用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我，鼓勵我繼續革命。幾年來，在毛主席制定的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在黨組織的關懷和領導下，依靠集體的共同努力，我們在批林批孔和批判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方面做了一點工作，黨和人民就給我極大的信任和榮譽，選我為四屆人大的代表，讓我出席這樣莊嚴、隆重的大會，真是千言萬語表達不盡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深情。我在工作和思想改造方面還做得很不夠，離黨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很遠。今後決心牢記黨的基本路線，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

「文革」脚本沉浮錄

「樂透」往事

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決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認真改造世界觀，深入地批林批孔，搞好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永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前進！

（原載《新北大》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何以批「小國師大國」？

一九七四年國慶節後不久，江青於十月二十四日，將遲群、謝靜宜和中央黨校的武葆華召到她的住地，指示「梁效」和「唐曉文」寫兩篇文章，一篇批判「因循守舊」，另一篇評林彪的「小國師大國」的賣國哲學。她特別強調說：「我別的什麼都不管，這兩篇文章我要親自過問。」後來經過協商，把批判「因循守舊」的寫作任務交給了鍾哲民小組。他們組內有梁英明、龍協濤等人，中央黨校也派了一人到鍾哲民寫作組協作。評林彪「小國師大國」一文的撰寫，就交給了我們小組。當時，我們組內還有何芳川和鍾成勛。我們兩組承擔了撰寫上述兩篇文章的重任，特別是那篇批「因循守舊」的文章更為重要。因為在這篇文章中要反映出「中央的精神」，要繼續與保守、復古的現象作鬥爭，保障革新的順利進行。

批「小國師大國」是與「風慶輪事件」有聯繫的。當時，「風慶輪事件」已在我們內部傳達。風慶輪是一艘國產遠洋貨輪。一九七四年，該輪出航羅馬尼亞。中國遠洋運輸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總公司組織處一名副處長和一名宣傳幹事，奉命到風慶輪上協助首航歐洲。前者任政委，後者任政治幹事。後來，有人寫信告狀，說他們兩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告狀人將兩人的想法稱之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江青在狀子上批示：「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張春橋、姚文元指責他們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王洪文命令「交通部必須對××進行嚴肅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報中央」。我們寫「小國師大國」一文，也就是要批判「崇洋媚外」和「賣國主義哲學」。相比之下，上面對「小國師大國」一文抓得不是很緊。他們集中力量抓鍾哲民小組寫的那篇文章。不過，這兩篇文章均在四屆人大之後刊出。

在四屆人大召開之前，「梁效」還寫過一篇〈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的文章。這是另一寫作小組起草的。初稿寫成後，在「梁效」大批判組範圍內討論過。我也仔細看過他們的稿件，印象深刻的是一文中一段話：「劉邦死後，呂后和漢文帝以後的幾代，都繼續貫徹了劉邦的法家路線並重用象晁錯、張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歷史研究》復刊

「文革」風暴掀起後，全國幾乎所有的學術刊物因「宣傳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糟粕」而停刊，其中包括《歷史研究》。到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又準備恢復一些刊物，擬以《歷史研究》為試點。對於《歷史研究》新編輯部的組成，國務院科教組建議由周一良教授牽頭並出面籌組。於是，先從北大歷史系調來了梁志明，又從史學界抽調了幾位學術造詣較深的中年教師，組成新的《歷史研究》編輯部。先後調入新編輯部的有：北京師範學院的寧可、人民大學的王思治、上海復旦大學的胡繩武、山東大學的龐樸、華中師範學院的張開沅等人。後來為了加強編輯部的籌備工作，調來了一名專職幹部曹青陽，負責具體行政事務。當時，無論在文化或新聞機構，均講「摻沙子」，於是，從北大歷史系調來了一名剛畢業的女工農兵學員。據說擬請周一良教授出任主編，擬調我去任副主編。可是，「梁效」大批判組領導不肯放我們走。《歷史研究》後來便由胡繩武、寧可、王思治和曹青陽等負責。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色事

周一良先生和我雖然未成《歷史研究》，但是，「梁效」實際上是《歷史研究》的審稿單位，同時也是重要撰稿人。《歷史研究》的所有稿件都要送「梁效」審查；「梁效」也要向它提供一些重頭文章。《歷史研究》復刊第一期準備在一九七四年底出版，因此，我們必須要向它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的稿件。這一期，我們一共提供了三篇稿件：周一良的關於諸葛亮的研究；田餘慶的關於曹操的研究；我們寫作組的〈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點體會〉。

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持續討論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在批判「讓步政策論」過程中，又突出了它的討論價值。我們這篇文章所要論述的是，農民戰爭的作用通過哪些方面表現出來。過去，「讓步政策論」者認為，農民戰爭的作用要通過統治階級的讓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等政策來體現。這一理論遭到毛澤東、孫達人等人批判，我們也寫文章批判過。現在，我們這篇文章試圖闡明：農民戰爭直接的作用表現在哪裏、農民戰爭與儒法鬥爭的關係。後一問題是批林批孔、反儒尊法以來遇到的新問題。我們肯定法家在歷史上的作用，包括肯定法家帝王在歷史上的作用。對法家帝王的肯定，看上去類似「讓步政策」，如何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能在肯定法家帝王的同時又能與「讓步政策」劃清界限，成了一個難點。我們小組三人費了一番腦筋，經過反覆討論，得出以下三點看法：

一、農民戰爭是推動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法家只有順應歷史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這一點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說，農民戰爭制約了儒法鬥爭，推動了儒法鬥爭。在這一總的前提下，我們也看到，農民戰爭往往客觀上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繼續傳播掃清了障礙，開闢了道路。

二、法家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農民戰爭往往客觀上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開闢了道路，但是，它們兩者是有原則區別的。法家是剝削階級的政治派別，它和革命農民有着不同的階級基礎。

三、我們肯定農民戰爭後推行法家路線的新王朝的某些政策和措施，這和反動的「讓步政策論」是根本對立的。研究勞動人民反抗鬥爭與儒法鬥爭關係的過程，也是繼續批判反動的「讓步政策論」的過程。林彪一伙鼓吹的「讓步政策論」，是說農民戰爭失敗後，統治階級會吸取教訓，實行減輕剝削和壓迫的「讓步政策」；正是這種「讓步政策」推動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後」往事

了封建社會歷史的發展。這就是「讓步政策論」的內涵。這種反動觀點，在歷史觀上是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在政治上是鼓吹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論。

人所共知，這種所謂的「讓步政策」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們肯定新王朝的某些革新措施，說它有進步性是因為它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而在封建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是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我們堅持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的一元論唯物史觀，這與「讓步政策」論宣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即封建帝王的讓步政策推動歷史前進，是截然相反的。

我們在肯定新王朝某些革新措施的同時，也清楚看到這些措施不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搞調和、搞合二而一，而是地主階級的階級政策。就地主與農民的關係來說，是重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把封建剝削枷鎖，重新套在廣大農民頭上。

這是我們在一九七四年底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一篇屬於史學研究範圍的文章。後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歷史研究》上，又發表了我們小組撰寫的另一篇文章〈論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的歷史功勳〉，進一步歌頌歷史上的農民戰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爭。文章的前言和第一部分由我起草，第二、三部分則出自何芳川和陳先達之手。《歷史研究》編輯部的同志對上述文章均表滿意。後來，我們繼續寫了些歷史方面的文章。

難得的清閑

四屆人大後，「梁效」的人感到遲群有點情緒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數明顯減少。什麼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幫」後，我們方知原來在四屆人大召開前，關於組閣問題有過一場很激烈的鬥爭。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曾有自己的組閣方案，江青曾提議謝靜宜任人大副委員長，遲群任教育部長。後來，他們的組閣計劃落空，毛澤東批評了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江青寫給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八天之後（十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又給江青寫了封短信：「江青，你可讀李固給王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毛澤東之所以寫這封短信，是因為江青在十九日又給毛主席寫信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這些情況，作為「梁效」寫作組長的我，當時一無所知，只感到遲群不大高興，不那麼活躍而已。至於毛澤東在四屆人大前要江青、王洪文等不要搞「四人幫」。他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這類批評更沒有向我們透露。**遲群等只傳達對他們有利的指示**。據說毛澤東在批評「四人幫」的同時，也批評了其他幫，還說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是立了功的，要對江青一分為二等等。**我想恐怕要到半個世紀之後，這一段歷史檔案才能公諸於世。**

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澤東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對中國的政治形勢作了評介，他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他又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他還指出：「列寧說小生產是經營當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後來，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長沙又談到理論問題。毛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話中，親自點名要張春橋寫文章，從這裏可以看出毛對張較為欣賞，知道內情的人曾談起，張春橋過去在上海做宣傳工作時曾在一九五八年《解放》雜誌第六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此文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毛要《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而且為張的文章寫了編者按。編者按稱：「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可見，毛澤東當時指名要張春橋寫理論方面的文章是有歷史淵源的。

一九七五年《紅旗》第四期發表了張春橋撰寫的題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該文主要強調反「資產

「文革」御筆流浮錄

「總效」往事

風」。他如此寫道：「我們提醒同志們注意，現在颳的是另一種風——資產階級風。這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就是那幾個一部分，變成資產階級分子的妖風。」接着說：「共產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的資產風，對我們危害最大，受這種妖風的毒害，有些人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人，已經發展到把一切都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抬高自己的商品本錢，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賣高價。這種名曰共產黨，實際上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人，表現了資產階級腐朽、垂死狀態的特點。」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題為〈論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的長文。姚在文章中提出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文中下列一段話很引人注目：「一九五九年，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毛主席曾經指出：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因此要認真讀書。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這個意見。毛主席強調：黨的高、中級幹部，首先是中央委員，都應該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並強調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林彪反黨集團垮台以後，又再次說：我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最近講無產階級專政時，又再次強調了這一條。|姚借毛主席的話，反覆強調「經驗主義」的問題。

另外，「梁效」內部還傳達了江青在四月三日、四日、五日對經驗主義的批判。她指出，經驗主義是主要的危險、是當前的大敵，是黨現在的最大危險，應該加以批判。

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下達後，「梁效」的任務便由原來的工作轉向宣傳毛主席這一新的指示，大家圍繞這一中心來寫文章。總的來說，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這一段時間內，由於張春橋、姚文元已有重頭文章發表，我們大批判組沒有寫出特別有份量、有影響的文章。當時我們大都認為張、姚的文章很好，未看出什麼問題。「梁效」寫文章時亦加進反經驗主義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組起草批判「因循守舊」文章時，便盡可能地把反對經驗主義的觀點融入其間。所謂反對經驗主義，當然是把矛頭直接指向那些有經驗的人，指向「文革」前擔任領導工作的「走資派」。這一點是明確的。

過不久，反對經驗主義問題似乎不再有人提倡，彷彿上面已經「剎車」。傳說毛主席對此有批示。後來，我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是新華社有一份〈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姚文元審閱後上呈毛澤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東。這份報告提出，要把反對經驗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的一項主要內容。毛主席看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上述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者都是修正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正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

毛主席的批示，特別是最後一句——「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顯然是針對江青和當時黨內的理論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樣的消消息對「梁效」封鎖，當時，我們無人知曉。

儘管毛主席四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們傳達，但是，我們仍然感到氣氛的變化。「梁效」從四月份起開始蕭條，大家沒有什麼具體任務，有點無所事事。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撰寫一本秦始皇傳記。當時，國內雖然已有一些關於秦始皇的小冊子，但是缺乏一本完整的、有份量的關於秦始皇的專著。我初步設想在我們要寫的專著裏，不僅包含對秦始皇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生平敘述，還要有自己的評價，再附上一些原始資料，使它成為一本研究秦始皇的權威性學術著作。我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議，除當時比較空閑這一因素外，還有另一個原因。自批林批孔、評儒法鬥爭以來，我們寫了不少有關秦始皇的文章，如〈秦始皇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略論秦始皇的暴力〉、〈趙高篡權和秦朝的滅亡〉、〈論陳勝、吳廣的歷史功勳〉等。我們手中掌握不少有關秦始皇的原始材料和後代對他的評價資料，因此，有條件來寫這本書。大家贊同我的提議，並提出赴西安參觀秦陵、兵馬俑，進行實地考察。可是，李家寬不同意我們去西安，而要我們去工廠、農村，參加勞動，參加一點社會實踐，不要整天關起門來寫文章。

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接觸社會，大家都很樂意。與東城區聯繫後，我們小組到一個乳膠廠勞動。該廠主要做醫用手套，生產基本上是半機械化、半手工。乳膠在模型上做成手套形狀後，再用水沖，沖到一定程度，由人工從模型上剝下來。剝脫時稍不留意，手套就會破損報廢。我們就做這項工作。車間裏氣溫很高，當時又正值酷暑，白天我們在高溫下幹一天活，晚上到東城區屬於清華大學的一座深宅大院休息。我們一邊勞動，一邊與工人談天說地，別有一番情趣。長時間「閉門造車」，趕寫文章，頗感疲憊，現在大腦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得以放鬆，大家甚為滿意。

在乳膠廠勞動期間，我們應邀參加了東城區「學理論、談心得」大會。此外，還參加了幾次由東城區委為我們組織的座談會。在這種會上，我們一般只聽、記，不發表任何意見，不隨便講話，比較小心謹慎。

在乳膠廠勞動時間不長，僅三周左右便告結束，重又返回「梁效」駐地北招待所。之後，便進入七、八月北京最為炎熱的季節。可是，「梁效」卻處於冷冷清清的狀態。當時，我們有一種「斷線」的感覺。因為，以往遲群、謝靜宜不時地到「梁效」來，常帶些上邊的精神，而現在，他們很少來，幾乎見不到他們的人影，我們沒有上邊的精神，豈不就像斷線的風箏。**過去我們的文章經常見諸報端，且往往是頭版頭條**，而現在很少有人約稿，我們這些文人空前地清閑。我常以游泳消遣。有一次，在北大游泳池，碰見我們系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說：「你們現在沒什麼事兒了吧？不寫什麼文章了吧？」我覺得他的話有點不大入耳，便告訴他：「《紅旗》第八期不是發表了我們一篇〈評林彪的賣國哲學〉嗎？」他說：「那是你們以前寫的稿子，你們的存貨。」此時，校園內和社會上已議論紛紛，「謠言」四起。

傳說毛澤東對江青有所批評。毛澤東就電影《創業》批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份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過去，我總以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說的就是毛的想法，現在看來並不盡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聽到社會上的種種傳聞後產生了許多疑惑，比較突出的是一位寫作組長。他私下流露出對江青的懷疑，後有人向上匯報。遲群、謝靜宜得知後強調：「梁效」內，不能有人懷疑江青；否則就要立即調離。」但是，後來不知何故，此人並未離開，仍留在「梁效」。

上述蕭條狀態持續了相當一段日子，在此期間，我們就學學理論，讀讀馬列，倒也自在。

評《水滸》

一九七五年春，「梁效」來了位中年女性，她與我們一起用餐，但不與人接觸、交談，偶爾只與謝靜宜說上幾句話。此人是誰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的講師蘆荻（一九三一年生於東北遼陽，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讀，後到解放區。一九五四年起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革」後，轉到北大中文系）。

當時，毛主席已年邁體衰，行動不便，走路需人攙扶，昔日暢游長江的風采已成歷史。眼疾更使他備受困擾。他備有兩副眼鏡，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則只有右腿，供其側臥時使用。這樣看書，時間一長，十分疲倦，對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學的人為他侍讀。經過篩選，最後選中了蘆荻。

蘆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謝靜宜向她介紹毛主席的有關情況並交待注意事項。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蘆荻進入中南海，開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據蘆荻回憶，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她就如何評價《水滸》問題，

「文革」御筆流傳錄

「朱姍」往事

請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發問，是因為一九七四年《北京日報》約北大中文系寫一篇評論《水滸》的文章時，希望點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一實質。當時，學術界對此反應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上講的。接着，他談了對《水滸》的看法：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南腔北調集》)。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評語印在前面。」

上述評論，姚文元當日獲悉。他立即致函毛澤東，內稱主席所提的評論《水滸》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衆，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議將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和他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組織評論《水滸》的文章。毛澤東收到姚文元的信後，當天批示同意。

江青於八月下旬，召集會議。她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對一百多人講話時又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印發她的講話，播放她的講話錄音。謝靜宜將此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澤東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並囑咐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當時，上述情況未向我們透露。

在此期間，《紅旗》第九期發表了〈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社論稱：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鄧小平當時作了反擊。九、十月間，他在部分省委書記會上反駁道：「評論《水滸》是怎麼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讀了三個月，讀了以後，主席發表了這一通言論。有人借這做文章，想搞陰謀。」

我認為毛主席與蘆荻關於《水滸》的談話可能屬於文學領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擬在全國範圍內評論《水滸》的建議就具有現實政治意義，具有針對性，其矛頭指向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鄧小平。

在毛澤東同意印發姚文元的信後，沉寂了一段時日的「梁效」重又活躍起來。「梁效」寫了不少評論《水滸》的文章。我們小組撰寫並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為〈投降主義的讚歌——評《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另一篇題為〈林彪與《水滸》〉。在撰寫上述文章期間，「梁效」又從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命」往事

北大中文系調來幾位對《水滸》比較有研究的人。我記得其中有吳同寶先生，他有時參與文章的起草，有時參加文章的討論，向我們提些中肯意見。他用吳小如的筆名寫過不少文章，是文學史方面的一位專家。我在北大讀書時，曾聽過他作的題為「怎樣欣賞京劇」的講座。他邊講，邊放梅蘭芳、程硯秋等人的唱片，講得有聲有色。粉碎「四人幫」後，他與我們一起接受審查，其實他到「梁效」的時間很短，且又主要做註釋工作。

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傳達後不久，「梁效」成員均赴大寨參觀去了。這次活動是應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當年，「農業學大寨」的號召響徹全國，人們均希望到大寨學習，七十年代中期，赴大寨「取經」的活動達到了高峰，每天參觀者絡繹不絕。

我們首先到××軍駐地參觀。北大「工宣隊」、「軍宣隊」內有××軍的同志，經他們聯繫，我們一行受到了既熱情又周到的接待。××軍還專門組織了一場理論學習和大批判報告會。徐琳在大會上作了關於理論問題的發言，他慢條斯理、有板有眼的講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在大會上也作了一個發言，談〈林彪與《水滸》〉，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唸那篇文稿，且唸得較快。官兵們一個個正襟危坐，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洗耳恭聽」，最後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太原和××軍駐地度過幾天愉快時光後，我們前往大寨。

大寨以梯田馳名，一層層修整得非常精緻。在半山腰處，我們見到了郭鳳蓮。她梳着兩條辮子，穿一雙布底鞋，挑着一副蘿筐，準備去田間幹活。郭與我們一一握手後簡單寒暄了幾句。正當我們興致正濃時，遲群、謝靜宜給李家寬打來了電話，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說有任務。我們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反擊「右傾翻案風」

一九七五年十月，清華大學校園內掀起了一場不小風波。事情是這樣的：同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和黨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呂方正聯名寫信狀告遲群、謝靜宜，說遲群未當上教育部長，牢騷滿腹，情緒低落，燒被褥，摔杯子，平時工作作風專橫跋扈等等。劉冰等人給毛主席的信通過鄧小平轉到毛澤



「文革」時，北京大學領導班子開會學習討論中央文件。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東手中，此信同時抄送北京市委負責人，並口頭將信的內容向市委科教口負責人作了匯報，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調查處理遲群、謝靜宜的問題。

劉冰等人之所以聯名寫信狀告遲、謝，與當時的形勢有關。前一段時間，毛澤東在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批「經驗主義」問題作了批示後，又在五月三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的作法：「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統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是不贊成的就要打。」他還說：「教育界、科學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啦、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國的圓，不要看低教條主義。」毛反覆強調「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並反覆告誡：「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啊？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毛還說：「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因為她經驗不多。江青不是王明，她沒有寫〈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他又批評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

「文革」御筆流傳錄

「炮灰」往事

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毛澤東還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應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根據毛澤東上述一系列指示，鄧小平在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三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進行了批評。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先後發言，就江青說「同周恩來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反經驗主義等問題，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進行了批評。江青等人說開這個會是突然襲擊，是圍攻。鄧、葉、李三人反駁了這個說法。在這個會上，王洪文檢討了幾句，江青未認錯，後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才作了書面檢討：「主席、在京的各位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會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上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得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劉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寫的信。可是，這次，毛澤東沒有支持劉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遲、謝一邊。他在信上作了用詞嚴厲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的鬥爭反映。」這樣便給清華園內的這場鬥爭定了性且綱上得很高。

遲、謝根據這一「尚方寶劍」召開黨委擴大會，批判劉冰等人。起先，劉冰等人態度強硬，不認為反映情況有什麼不妥，後來據劉冰回憶：十一月十五日，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聽到毛主席對清華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靂！我靠在沙發上，腦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會場上什麼人在說什麼，我全沒聽到，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華校園內對劉冰等人的批判會，規模越開越大，最後竟召開萬人大會。「梁效」成員有時也允許去聽會，我就去聽過幾次。我們之所以急急忙忙從大寨趕回來，就是要投入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當時，不僅要批劉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周榮鑫。據說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上告周榮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鑫任人唯親，搞宗派，想把遲群在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搞倒，把他從教育部門領導班子中趕走。毛澤東支持了這封信。反擊「右傾翻案風」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發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矛頭直指鄧小平。過去，我對鄧小平懷有好感。我覺得他為新中國的建立，立過赫赫戰功。印象更為深刻的一九六四年北大社教運動初期，工作組把陸平打成走資派，並說「北大是爛掉了的單位」搞得很左。後來糾偏，鄧小平認為「陸平是好人犯了錯誤，北大工作還是有成績的」，與毛澤東的看法頗為一致。當時，我覺得鄧小平還比較實事求是。後我隨毛對鄧的態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久，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說：「鄧小平耳朵聾，開會時他坐得離我遠遠的。」當時，我曾與朋友議論過此話的含義，他認為，這是毛主席嫌鄧小平不聽他的話。毛澤東還批評鄧將中央書記處搞成了獨立王國。北大聶元梓等人隨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列舉了他很多「罪狀」，其中包括鄧的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澤東在處理劉、鄧二人問題時

「文革」御寒流浮錄

「樂透」往事

態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區別，對鄧小平仍採取「保護政策」，並非置鄧於死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張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沒有同意。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一九七二年，北大工宣隊向北大黨員傳達過一份中央文件，該文由二部分組成：一、鄧小平的長篇檢討摘要；二、毛澤東對鄧小平檢討的批示。先傳達了毛澤東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的批示：

「請總理閱後，讓汪主任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鄧小平的檢討很長，據說約有四萬字，因此，只摘要向

「文革」御筆沉浮錄

「老效」往事

我們作了傳達。鄧首先就「文革」中，有人揭發他的一些歷史問題作了說明、澄清。例如，張雲逸揭發鄧是一個逃兵，鄧說他離開鬥爭前線是經組織批准，合乎手續的。然後，他檢討工作中包括「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態度相當誠懇，最後表示對自己「認賬」的東西決不翻案。結束語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萬萬歲！」

一九七三年鄧小平獲得「解放」。四月十二日，在周恩來總理宴請柬埔寨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的盛大招待會上，他重新公開露面。同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鄧小平當選中央委員。鄧再次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年底，毛澤東對他進一步委以重任。毛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毛又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毛澤東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鄧當了黨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那時，又傳達下來毛對鄧的兩句評價：「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據此，鄧小平便進而成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總參謀長。此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刻，其地位已遠遠高於「文革」之前。周總理病重之後，便由鄧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復職後的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即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安定團結和一定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進行全面整頓。他就此發表了多次講話，主要思想有以下幾點：

一、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說：「從現在起，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黨全軍都要為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這是大局。」「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二、全國各方面存在着整頓問題，工業、農業、商業、財貿、文教、科技，都要整頓。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關鍵是領導班子。現在的問題是有些班子軟、懶、散。經過整頓，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

三、要安定團結，要堅決同派性作鬥爭。鬧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爭權奪利，耍陰謀詭計，弄得不安寧。對派性要寸土必爭，寸步不讓，對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鬥的就鬥。

四、在整頓中要落實政策，快速解放和使用老幹部，發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揮老幹部的作用。中年幹部有比較多的經驗，要發揮他們的作用。青年幹部的提拔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來，否則不是愛護他。對勞模、老工人要注意落實政策。要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們叫作「臭老九」。

五、要抓規章制度，這是保證產品質量所必要的，不能叫「管、卡、壓」。工業整頓後，利潤還是要抓。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潤。

六、要重視教育。學校教育總的要求以學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整個現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師地位。

七、要搞好科學技術。科研是生產力。科學落後，要拖整個國民經濟的後腿。

八、加強黨的領導，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搞好安定團結。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需要加強黨的領導，把黨的優良作風發揚起來，堅持下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黨的領導怎麼行？黨講話不靈怎麼行？

九、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要反對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做法，全面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按照上述思想整頓各行各業。當時，鄧的講話未向「梁效」成員傳達。不過，我們從小道也聽到一些。我個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人覺得鄧小平實際上是想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澤東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國；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絕不會允許的。因為毛澤東視文革為反修防修的戰略決策。據說他曾寄希望於鄧，召開政治局會議，搞個關於「文革」的決議，遭到鄧小平有禮貌的拒絕。鄧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後，毛對鄧的態度大變，由「解放」、重用，轉而又猛批鄧小平。於是，毛澤東下決心，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這場鬥爭相當激烈、尖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有一百三十多名黨、政、軍機關老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此會文件，向「梁效」成員作了傳達。該文稱：「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做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

此時，《紅旗》雜誌又向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約稿，要

「文革」御筆亂浮錄

「尖端」往事

求寫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戰線上的「右傾翻案風」。這篇文章的寫作任務交給了鍾哲民小組。為寫好此文，調去了我們組的何芳川。他們以周榮鑫的言論為靶子，對教育界的「奇談怪論」逐一進行批判。該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為題，發表在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紅旗》上，隨後全國各報刊紛紛轉載。該文指出，在大好形勢下，必須看到教育領域裏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仍然是尖銳的、複雜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潮，分清路線上的大是大非，繼續鞏固和發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這篇文章發出一個信號：一場新的路線鬥爭又要開始，其目標則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後來，我們聽到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系列指示。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效」往事

毛遠新將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談話整理出來，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標題，逐級傳達下來。其主要內容有：

「社會主義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幹什麼呢？是階級鬥爭嘛。」

「為什麼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看不清楚了？問題是自己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

「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小平……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華國鋒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鄧小平同志負責。他要求大家「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

我們將上述指示視為毛澤東的最新思想和黨中央的最新精神，認真學習，反覆領會並努力貫徹。大批判組寫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作為「信號彈」的文章之後，接着由我們小組承擔起另一篇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的寫作任務。

這篇文章也是《紅旗》雜誌的特約稿件。姚文元向遲群、謝靜宜行沿呼，要我們再寫一篇回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遲、謝交給我們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頭頭整理的有關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二、胡耀邦自己寫的〈科學工作匯報提綱〉。「梁效」將胡的這份提綱與〈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匯編成冊，稱之為「三株大毒草」，供人們批判。這一小冊上報中央後，得到了華國鋒等政治局委員的贊同。

〈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是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發出的又一顆重型炮彈。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陳先達起草。其特點是：首次將「右傾翻案風」這一提法公諸於世。我們在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效」往事

動筆之前，還聽了胡耀邦一次講話錄音。那是他向中國科學院共青團員們作的一個報告，他鼓勵青年團員發奮學習科學知識，向科學進軍，作一名長征戰士，為國家早日現代化而奮鬥。胡耀邦的這篇演說富於激情，很有鼓動性。

〈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一文矛頭直指胡耀邦、李昌，進而逼向鄧小平。我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報》社論精神和從清華大辯論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將「右傾翻案風」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了全面的概括，我這樣寫道：「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從教育界的種種奇談怪論，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義觀點，異曲同工，如出一轍，耐人尋味，發人深省，它說明存在着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以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復辟倒退，搞反攻倒算為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徵，它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它的手段是折衷主義。從政治上、思想上回擊這股右傾翻案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是擺在我們面前一項嚴重的戰鬥任務。」該文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不少人寫文章時都加以引用。

爲了批所謂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特地查閱一九五七

「文革」御筆流傳錄

「總政」往事

年周恩來總理在人代會上的報告，因為其中有駁斥右派「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內容。

此文在發表前，我們還找北大化學系、物理系一些骨幹座談，聽取他們對文章的意見。在那種大氣候下，他們當然不會提出什麼相左的意見。

我清楚地記得，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七六年春節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開收音機，聽到正在播放〈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一文。當時，我很興奮，自以為領會、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事後看來，此文顛倒是非，擾亂人心。

一九七六年六月份，《紅旗》又來約稿，要我們寫一篇〈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為了寫這篇文章，我與何芳川、陳先達三人查了很多鄧小平的言論，查來查去，感到鄧小平與林彪不大一樣，他沒有什麼尊孔的言論。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那麼，文章怎麼寫呢？我們三人與《紅旗》雜誌的編輯一起討論，決定把鄧小平與孔孟從本質上聯繫起來。何謂從本質上聯繫，就是說，孔老二要復辟，要恢復周禮，鄧小平要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復辟資本主義，從搞復辟這一點來說，他們的本質是相同的。於是，我們便牽強附會地寫出了這一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將鄧小平與孔孟之道連在一起。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七六年第九期《紅旗》上。

在批鄧過程中，「梁效」曾將鄧小平幾年來的講話編出一份《鄧小平言論》，供批判用。其中收進了鄧小平授意、胡喬木、鄧力群撰寫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胡喬木和鄧力群曾交待如何按鄧小平的授意起草這份總綱的。他們把這份交待材料報送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華又將它轉給了「梁效」。

鄧小平在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約於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間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這是李家寬向「梁效」成員傳達的。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公開點了鄧小平的名，罷了他的官。我們的文章想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但是，後來聽說事發那天，鄧小平既沒去天安門，也沒有在幕後指揮，而是到前門飯店理了髮。因此，我們只好說他實質上是後台。

從周總理逝世談起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周恩來總理病逝。周總理患病住院，雖然國人皆知，但是，當人們聽到這一不幸消息時，仍然為之震驚。周恩來為中國人民、中國革命事業，忠心耿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群衆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們一直將周恩來總理視為楷模。

對周總理逝世，「梁效」成員心情沉重，為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深感痛惜。「梁效」舉行了追悼會。會場前方擺放着周總理的遺像。李家寬致悼詞。我買了黑紗，但僅在上午戴了一會兒，因為遲群、謝靜宜到「梁效」，傳達了中央對周恩來喪事從簡、遺體火化等幾項決定。

在京的黨政領導人均參加了中央為周恩來舉行的追悼會，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沒有出席。從現在披露的材料看，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是複雜微妙，難以簡單概括的。索爾茲伯里在《長征》一書中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有一段評述：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毛是哲學家、詩人，頭腦裏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幻想，他具有一種熾熱的精神，準備為實現自己的見解而採用任何謀略……周恩來則是一位實幹家、外交家、人道主義者，是一位管家。」

早在五十年代，在黨內圍繞經濟工作是否存在急躁冒進問題的爭論中，毛澤東就對周恩來等人進行過多次嚴厲的批評。周恩來為此被迫作過數次檢討，甚至在八大二次會議後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周的請求，最後，會議決定：「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文革」期間，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時好時壞，反反覆覆。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在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一九七二年五月，周總理經醫生檢查，確診身患膀胱癌。毛澤東在醫生的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根據周總理講話精神，發表了三篇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判極左，強調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在此爭論中，毛澤東支持張、姚，談到批林問題時說：「是極

「文革」御筆沉浮錄

「殺戮」往事

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還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對外交部關於國際形勢的分析不滿。他對王洪文和張春橋說：「你們兩人，年紀還不大，最好學一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毛還說：「我這幾年名聲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馬克思、一盞明燈是在歐洲。那個地方，放個屁也是香的，奉為聖旨。你奈何得了我嗎？是敵人右傾機會主義。〈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看，凡是這類屁文件，我是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澤東批評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舉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張春橋建議由王洪文在十大上作政治報告。毛澤東未同意，決定仍由周恩來作此報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以為周恩來在外事活動中說了錯話。按照毛的旨意，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毛澤東對當時的翻譯說：「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邊排一排椅子，誰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江青將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上綱為第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十一次路線鬥爭，誣陷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接替毛澤東。毛澤東獲悉後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外賓後還笑着問在場的周恩來：「總理，你被整得夠嗆吧？」周回答：「沒有，沒有，我剛才還在說，我不會抓大事。」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代表「四人幫」到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總理，說他雖然有病，卻晝夜找人商談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兩天後，毛澤東在長沙接見外賓後指示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文革」以來，周恩來還承受着「伍豪啓事」的巨大壓力。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了「伍豪啓事」問題的專題報告。之後，鄧穎超將此報告錄音整理成文。周恩來於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動手術前在錄音文件上簽名，交鄧穎超保存。據《大動亂的年代》稱，毛澤東關於《水滸》的指示發表的當日，周恩來進入手術室時大聲說：「我是忠於黨、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對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當時我雖不知其全貌和詳情，但總的印象是毛澤東儘管對周恩來有時不滿，不時地批評、指責，甚至開會整他，但毛澤東並無打倒周恩來之心，而且還要仰仗他來治理這個幾近失控的國家。所以，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毫無影射攻擊周總理之意。

粉碎「四人幫」後，「梁效」最為嚴重的罪行莫過於通過「批宰相」來批周總理。「批宰相」這一說法，我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才聽到的。那是在北大歷史系開會批判我們幾個「梁效」成員之後，我思想不通，感到委曲，便找歷史系一位老朋友談心。他說：「群衆反映你們那時批宰相、批趙高、批司馬光等等，實際上是批判周總理。」聽到他說「批宰相是批周總理」，我驚訝得目瞪口呆，難以置信。這是我首次獲悉群衆中居然流傳着這種看法。可是，在思想上我從未有過「批宰相」的概念，更沒有將「批宰相」與周恩來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我們沒有批判歷朝歷代的宰相，有的宰相還受到歌頌，充分肯定其作用。正如周一良教授在自傳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強大壓力下，竟然為我和何芳川作保。他說：「審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查期間，范達人和何芳川兩個組的負責人分別找過我，嚴厲責成我老實交代他們兩人反對周總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兩人都歷史系很好的學生，我認識他們快二十年了，敢保證他們不會反總理。」對於周一良先生仗義執言的高尚人品，我深有感受，早在「文革」初，我作為「黑幫分子」、「修正主義苗子」遭到揪鬥，強迫勞改。當時，他雖身處逆境，卻不顧個人安危，親自揮毫，書寫大字報，張貼於北大歷史系院內，為我申辯，主張「解放」我。

廣大群衆無限懷念周恩來總理。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節前，成千上萬的人自發地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沉痛悼念周恩來。事後得知，「梁效」成員中也有兩人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其中一位是周一良先生，另一位是鍾哲民。那時，我曾騎車途經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聲勢浩大的悲壯場面。廣場上擺放着許多花圈、詩詞和周總理的遺像。這一切充分反映了民衆的情緒。在我看來，這種情緒反映出廣大人民對「文革」的極端不滿，其矛頭不僅針對「四人幫」，有的甚至指向毛澤東。

對周恩來的晚年，鄧小平作過比較客觀的評價。他在一九八零年八月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

「文革」御筆亂浮錄

「絕食」往事

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當一批人。」



北京大學的教師衝破「四人幫」設置的重重障礙，在校外親自精製一個花籃，獻在天安門廣場的旗桿下以悼念周恩來。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試圖跳出漩渦

一九七六年春，我的妻子從波蘭回國休假。為便於工作起見，她希望我同往華沙。我也想乘機離開「梁效」。之所以如此想，並不是對毛澤東的路線有什麼懷疑，當時，我依然認為「梁效」寫文章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了防止走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道路。對毛澤東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我是衷心擁護的。那麼，何以要離「梁效」而去國外呢？主要原因：一、我原以為江青作為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澤東，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後來從正道和小道聽到不少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從此，我對江青等人的正確性和代表性打了個問號。同時，我也深感在「梁效」寫文章，不由自主地捲入中央鬥爭的漩渦，很危險。特別是遲群等人嚴密封鎖毛主席對他們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我再跟着他們幹，實在很懸，應該設法跳出這個漩渦。二、幹部、群衆不理解，不欣賞我們所寫的文章。有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七六年春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趣事

節期間，我們夫婦二人一起赴江蘇南通探親，聽到不少普通百姓不滿批鄧的言論，感到群衆對無休止的鬥爭非常厭倦，而我們所寫的文章，篇篇強調「鬥爭」。另一件事是，我們到太原鋼鐵廠參觀，有位負責生產的副廠長向我們介紹情況時抱怨地說：「我們廠原來生產是比較好的，批林批孔以來，一搞運動，生產就下去了。」他在我們這些「梁效」成員面前，公然表示對批林批孔的不滿，敢於說實話，令我震驚。由此可見，社會上對我們所寫文章，反感到何等程度。第三件事是，一位在部隊工作的老朋友，邀我到家中作客。在我們閑談中，他不滿地問：「你們現在又要批判鄧小平這些老幹部，老幹部都打倒了，誰出來工作？」三、「梁效」的清規戒律使我不快。一次，我與「梁效」負責行政事務工作的同志一起騎車去看調演節目，途中，我問他：「我們每天補助多少錢？是中央還是市委補助的？」「梁效」一頭頭得知後即找我談話，以責備的口氣說：「我們每天補助多少錢，你不知道嗎？難道你要跟外面的人勾結起來搞垮我們的班子嗎？」又有一次，我與一位同志聊天，說到外交部同志也有大批判組選印的文章。這件事又被「梁效」某頭頭知道，他聲色俱厲地說：「你跟外交部的人吃吃喝喝，我們跟外交部一點關係也沒有。」再有一回，正當我們小組在北京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乳膠廠勞動期間，我抽空去看望在北京木材公司工作的朋友，他在辦公室問我：「遲群犯錯誤了，你知道嗎？」當時，由於辦公室的人很多，我沒有答話，岔開去說別的了。「梁效」那位頭頭又很快獲悉，找我談話，他說：「你岔開了，等於默認遲群犯了錯誤。」

後來，李家寬和王世敏也經歷了一次信任危機。大約在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間，宋柏年召開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全體成員大會，對李家寬、王世敏兩人的工作作風進行揭發、批判。遲群、謝靜宜也參加了此會並支持大家對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們立即離開大批判組，回原單位工作。那天，我正好回家，沒有參加那個批判會。事後，有的同志向我簡要介紹了會議情況。李、王二人調離後，宋柏年擔任「梁效」主要負責人，紅衛兵出身的郁龍餘和中文系的孫靜進入領導班子。北大黨委書記、原八三四一部隊副政委王連龍和北大黨委常委魏銀秋得知此事後，認為處理欠妥，強調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風或其他方面存在許多缺點，但政治上沒有什麼大問題，不應調離「梁效」。遲、謝考慮了王連龍和魏銀秋的意見，兩、三天後，又將李家寬和王世敏調回大批判組並官復原職。

鑑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向「梁效」領導打了報告，要求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隨妻赴我駐波蘭使館工作。為避免領導產生誤解，以為我要「臨陣脫逃」或對「梁效」有什麼看法，我特意在報告上寫道，幾年來組織上的教育培養，我將牢記於心，今後無論到何處，我都要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奮鬥不息。

請調報告先交給李家寬，再轉送遲群、謝靜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黨支部、校黨委、遲、謝一路綠燈，旋即獲准。當時，我以為領導通情達理，照顧我們夫婦兩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幫」後，有位頭頭告訴我，遲群生怕我把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內的情況洩露給外交部，曾幾次說：「讓范達人走吧！」由此看來，我的請調報告正中了他們的下懷。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按既定方針辦」

粉碎「四人幫」後，《光明日報》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發表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被定為「四人幫」的篡黨奪權動員令。因此，起草這篇文章的我們小組首當其衝，受到猛烈衝擊。

毛主席逝世後，《光明日報》向「梁效」約稿，要我們寫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談談「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李家寬問我們組能不能寫。

對毛主席逝世，我個人已在北大校刊上發表過一篇悼念文章，全文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啊 我們永遠忠於您

歷史系教員 范達人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踏着沉重的步履，走進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在這裏，我瞻仰了最崇敬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遺容；在這裏，我悲痛萬分，放聲大哭；在這裏，我立下了畢生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結效」往事

線而戰鬥不息的誓言。回到大批判組，打開金光閃閃的《毛澤東選集》，在扉頁上寫了幾句話，寄託我的哀思，表達我的決心：紅日燦爛照心間，偉績永存載史篇，含淚攻讀遺雄文，革命登攀志更堅。

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體實踐，在同國內外、黨內外階級敵人的長期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的篇章。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戰無不勝的強大思想武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我們的生命線。毛主席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全部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迫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為我們樹立了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光輝榜樣。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將永遠銘記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在這舉世哀悼的悲痛時刻，我懷着對毛主席無限崇敬的心情，回憶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我的無比恩情。

我清楚地記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的抗美援朝的偉大號召，喚醒了我，激勵了我，使我一個無知少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為毛主席締造的人民軍隊的一名戰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攻讀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版」往事

您的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觀，沿着您指引的革命道路，永遠走下去，直到生命最後的一息。

我終生難忘：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我從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上解放出來，使我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拿起筆作刀槍，向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猛烈開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牢記您老人家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教導，堅決捍衛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誓與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的黨內資產階級鬥爭到底！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正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我們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等材料，撰寫批林批孔、批鄧、反擊有傾翻案風的戰鬥文章。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不管今後征途上有多少艱難曲折，有多少險風惡浪，我一定要繼承您老人家的遺志，把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實現奮鬥終生！

（原載《新北大》1976年9月16日）

當時我崇拜毛澤東，認為他是當代最偉大的人物，儘管「文革」初期，我受到衝擊，遭到批鬥，但是，隨着運動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發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論。我認為毛澤東知識淵博，文史哲造詣深，對中國革命有巨大貢獻，對世界亦有廣泛影響。他的逝世，猶如巨星殞落，令我悲痛不已。那篇悼文充分表達了我當時的思想和心情。

對《光明日報》的約稿，我卻興趣不大，因為此時我正準備赴波蘭工作，整天在學習英語，唸「九百句」。現在，李家寬既然找到頭上，那就寫吧。我便將此事告知兩位組員何芳川和陳先達，他們也是持「要寫就寫吧」的態度，不甚重視。不久，《光明日報》副總編輯孫關龍應約來到「梁效」駐地北招待所，與李家寬和我們小組的同志一起討論文章的主題。孫一開頭說：「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項重要指示，因為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將這句話用粗體字刊出。」我對此也深信不疑，早在八月份，我已從《人民日報》一位朋友那裏得知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點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汪波清、孫關龍在《光明日報》社對范達人、陳先達、何芳川等人談了對該文的要求。孫關龍說，我們理論部幾個同志研究了一下，這篇文章不對毛主席這一指示作解釋，而要歌頌「按既定方針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臣事

辦」這六個字的偉大意義，這六個字，字字千金，要歌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接着，孫關龍對文章的路子、內容提出了比較詳細的提綱：首先談談「按既定方針辦」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不僅管我們這一代、下一代，還要管世世代代。違背這一點，黨就變修，國就變色。然後談談為什麼必須「按既定方針辦」。回顧黨的歷史和國際共運史的經驗教訓。毛主席已經為我們制定了一整套方針，歌頌主席思想的偉大發展。違背就失敗，遵循則勝利。在社會主義時期，就是按黨的基本路線辦。再談談怎樣「按既定方針辦」。一是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二是加強黨的領導，堅定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當前，在國內要批鄧，在國際要堅持反對蘇美兩霸。最後要強調，不鬥爭就不能進步，要樹立必勝的信念。汪波清補充說，最有說服力的是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成果，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藍圖已繪好，問題是堅持「按既定方針辦」，而不是另想一套。過去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以後還是這樣，要鼓舞必勝的信念。孫關龍還談到國際共運史的經驗不太好寫，馬恩逝世後，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取得了革命勝利。斯大林逝世後，出了赫魯曉夫。汪波清說毛澤東思想現在深入人心，馬恩那時兩個人，現在八億人民掌握了馬克思主義。

「文革」御筆沉浮錄

「朱效」往事

在討論結束前，汪波清把師海雲找來，請他唸了一遍華國鋒在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其中傳達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指示。孫關龍和汪波清還給我們看了新華社內參關於對「按既定方針辦」的反應。

文章大意明確後，我對何芳川說：「你先起草，然後我們大家修改。」那時我只想盡快赴波，已經心不在焉。何說：「行，我起草」，並說：「這不是什麼大塊文章，幾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後，由我執筆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動，只作了一點非實質性的文字潤色。這篇文章便於九月二十四日左右定稿。經李家寬等人同意後送《光明日報》。九月三十日下午，遲群電話告李家寬：「我太忙，沒時間，那四篇稿子（包括〈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不看了。你們看了，可以發。」同日，《光明日報》排出清樣，讓我們再審一遍。清樣復審後立即退了回去。十月四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顯著位置予以發表。該文的標題是我起的。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就是如此，並非江青或遲群、謝靜宜授意。

粉碎「四人幫」後，工作組責令我們寫作組交代「四人幫」是如何授意寫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報刊文章把這篇文章定性為「篡黨奪權的動員令」、「矛頭指向華國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鋒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後來，上面還要《光明日報》總編輯莫艾和他的副手孫關龍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此事審查了多年，也沒查出「四人幫」與這篇文章有何直接關係。

當時，對我們施加壓力最大的莫過於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這位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一口咬定我們這篇文章的矛頭是針對他的。這就立即將我們置於反黨反革命的絕境。

據我所知，華國鋒，山西人，一九二一年生，一九三八年參加抗日游擊隊。一九四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六年擔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之後不久擔任中共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一歌便由此而來。一九五二年華任湖南湘潭縣委書記，不久升為中共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專員，一九五四年起為湘潭地委書記。一九五五年，華國鋒寫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和〈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澤東特邀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並介紹湘潭地區合作化運動的經驗。不久，華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長。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效」往事

一九五五年夏，華國鋒妥善地安排了毛澤東闊別三十二載的湘潭之行。一九五九年毛澤東親自提名華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三年十月，華寫了〈關於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毛澤東頗為欣賞，批示全黨克服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錯誤思想。一九六八年四月，華出任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成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林彪事件後，華到中央任公安部長。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他當選政治局委員。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五·四天安門事件」後，華國鋒成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顯然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毛澤東逝世後，華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項要職，權力如此集中，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無先例的。毛澤東曾多次誇獎華國鋒，說他是個老實人，不蠹。當時，我基於對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樣也信任和尊敬華國鋒，擁護他出任上述要職，絲毫沒有反華之心。甚至在修改〈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時，我還按照華國鋒所致悼詞的提法，作了變動，如第四段「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建立了第一支工農紅軍」。在文章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迹」莊事

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並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暴風雨中考察和鍛練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通稿時，我舉例說：「譬如華國鋒同志就是久經考驗的，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我擁護他還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對他呢。然而，外表敦厚的華國鋒卻武斷定性，置我等於死地。



當時傳言，毛澤東給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真言。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效」色事

華國鋒在這件事上，還玩了一次文字遊戲。「按既定方針辦」追根溯源，最早是由他向下傳達的，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他的講話後刊載在新華社《內參》上。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聯合發表社論，用粗體字刊出這句話。華國鋒對此並未提出異議。但到九月三十日，喬冠華在聯大的報告引用了這句話（據章含之在《我與喬冠華》一書中稱，事實上喬在作報告時已根據國內電示刪去了這句話，而《人民日報》發表時沒有刪去）之後，華國鋒則指出：「六個字，錯了三個字。不是「按既定方針辦」，而是「照過去方針辦」。更為可笑的是一些報刊文章硬說「按既定方針辦」是修正主義，而「照過去方針辦」是馬克思主義路線，兩者之間是有原則區別的云云。我看不出，想必一切思維正常的人也分辨不出這二者之間有何實質區別。連彭真後來都說，什麼按既定方針辦、照過去方針辦，咬文嚼字，這兩個有什麼區別！

人們從范碩所寫的〈「四人幫」覆滅記〉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政治鬥爭的端倪。該文稱「葉劍英等許多老革命家憂心如焚，正思考和醞釀着除害救國的戰略決策」。王震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軍，早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就常

「文革」御筆亂浮錄

「卷之」無事

在鄧小平、陳雲之間溝通消息，議論朝政，在此期間，王震還多次到葉劍英家裏密談。一次，王震問葉帥：「為什麼他們（指「四人幫」）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了嗎？」葉劍英不動聲色，只是做了一個打啞謎式的手勢。他伸出右手，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王震一下子怔住了。葉劍英向他點了點頭。王震想了想，終於領會了這個意思：「毛主席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已逝世，時機來到，華國鋒等人便將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作為粉碎「四人幫」的行動藉口。這就是歷史的真相。

觸景生情說挨鬥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正當我們在寫揭發、交代材料之際，歷史系一些教員和學生，一邊喊口號，一邊敲着鑼，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紅二樓下遊鬥李家寬、王世敏和魏銀秋。李家寬的脖頸上掛着「梁效」頭子的木牌，王世敏則掛有「江青的女狀元」字樣的牌子。魏銀秋因為來自八三四一部隊，因此，胸前牌子上寫的是「通天人物」。我在窗前看到樓下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文革」初期的一幕幕鬧劇。

那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大飯廳西牆上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指責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中央連夜派中共中央華北局李雪峰、國務院外辦張彥等人到北大處理此事。他們批評聶元梓等人違反了中央的規定，指出北大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務必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當時，我們在北京昌平縣太平莊北大分校搞教改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批鬥王光美（劉少奇的夫人）大會。圖為該校紅衛兵頭頭蒯大富在大會上講話。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試點即如何將大學辦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我聽到中央指示後，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太平莊歷史系駐地貼出一張大字報，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做法。陸廷恩和張元傑也在我的大字報上簽了名。不料，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突然全文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配有評論員文章，稱讚它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六月三日，歷史系在北大第一體育館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開始揪鬥系裏的大、小「黑幫」。會上，首先揪出的是黨總支書記徐華民，接着是黨總支委員吳代封、范達人、周一良、團總支書記趙德教和一些班主任及學生黨團幹部。吳代封可能沒有思想準備，在自報家門時竟說：「我叫徐華民，」惹得下邊群衆哄堂大笑。揪到周一良時，群衆中間出現了分歧。他的研究生沈仁安、葉昌綱等認為周一良是一位很好的老教授，對青年熱忱，不同意揪鬥他，另一部分人則堅持要揪鬥。經過一番爭論，周一良先生還是未能倖免。但是，他拒不低頭，認為自己一直忠心耿耿地聽黨的話，沒有什麼錯誤。在揪到我時，要我交代與彭佩雲的關係。因為，我在懷柔搞「四清」時，中途，歷史系將我調回負責學術批判。當時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的彭佩雲正在歷史系蹲點。一些人便以為我與彭佩雲有特殊關係。其實，我僅與她談過幾次話，一次，她向我問起一個人們認

「文革」御筆亂浮錄

「殺戮」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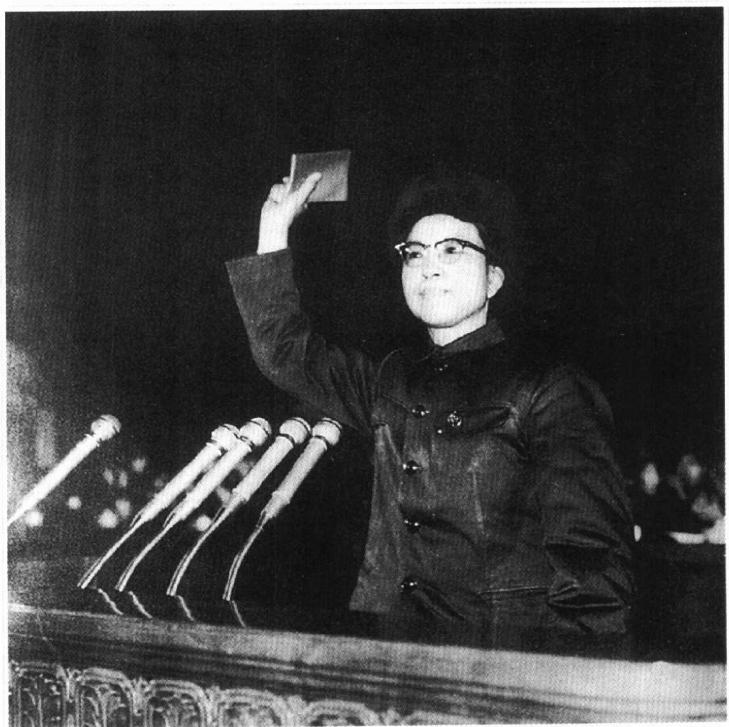
爲是資產階級小姐的女生的情況，我簡單爲她辯護了幾句。在我說到這些情況時，這位女生正在現場，她聞聲跳將起來，怒氣衝衝地吼斥我。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夜晚，北大歷史系一些學生突然湧入我的宿舍，把我揪到三十八樓台階上，往臉上抹墨，朝頭上扣紙簍，聲嘶力竭地批鬥我。當時羅織的罪名有：修正主義的苗子、國際飯店會議打手、反對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反動官僚子弟等等。六月十八日，北大各系揪出更多的「牛鬼蛇神」，不少教授、講師、助教和黨團幹部遭到遊鬥，整整一天，北大校園內慘不忍睹。**這就是有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我雖在六月十七日夜被揪出，但也劃入「六·一八」事件一類。後來，這次事件的性質翻來覆去，時而是革命的，時而又是反革命的。

又有一次，一些學生將歷史系二十來個「黑幫」揪到系所在地二院批鬥，其中一個學生給我剃了個「陰陽頭」，即在頭的中部剃出一個平道，這樣兩邊頭髮依然烏黑茂密，非常難看。當然，這在美國可能是一種時尚髮型。可是，在當時的中國卻是一種污辱人格的行爲。後來，造反派還強制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勞動，在烈日曝曬之下拔草。那時，全國千千萬萬來京串聯的紅衛兵首先要到北大看大字報，「取

「文革」御筆沉浮錄

「笑效」往事



在奪權過程中，江青、康生等人蓄意打倒一大批老幹部。圖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江青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發表煽動性講話。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經」，然後，將我們這些「另類」鬥爭一番。不明真相的紅衛兵常常對我這個「修正主義苗子」很有興趣，因此，我就常遭批鬥，有時還要挨拳打腳踢。一次出現險情，紅衛兵令我站在高牆沿上接受批鬥，此刻如有人稍稍一推，我便會摔得身殘致廢。

「文革」初期，北大批鬥名目繁多。由於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五月二十五日貼出的，因此，以後每月二十五日都要舉行慶祝活動，所謂慶祝，就是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再拉上台批鬥一番。一次，我和郝斌知道又要批鬥，便要了個花招，藉口要去印刷廠印毛主席的一些未發表的著作，溜了出來，躲進途中一家小飯館，磨蹭了幾小時，逃避了那場批鬥。事後聽說，批鬥者當時找不到我，便讓彭佩雲代勞，舉着「黑幫分子范達人」的牌子。

鑑於我有上述經歷，因此，當時的心情並不緊張。這一天似乎還講政策，並未把我揪出來，儘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較突出，罪名不謂不大。

可是，好景不長，過了兩天，突然有一幫北大理科的學生和年輕教員衝進我的房間，其中一位瘦瘦的年輕人是地球物理系的教員，此人我有點面熟，但不知其尊姓大名。就是這位教師向我吼道：「范達人，你出來！」這樣，在經歷了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茲」往事

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我再次被人揪鬥。十幾個人把我押到北大三角地附近，然後令我站在一張櫈子上。他們高呼口號：「范達人，必須老實交代！」要我交代怎樣反對華國鋒主席的，還質問我為什麼說華主席是修正主義頭子。口號聲、質問聲夾雜在一起，頗像「文革」初期的陣勢。我說我們的文章沒有反對華國鋒的意思。他們一聽更為惱火，厲聲訓斥：「你現在還不老實交代！」我爭辯道，文章中「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僅僅是泛泛而論，並無具體所指。那位青年教師大概覺得再這樣鬥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便讓我回去，繼續寫交代。

北大歷史系揪我回系鬥過幾次，既有大會，也有小會。有一次，在全系教職員參加的批鬥會上，我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的約稿、寫作、發表過程原原本本地陳述了一遍。此時，李開物突然衝上台來，看他那股勁頭，似乎要對我動武。他說我不老實，沒有低頭認罪。當即台下有人喊道：「李開物，不要這樣！」將他擋了回去。這位李開物何許人也？他是歷史系一位年近花甲的教員，曾因騙婚醜聞鬧得滿城風雨，弄得聲名狼藉，受過批判。粉碎「四人幫」後，他改名李革命。這次他大概想通過批鬥我撈一點政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治資本吧。

又有一次，一部分教職工把我拉到一個中型會上批鬥，還是要我交代罪行。一位黨支部委員問我在查封「梁效」後，對華主席粉碎「四人幫」這一決策是怎麼想的。顯然，其目的在於套出我的活思想，借機整我。我識破了他的企圖，立即答道：「我是擁護的。」聽後，他露出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

再有一次，我所在的單位世界史研究室對我進行批鬥。一進研究室，我看到滿屋子的人均已落座，自己也找了個位置坐下。一位副教授見此甚為不滿地嚷道：「拉你來交代，你得站在那兒，怎能若無其事地坐着，一點沒有認罪的樣子。」會上，大家提了很多問題，我均一一如實作答。當時，會場上攻得最兇的，要數一位講師。他說：「范達人，你要交代兩張圖。一張是形勢圖，就是你頭腦裏怎樣顛倒敵我，怎樣把周總理和華主席當作敵人進行攻擊的；另一張是升官圖，你是怎樣想當大官的。你不交代這二張圖，我們就不答應。」我原以為此人較為正直，殊不知，並非如此。

另外，還有一位助教在這次批鬥會上對我一路窮追不捨，在會場上充分發揮了主導作用。此人與我有宿怨。我們早在一九六五年國際飯店會議期間就有矛盾。一九六四年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迹」往事

「四清」運動開始後，以中宣部一位副部長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清思想、清政治、清隊伍、清經濟的「四清」運動。「四清」工作組進駐北大後，就把北大校、系二級領導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鬥爭。我們歷史系受到批判的是副系主任許師謙，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因為家有房產。許本人於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參加革命，後又去西南聯大攻讀並繼續從事革命工作，曾任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某縣縣長等職。對於鬥爭許，我心有抵觸，認為許在工作上、思想上雖有缺點，但不是敵人，不應像對待敵人那樣鬥爭他。因此，在會上我基本默不作聲，即便發言也力求實事求是。因而工作組對我不滿，視為消極分子。一九六五年初，中央開會專門研究了北大問題。毛澤東指出，陸平是好人犯錯誤。鄧小平、彭真等人均對北大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北大這個案便翻了過來。以聶元梓為代表的北大社教運動積極分子失利。形勢變化後，北大一部分幹部在國際飯店開了一個會，旨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我也參加了那次會議，為歷史系小組會議作記錄。上面提到的那位與我有積怨的人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四清」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在會上我批評了一些人的偏激言行，使在場的積極分子大為不滿。我那頂「國際飯店

「文革」御半沉浮錄

「梁效」往事

會議打手」的桂冠由此而得。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深化，他一度成為聶元梓的親信和歷史系造反派頭頭，而我則是「老保」；後來他成為清查對象，長期被迫勞動，而我卻是「梁效」的紅人。真是恩恩怨怨何時了。

在批鬥會行將結束時，我作了如下表態：「一、大家批判我是出於義憤，是可以理解的；二、我的確寫了許多文章，犯了錯誤；三、個別人對我抱有成見。」一些與會者聽到我的最後一點表態時，大為惱怒，訓斥我直到現在還影射攻擊他們。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仍抓住我那句話不放，大會批，小會鬥。

「文革」脚著流浮錄

「梁效」往事

一張難得的大字報

集中學習一段時間後，我突然感到寫作組內一名成員不敢正視我，好像有意迴避我。我估計他可能承受不了來勢兇猛的壓力。果不其然，過了些天，我們聽到了他的交代錄音。這位組員與我是北大歷史系同級同學，出身書香門第，爲人熱情，進取心強，能暴露思想，請大家幫助分析。大學畢業後，他將一篇文章的全部稿費作爲團費上繳，獲得人們稱讚。因此，學校召開團代會時，他當選爲團委委員。一度，他體弱生病，情緒低落，我便將自身患病經歷相告，鼓勵他與病魔鬥爭。「文革」初期，我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遭到揪鬥。在歷史系多數人反對「解放」我的形勢下，他敢於在考古專業兩位中年教師高明和呂遵鍔的小字報上簽名，支持解放我的呼聲。七十年代，鑒於他的才華，我舉薦他進入「梁效」，後又介紹他入黨。在「梁效」受審的特殊處境中，他有上述表現是可以理解的，我諒解了他。數年後，事過境遷，一次我們去頤和園漫步，圍繞昆明湖邊走邊聊，足足走了四、五個小時。談起審查期間那段往事，彼

「文革」御筆混浮錄

「絕版」色事

此都感慨萬千。

後來，清查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鬥爭逐步升級，從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開會學習和寫交代材料外，其餘時間無人看管。現在則不然，平時我不得隨意離開紅二樓。我的妻子受到牽連，突然從駐外使館被調回，清查組不許我去車站接她。寄養在南方親戚家的兒子返回北京，也不准去接站。後來，清查組寄希望於我的妻子，想通過她做工作，攻克我這個頑固堡壘，此時才准許我回家與親人見面。可是，過了一段日子，清查組大失所望，認為我並未交代出什麼要害問題，而態度甚至比以前更壞。於是，他們便醞釀對我進一步加壓升溫，採取新措施，即剝奪一切自由，實行隔離審查。當時，我不願自欺欺人，編造謊言，蒙混過關，求得所謂從寬處理，而是持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一九七七年三月，在全校批鬥大會上，北大革委會副主任黃辛白宣布對我和楊克明實行隔離審查。隨即，清查組派來兩個人進駐我的房間，實行二十四小時的監視。外出打開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許我與任何人交談，當然更不准回家。這種生活，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文革」初期，我早已嘗過箇中滋味，不難適應。唯周末不能回家與家人團聚，確使我難以平靜。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處」往事

隔離審查一段時間後，我認為該交代的問題均已和盤托出，再也寫不出什麼新內容，於是，便索性不再考慮此事，自學起英文。當時，身邊有兩本可供學英文的書：一本是英漢對照本《毛主席語錄》，另一本是英漢小辭典。我專心致志地學習起來，清查組未加干涉，因為他們不能剝奪我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權利，而那本英漢小辭典則是必備的工具書。負責監視我的兩人，一位是「二·七」車輛廠的老工人，另一位是工農兵學員。他們看到我學英文，心中儘管不快，但又不好當面發作，我也就去理會，照學不誤。

後來，有幸為我建立了一個專案組。組內有一位復員軍人、哲學系的年輕職員，他對我有時大喊大叫，吼上幾聲：「你為什麼不老實交代？」有時，又嘻皮笑臉地與我開幾句玩笑。他一看我自學英文，便也要跟我學習，偶爾，我教他幾句。據說為此他受到了批評，被調離專案組。幾年之後，我們再見面時，方知恢復高考後，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見到我，他笑着說：「我們把這帳都算在四人幫身上吧！」

上面感到我這個堡壘難以攻克，特地為我的專案組調進新人，增強兵力。其中一名是解放軍軍官，一位是白髮蒼蒼的中學校長。還有一位就是北大圖書館系剛畢業的工農兵學

「文革」御筆泥淳錄

「梁效」往事

員，後來，他長期擔任我的專案組長。此人年紀輕輕，學業如何難以評估，但整人術卻頗有一套，水平不低。他們軟硬兼施不斷地審問我，往往無甚收穫，因此，惱羞成怒，策劃對我實行更為嚴厲的打擊。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系某些人密切配合，內外呼應。魏杞文、劉祖熙、李開物等人特地在「梁效」受審樓內，貼出一牆大字報，洋洋數千言，對我進行全面系統的「揭發和剖析」，繪聲繪色地為我畫像。這實在是一張十分難得的大字報。我一字不漏地抄了下來，視為寶貴史料，妥加保存。專案組人員在大字報前得意地問我：「有何感想？」我沉默以對，心想還是留待後人評說吧！

下面就是這張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貼出的大字報全文：

大家都來看看這個偽君子

——評「梁效」骨幹分子范達人的表演

「梁效」骨幹分子范達人經遲群、謝靜宜和外交部王××的同意，正在準備出國，到波蘭去當一名中國外交官。然而，歷史同他們開了一次玩笑。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凌晨，「四人幫」的御用工具「梁效」即「北大、清華大批判組」

「文革」柳等沉浮錄

「梁效」往事

被查封了。人民解放軍把三十九名「學士」，從他們盤據了三年之久的一座別墅大樓裏趕了出來，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結束了范達人出國的黃櫻美夢。

可是，在查封「梁效」前三天（十月七日）發生了北大黨委書記王連龍向「梁效」頭頭通風報信的嚴重事件。這使「梁效」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們足足有三天時間訂立攻守同盟銷毀罪證和進行其他破壞活動，給北大的運動設置了許多障礙。在「四人幫」手下，「梁效」和北大黨委幾個重點人物的關係，無非是蜘蛛和蜘蛛網的關係。去年十月份，王連龍等人可以利用職權，背地搞鬼，為「梁效」的頭頭和骨幹分子「開後門」，現在呢？圍剿「四人幫」的戰鬥已經全面展開，他們只好另想辦法了。時至今日，王連龍等人還在裝蒜，「梁效」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包括范達人，還在玩弄花招，負隅頑抗。范達人過去緊跟「四人幫」像瘋狗一樣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攻擊敬愛的周總理，攻擊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是江青豢養的一名忠實走卒。今天，他不是認真揭發交代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改寫自己的臉譜，不厭其煩地表白自己「一貫」「熱愛」周總理，「擁護」華主席，對江青「早已不滿」，……。解剖一下范達人這個偽君子，可以看到北大某些重點人物今天的動向，對認識這場鬥爭的

「文革」御筆混浮錄

「梁效」往事

複雜性和艱巨性是有幫助的。

演正面角色總是不像

范達人何許人也？他是去年十月四日《光明日報》那篇反黨文章的一個炮製者，是這篇文章的定稿人之一。范達人和黨內走資派共謀連譖，充當反面角色，有過歷史紀錄，這一回故伎重演，一點也不奇怪。由於他的反動立場和善於投靠，在兩校大批判組，他當上了黨支部委員、寫作組組長，為「四人幫」賣命，犯下了許多罪行。兩個多月來，專案組的同志和歷史系的革命師生對他進行多次教育，他既不揭發問題，又不暴露思想，而且，極力美化自己，企圖蒙混過關。但是他扮演正面角色總是不像。范達人的這種表演，在「梁效」頭頭和骨幹分子中有一定代表性。他企圖用詭辯來製造一種虛假的「兩面」現象：我范達人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效勞，我擁護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按照這種邏輯，我們倒可以提出一個問題，范達人過去是一個兩面人物，今天，不是照樣可以扮演兩面派嗎？口頭上擁護華主席，骨子裏為「四人幫」唱讚歌，這種角色，對范達人不是更為自然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唯物主義者相信實踐。范達人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究竟是什麼角色，先看看他自己的實踐吧。范達人本事不大，野心不小，他文墨不精，但是對資產階級的官場哲學十分精通，對「四人幫」的黑旨意領會最快，貫徹最力。三年來，「梁效」總共發表了一百八十多篇黑文，在范達人的嚴密部署和督促之下，他這個組竟然炮製了三十多篇，其中以〈永遠按既定方針辦〉、〈孔丘其人〉、〈讀《鹽鐵論》〉、〈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最為反動。此外，范達人在「梁效」還參與了其他許多反黨活動。如果這些還不足以說明范達人扮演了什麼樣的政治角色，那就再看一看「四人幫」是怎樣對待范達人的吧！由於反黨有功，范達人深受「四人幫」賞識，江青帶着他竄天津，和他合影留念。在「四人幫」控制北大這些年，范達人依仗遲群，憑空竊取了「四屆人大」代表的稱號，參加國宴有他，出國訪問有他，小汽車出，小汽車進，在「梁效」三年多中，頭頭李家寬以下，他數第四位，無怪乎「梁效」的頭頭說范達人「有功」，遲群說，他是「老實人」，所謂「老實」，對主子俯首唯命而已。

在「四人幫」栽培之下范達人感恩戴德，慶幸自己「捲進了鬥爭的核心」，在他頭腦裏有兩副清晰的圖畫。范達人很清楚，周總理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是「四人幫」篡

「文革」御筆流浮錄

「梁效」往事

黨奪權的巨大障礙，為此，他不惜在許多文章裏，含沙射影，惡毒攻擊周總理和華主席；而在另一些文章裏，無恥吹捧江青，這是范達人腦子裏的政治形勢圖，也是他三年來在「梁效」每天都要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范達人把自己的命運和「四人幫」捆在一起，為他們篡黨奪權幹了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四人幫」的陰謀尚未得逞，他就忘乎所以，要求到波蘭去，在駐華沙使館充當其主子的一名代理人，這是范達人腦子裏的升官圖。

實踐證明：范達人是「四人幫」手下的一名爪牙，明明是反面小丑，偏偏要表演正面角色，想夾着尾巴滑過這場運動。北大的重點人物，至今還不醒悟者，大體和范達人差不多，以為只要偽裝一下，就可以「頂過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將來另找出路。不過，可以奉告范達人之流，廣大群眾決不會上這個當，千萬雙眼睛始終盯着你們，洞若觀火。

裝「書呆子」自欺欺人

范達人在「梁效」整整幹了三年，組織反黨文章，整理中央負責同志的黑材料，勁頭十足，越幹越「上路」，每一篇文章都是高喊「開展兩條路線鬥爭」、「要反擊復辟逆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流」，殺氣騰騰，為「四人幫」陰謀大效其勞，他自己也因此獲得了「尖刀班」班長的稱號。這個尖刀班長，現在變成了置身於階級鬥爭之外的「書呆子」，他在「梁效」的所作所為，似乎都和鬥爭沒有關係。這是范達人對抗運動的手法。

范達人是怎樣把自己扮成書呆子的呢？

手法之一，他用抽象的概念掩蓋自己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他胡說什麼〈永遠按既定方針辦〉這篇文章是根據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的一般規律寫出來的，不想針對任何人。范達人以為，用「一般規律」就可以欺騙群眾，為「四人幫」和他自己推卸罪責，這是辦不到的。這篇文章明明說：「走資派還在走，這個『走』的基本內容……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為此作者氣勢洶洶地提出警告：「在八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如果說，范達人在這裏是警告從陳獨秀到林彪這些歷史上的修正主義頭子，豈不是笑話。范達人所謂「一般規律」純屬藉口。中央早已指明，「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的一個大陰謀，范達人參與其事，不是什麼「歷史上的一般規律」，而是現實的反黨活動。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茲」往事

范達人手法之二是所謂「爲歷史而寫歷史」。在四屆人大以前的一段時間裏，「梁效」爲了配合江青的地下「組閣」和王洪文的惡人「告狀」。范達人一伙領受「四人幫」的黑旨意，炮製了許多影射攻擊、造謠誣陷周總理的文章，其中以〈孔丘其人〉、〈讀《鹽鐵論》〉等文最爲惡毒。〈孔丘其人〉一開頭就別有用心地說：「今天，徹底揭露孔丘的反動面目，對於識別王明、劉少奇、林彪這一類政治騙子，反擊開倒車、搞復辟的逆流，很有意義。」明眼人一看，作者寫孔丘，意在識別王明一類政治騙子，而這些政治騙子又都是歷史的垃圾，人們早已識別，作者猶恐言不及意，所以特別強調「今天」的「意義」，也就是「反擊」什麼「逆流」。這哪裏是批孔，這是射向無產階級的毒箭。

而今范達人揮舞着「爲歷史而寫歷史」的破旗，力圖爲自己辯護，胡說什麼「當初就是按歷史史實來寫，孔丘是什麼樣就成什麼樣」！？范達人果真如此嗎？如果他尊重歷史，真正做到「孔丘是什麼樣就寫成什麼樣」，那麼，孔老二的形象就應該是「四人幫」和他自己的一面鏡子，不是嗎：「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居高樓深院，或遊山玩水，「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吃得油光滿面，肥頭大耳，然後到處罵人，進行反革命活動，到處鑽營，陰謀篡黨奪權，想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當大官的時候，「乘桴於海」，想跑到國外去……最後，累若喪家之狗。范達人之流不敢照照這面歷史鏡子，而是偽造歷史。在〈孔丘其人〉一文中，他們從「四人幫」的反革命需要出發，渲染氣氛，捏造情節，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孔丘朝見魯君的時間，史書上有兩種記載：一說孔丘當年六十二歲，一說是七十一歲，范達人一伙選擇了七十一歲的說法，又捏造了「重病在牀」的情節，寫了一段包藏禍心的文字，「四人幫」對此特別叫好。〈孔丘其人〉剛出籠，江青就狂叫：「這篇文章寫得生龍活現」，姚文元也欣賞之至，立即在《紅旗》上發表，流毒國內外，影響極其惡劣。范達人充當「四人幫」的乏走狗，向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狂吠，主子嘉賞的時候，他得意忘形的醜態，難以描畫，今天，想搖尾巴逃脫，那也是辦不到的。

江青成立「梁效」，誇為「我的班子」，其目的就是為搞現實鬥爭，篡黨奪權。正因為「梁效」充當了「四人幫」的得力工具，所以，江青一再叫嚷：「我以有北大、清華而自豪。」資產階級的野心家決不會用高昂的代價豢養一批「書呆子」去空談什麼「一般規律」，「為歷史而寫歷史」。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漂亮外衣 漏洞百出

值得注意的是，粉碎「四人幫」的鬥爭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梁效」的反動面目已昭於天下，至此，范達人不但不認罪，痛改前非，反而給自己編造了一套「思想發展過程」。據說他在「梁效」三年，開始是「受騙上當」，中間對「四人幫」產生「懷疑」，最後是「不願幹，想走」。現在，頗有這樣一些人，過去為「四人幫」效勞，兢兢業業，橫行霸道，運動一來，他們就顯出可憐而無害的樣子，和范達人一樣，用好聽的詞句把自己裝扮起來。在廣大群衆真正發動起來，鬥爭比較尖銳的形勢下，這種偽裝是維持不了多久的。今天，范達人居然鐵着臉皮，硬把自己說成是「正人君子」，甚至比廣大群衆還高明一着，豈不可笑。看來，進一步解剖范達人這個偽君子，對認識學校某些重點人物是有好處的。

范達人編造的「思想發展過程」，是一件美麗的外衣，但漏洞百出，而且和他的本性不合。毛主席和魯迅教導說，從事物的過去看它的現在，也可分析它的將來。這就是我們認識范達人的基本方法。

范達人是有野心的。早在六十年代，當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削尖腦袋往上鑽。但因生性懶惰，華而不實，學習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成績和能力不好，加上父親又是國民黨的縣太爺，范達人沒有條件學外語，從俄語系捷語班轉到了歷史系。到歷史系以後，范達人整天圍着一個「愛吹不愛批」的領導轉來轉去，同班同學對他那種卑躬屈膝的醜態，無不嗤之以鼻，但走資派都很欣賞他，稱他為「我們的苗子」，定為歷史系領導的接班人。從此，范達人和群衆更加疏遠，和走資派更加親密，在北京大學社教運動中，充當了走資派反攻倒算的打手。奴才保皇有功，主子賜以「留學」，文化大革命前，范達人是準備出國留學的。誰知文化大革命風暴一來，留學告吹，去年十月的「歷史玩笑」，早在十年前已有預演。但范達人並沒有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面對急風暴雨的群衆運動，他裝模作樣，擠出幾滴眼淚，其實並沒有觸及靈魂。事過境遷，他就一頭紮進了「四人幫」的懷抱，懷着對文化大革命的怨恨之情，跟着正在走的走資派又幹了起來，而且幹得更起勁。范達人即使不鑽進「梁效」，也一定會在其他形勢下走上這條老路。他過去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苗子」，十年之後，又成了「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下的「尖子」，這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發展。

革命群衆在批判會上質問范達人：你「熱愛」周總理，為什麼阻止別人悼念周總理，而且炮製〈孔丘其人〉這類文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章？你「擁護」華主席，為什麼又能寫出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的那篇文章？你對「四人幫」有懷疑，甚至對江青不滿，為什麼一貫吹捧江青，炮製〈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為她搖旗吶喊？既然後來想離開「梁效」，為什麼越幹越起勁到十月四日還炮製〈永遠按既定方針辦〉？回答這些問題，范達人不是當面撒謊，就是張口結舌，矛盾百出，他那「思想發展過程」純屬虛構。我寫了〈孔丘其人〉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就是「熱愛」周總理，一貫「擁護」華主席，這就是范達人的邏輯。這說明，范達人這個長期騙人的偽君子今天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剝去畫皮 看看真相

剝開畫皮，揭露真相，讓大家來看看范達人的本來面目吧！他靈魂深處的東西，是他緊緊追隨「四人幫」的真實思想基礎。在「四人幫」看來，范達人和張鐵生這類人材都是好樣的。「四人幫」器重他們，一不是容易「上當受騙」，二不是他有什麼本事。看中了他們什麼呢？這要分析一下范達人有哪些與衆不同的特性，這些特性使他和「四人幫」結合得很好。

第一，范達人善於裝點自己。舉例如，范達人外文不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通，但在他的文章裏能夠引用三種不同外文的參考書，其實他一門也不通，轉抄過來，裝點自己，成為走資派送他出國留學的「根據」之一。去年，范達人要出國，有關部門調查他有何「專門著作」，他居然在登記表上把「史軍」寫的幾篇文章說成是自己的「專著」，其實「史軍」是一個集體，前後包括十多個同志，那幾篇文章也不過是評論性的文章，根本不是「專著」。弄虛作假，裝點自己，招搖撞騙，這原來是「四人幫」的作風，所以，范達人這樣做，他的上司一向欣賞。張鐵生不是弄虛做假嗎？江青說他是「又紅又專」，范達人也搞這套，遲群就指定他當「四屆人大代表」，何足為怪！

第二，范達人善於逢迎拉扯。在「梁效」期間，范達人經常要對他周圍的人進行調查：「遲群對我的印象怎樣？李家寬對我的印象怎樣？」他十分明白，「四人幫」對他的印象怎樣，他的前途也就會怎樣？主子對他的印象怎樣？這個問題就成了范達人的一塊心病。如果不是積極投靠，何必這樣「惶惶如也」？為了給「四人幫」一個「好印象」，范達人當然不會放過機會，表白自己，去年八月，江青竄到「梁效」，范達人趁「合影留念」機會俯首貼耳向江青說：「江青同志，我和李訥是同學。」其實，李訥何曾知道有一個范

「文革」御筆流傳錄

「梁效」往事

達人，如此拉拉扯扯，無非要資產階級野心家對范達人有個「印象」，好為自己的前程開路。就在這個八月，范達人所謂「不願意幹了」的時候，他還無恥吹捧江青，說什麼「首長經得起風浪」，使他「很受教育」。可見，范達人對「四人幫」不但沒有「懷疑」，而且是深信不疑，積極投靠。這是「四人幫」極為讚賞的。

第三，范達人精於計算。去年九月，范達人的確要離開「梁效」了。為什麼想離開？要和「四人幫」一刀兩斷嗎？要去參加勞動、改造思想嗎？否。范達人在北大二十餘年，憑着他和某些領導人的不正常關係，二十多年來，他沒有下放勞動過一次。他這個「特殊人物」決不會自覺要求到「五七」幹校勞動。他要離開「梁效」，是想到波蘭去，找一個在他看來更有希望、更安逸的地位去。凡是了解范達人的同志，一見到他，自然而然會想到下面這些話：他「面帶三分笑」，「不建言，不批評，不置可否」，而內心呢，他是「腹有良謀」的。總之，表面上不說，肚子裏算盤卻撥得響，打得精。這次要求出國，就是他精於計算的最好說明。這當然是一個通盤的計算。到波蘭當一名外交官，「四人幫」陰謀得逞，他是「功臣」；「四人幫」一時不能得逞，他是「人民代表」。當然，范達人絕沒有想到「四人幫」會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徹底完蛋，他的如意算盤完全落空。遲群為什麼會允許「梁效」的一員幹將出國，這可以用遲群自己的話來回答。兩年前（七四年十二月），遲群曾經對「梁效」的一些成員說，「四人幫」要從這裏（指「梁效」）「鍛練出一支隊伍來」。經過這兩年，在遲群看來，范達人已經是「四人幫」體系中的一個堅定成員，可以「獨當一面」了。所以，他不但同意范達人離開「梁效」出國，而且，還為他出國施加了影響，花了力氣。范達人把自己「要離開」，說成是對「四人幫」的「不滿」，恬不知恥！無論從政治上、業務上、能力上，范達人都不合出國條件，而外交部王明修居然同意，此中有何奧妙，值得研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范達人善於領會主子意圖，拚命貫徹主子的意圖。為「四人幫」大造反革命輿論，不遺餘力。這是「四人幫」欣賞他的最根本之點。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籠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集中反映了范達人這方面的特性。夢想當皇帝的江青在「梁效」面前多次自比武則天，吹捧武則天。七四年六月十四，江青和「梁效」骨幹分子座談，大叫大嚷「武則天得人心」，「為什麼女的不能當皇帝」，同年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江青帶着「梁效」骨幹分子上天津，她叫嚷：「我在政治局是單幹戶，政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權男人一把抓！」，「女同志可以當領導嗎！歷史上就有個武則天」。有一次江青更為露骨地說：「我能力比不上武則天，但我的階級比武則天先進。」這幾次談話，范達人都在場，都洗耳恭聽。用他自己的話說：「首長（江青）的每一個指示，我都要塞到文章裏去。」江青關於武則天的談話，他聽在耳裏，記在心頭，回京以後不久，由他親筆起稿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就出籠了，范達人在文章中無恥吹捧「明王、聖后」，「法家女皇」，鼓吹女人當皇帝，「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是為江青登基座殿大造反革命輿論。可見，范達人對其主子的意圖領會得快，執行堅決。正因為如此，他成為「四人幫」和遲群、謝靜宜十分器重的人物。儘管范達人知識淺薄，虛有其表，但這無關大局，重要的是領會黑旨意，貫徹黑旨意。他常常對他的下屬成員施加壓力，板着面孔說：「我們在這裏不能吃乾飯」，擺出一副二掌櫃的架勢，催逼他的組員不分日夜炮製上面指示下來的反黨文章。這些文章寫出以後，經范達人修改，畫龍點睛，審查定稿，然後由他拿去討好領賞，這哪裏「上當受騙」、「不願意幹」！

從范達人與眾不同的特性可以看出，他為「四人幫」效勞是自覺的。范達人無恥吹捧江青，必然反對毛主席的革命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路線，反對周總理，反對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這是事實，也是階級鬥爭的邏輯，是他一貫立場所表現的兩個方面。范達人爲自己編造的「思想發展過程」絲毫掩蓋不了他那醜惡的靈魂。

今天，我們將范達人這個偽君子當衆予以揭穿，一是警告范達人自己，不要再偽裝下去，自欺欺人，唯有老實交待，低頭認罪，才是出路。同時，也爲了擦亮眼睛，以便把粉碎「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大字報全文完）

「梁效」當紅時，不少人對我們竭盡攀附、吹捧之能事，粉碎「四人幫」後，「梁效」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於是，一些人將我們視爲「牛鬼蛇神」，避之唯恐不及，趕緊與我們劃清界線；惡劣一點的則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梁效」成員的家屬均程度不同地受到株連，有的配偶被發配邊疆，有的長期賦閑，有的子女的升學和婚戀受到影響。不過，也不乏信任、理解、同情和關心我們的人。在這方面，我自己就深有體會。

首先，要說說我的親人。在受隔離審查期間，有一天，我的妻子和兒子拎着一些食品和水果到北大來探視。按專案組規定，我們是不能見面的。他們進紅二樓後便到處尋找專

「文革」脚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案組人員。不意我們在走廊相遇，相互笑笑，他們隨手把東西交給了我。此刻，專案組人員突然出現，厲聲責問我妻：「你為什麼要與他見面？為什麼不把東西交給我們？」其實我們僅僅打了個招面，未曾說上一句話。不過，勿庸諱言，即使這種無言的會見，對我所起的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它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當時，食欲不振，家中帶來的姜芽菜味美可口，十分開胃。每當我吃到它時，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可惜，未等消受完，我就被押解入獄了。

在朋友之中，孫立孝堪稱患難知己。他是我在浙江紹興蕺山中學的同級同學，是我中學時代三個好友之一。當時，我們四人在班上年齡較小，功課較好，均獲得過獎學金。我們曾於一九四八年合影留念，照片上題着「精誠友恭」四個字，彼此情同手足。一九五五年，我從部隊復員回到紹興，那時，雙親均已病故，我無家可歸。此時，好友孫立孝伸出了熱情之手，邀我住到他家。立孝之父、我中學的美術老師孫效謹和師母魯吉仙為此專門租了一套較大的房子，為我安排了一個單間，供學習和休息用，準備高考。平時，家中只有師母和我兩人。她是街道縫紉廠廠長，為人熱情，心地善良，雖有四子，但視我仍如同己出。鑑於我當時身體比較虛弱，她對我特別關照，經常採購一些價廉物美的食品，精心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放」往事

烹調，使我增強體力，早日康復。由於立孝與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使他受到牽連，幾乎被打成「四人幫」在該地區的代理人。他頂住壓力，始終未作不符實情的揭發、交代。

還有兩人令我難忘，他們就是我的學生、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岳升及妻子。他原為北京南口二·七車輛廠工人。其妻劉桂蘭是北京一鞋帶廠工人。他們夫婦兩人在受隔離審查以至後來關進大牢監護審查期間，經常到我家看望家屬。當時，由於我的問題，門可羅雀，可是，他們卻仍然一如既往，無所畏懼。為什麼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呢？主要是基於長期的接觸和了解，他們對我這個人有一個基本的評估。岳升在北大上學期間，他父親患中風偏癱症，由於我會針灸，幾乎每星期日，都去他家為其父治病，分文不取，這樣無償的服務持續了一年多之久。因此，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岳升的妻子劉桂蘭就此事特地致函北大歷史系，表揚我的行為。北大歷史系將此信抄成大字報，張貼在外，以示表彰。

再有，一些鄰居重情義、不勢利的情操也使我感動之至。聽說，一位鄰居的女兒在家中談論到我時，大聲嚷道：「范叔叔不是壞人！」這是一句極為普通的評語，但在我已被打入「另冊」的情況下，敢於堅持這種看法，實在是難能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述」往事

可貴。

即使在專案組內也有通情達理的人。在我受隔離審查期間，一位專案人員不畏風險主動向我表示：「今天我值班，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心領了他的好意，而不願給他添麻煩，沒有乘機回家。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真是人間仍有溫情在。

從嚴發落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全校揭批「四人幫」及其篡黨奪權急先鋒「梁效」罪行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除北大師生員工外，還有國務院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三十二個單位的代表。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少說也在萬人以上。首都體育館的主要設計者和建築師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傳中戲稱其弟為兄建造了「恥辱柱」與「審判台」。

中午，「梁效」全體成員被拉到北大圖書館前的廣場上，然後，大會組織者下令，從中挑出十五名左右「梁效」骨幹，等候批鬥。鄙人榮佔首席，第二名是鍾哲民，後邊如何排列，難道其詳，因為禁止我們東張西望。樂黛雲在其自傳中說，發現她的丈夫湯一介站在第四位上。這十五名骨幹基本上是「梁效」組長以上成員，外加我們寫作小組的兩名成員何芳川和陳先達。進入會場後，我們十五名「梁效」骨幹低着頭，排成一字形站在體育館中央示衆。據說，台上還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站着遲群、謝靜宜、王連龍、魏銀秋、郭宗林、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這次大會的重點，實際上是對我——「梁效」骨幹分子，進行批鬥，作為從嚴發落的典型，玩弄殺雞儆猴術。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北大》校刊報導：「×××同志嚴厲批判了范達人賣身投靠『四人幫』，炮製大量反黨黑文，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鄧副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惡行徑，並鑒於范達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的實際情況，強烈要求從嚴處理。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師生員工的堅決支持。」

隨後，黨委副書記韋明代表校黨委宣布決定：「范達人在隔離審查期間，堅持反動立場，拒不老實交代反黨陰謀活動，經北京市委批准，決定范達人由公安機關監護審查。」

此次大會還宣布對一名「梁效」成員從寬處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學的老教授，到「梁效」沒有幾天，專做詩詞註釋，沒有任何問題，將他作為從寬對象，實在是荒唐可笑。

這樣，這次萬人大會，又稱之為體現黨的政策的寬嚴大會。

寬嚴決定宣布後，立即出來兩名制服畢挺、神情嚴肅的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效」趣事

警察，一左一右站在我的身旁。我慢慢地向外走，警察不耐煩地催促着：「快走，快走。」此刻，會場上「打倒范達人！」「打倒范達人！」的口號此起彼落，在大廳中久久迴盪。就這樣，我在萬人大會上，在全校師生員工面前，在許多學校和各界代表面前，由公安人員押解出會場。

這次寬嚴大會，以對我從嚴發落，顯示北大揭批「四人幫」取得了重大勝利，同時，也標誌北大揭批「四人幫」運動告一段落。將我嚴懲之後，大家就歡歡喜喜回家除舊迎新過年去了。

可是，我的家屬對上述這一切卻一無所知。一九七八年初，我的妻子到北大來探望時，聽到的是我已受到從嚴處理的消息。她詢問我的下落，專案組人員拒不作答。

儘管「文革」初期，我多次挨批挨鬥，但那是群衆的自發行為，而今的萬人批鬥和從嚴處理卻是組織的正式決定，且聲勢之大遠遠超過以往，對我的壓力則可想而知。不過，我並不緊張，因為事前已有不少預兆，我已料到厄運即將來臨。一位專案組人員曾警告我：「你若堅持不承認反對周總理和華主席，那麼，對你的審查將要升級，到那時你後悔莫及。」我隱約地感到他們可能要把我關押起來，如同對待宋柏年那樣。接着，負責其他專案的一位工農兵學員悄悄地向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效」往事

我表示：「你有什麼事情要對家裏人說嗎？我可代為轉告。」他還透露，可能會對我採取某種措施。這位學員在我處於逆境的情況下，不畏風險，對我表示同情，使我深受感動。他的好意，至今我銘記在心。此外，還有一個信號：每日晨，我圍繞未名湖跑步，以活動筋骨。一天，我跑步時，碰到了歷史系的一位教員。他驚奇地問：「你現在還跑步啊？」從他的語氣中透露出我將大難臨頭。

雖然我已明白清查者的意圖，但我仍然不願仿效他人，胡編亂造，苟且偷生，只想實事求是，實話實說。由於不肯違背良心，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喪失自由達一年零十九天。

我出獄後，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萬人批鬥大會上，對我進行系統揭發和批鬥的×××當面向我表示歉意。據說，當時北大黨委要歷史系出一人在大會上發言，互相推來推去，最後找到了他。這位大會發言人到專案組看了我的材料，認為現在材料不過硬，不足以說明我問題的性質，而黨委領導卻鼓動他：「這事由黨委負責，你就這樣發言吧！」

說到當時的北大黨委，這裏我只想順便談談一位副書記。因為其他黨委成員的情況，我不甚了了。他原是中央團校負責人，後調任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長，粉碎「四人幫」後，負責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極力按照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定下的基調，向我們施加壓力，令我們老實交代。一次在俄文樓召開的對「梁效」成員訓話會上，他厲聲吼道：「范達人，你那篇文章（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如果貼到天安門廣場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會被抓起來！」後來又在一次會上，他指責我們歪曲歷史，說什麼「史書上明明記載擁護武則天的人只有八千，你們為什麼要寫六萬人？」當時，我心想是你把史實記錯了。對他的訓斥，我均沉默以對。

一九七九年，我出獄後，曾為我問題的性質一事找過他，一進客廳，見他正在閱讀《資治通鑑》。他看到我，顯得非常熱情，說了一番頗為通情達理的話。他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華，進入「梁效」是由當時的組織上調去的，不要揹包袱，好好工作，努力發揮作用。若干年後，他已到中央某一單位任職，一次遊覽長城時，與北大社會學系的學生不期相遇，當得知其中有我的兒子時，態度十分親切。這位副書記對「梁效」成員的態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變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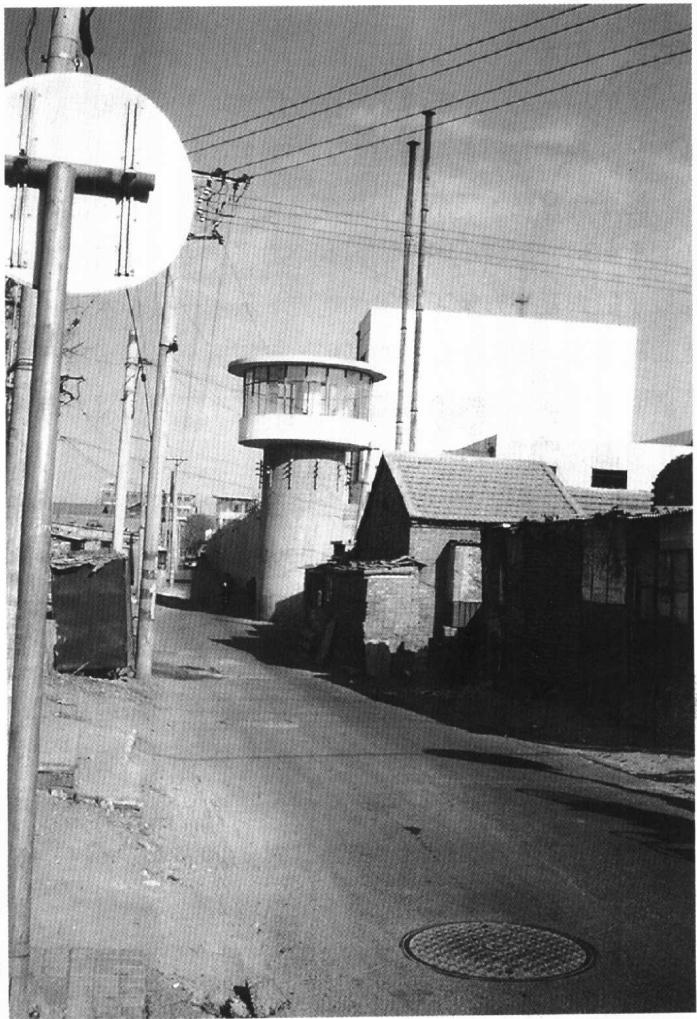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鐵窗風光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夜色已降臨，我在公安人員押解下，走出首都體育館，上了一輛囚車，坐到長橈上。此時，車內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專案組長。由於好奇心驅使，我抬頭向車窗外張望，公安人員厲聲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車內地上。約半小時後，囚車在一座舊式建築物前停了下來。大門傳達室值班人員首先收繳了我的手錶、鑰匙、人民幣和糧票等隨身物品，然後，由一名牢卒領着我往裏走。他打開一扇又一扇鐵門，陰氣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後來進入一個過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詢問值班人員，究竟將我關在哪個號子。此時，一名剃着光頭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號子前，我問他，這是什麼地方。「半步橋監獄，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聲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聲，弄清了自己現在到了何處。這兒對我並不陌生，五十年代，我上大學時，學校曾組織我們來此參觀過，但是，怎麼也沒有料到二十多年後，我自己竟會在此充當階下囚。半步橋監獄位於北京城西

「文革」御筆沉浮錄
「桀效」往事



半步橋監獄——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南方位，與陶然亭公園相距不遠。這是一座 K 字形狀的建築，人們稱它為「K字樓」。據說按國際上有關規定，戰爭期間，交戰雙方均不得轟炸對方符號形的建築物。

過了一會兒，牢卒又帶我往裏走，一直向前，然後帶進一間小牢房。這個小號子約有九平方米。由木板釘成的大統鋪幾乎佔去五平方米，其餘的地方，放着一張小木桌和一個上面覆蓋着一塊骯髒白布的馬桶。牢窗既小又高，牢門中央有個監視小孔，牢門上方懸着一盞明燈，牢卒可以不時地窺視牢房內的動靜。

由於我從首都體育館批鬥會場直接被押解而來，隨身僅穿了一套棉衣褲，既無洗漱用具，更沒有被褥鋪蓋。大約晚八時左右，牢門打開了，牢卒給我扔進來兩床棉被，白被裏，黑被面，全新，從未用過。不過，黑被面上印着兩個醒目的白字：囚被，特別刺眼，使人不寒而慄。難道我真的成了囚嗎？同號的兩個犯人與我的心情截然不同，他們一看見新被，立刻驚呼：「這是兩床新被，一鋪一蓋，真好！」這一夜，我雖然鋪蓋着新被，但是轉輾反側，徹夜未眠。門口那盞燈光一直照射着我的雙眼。按獄規，犯人睡覺時，頭要靠近門，這樣便於牢卒監視。當燈光直射雙眼時，即便躺在舒適的臥榻上也難以入睡，何況如今我又是入獄後的第一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食」往事

夜。此刻，我左右兩側的犯人均已進入夢鄉，他們大概早已習以為常。次日傍晚，監獄隊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原來是專案組倒挺關心我的，把我的衣服、被褥、洗漱用具等一併送來了。我把這些東西拿回牢房，然後把兩條囚被還給了獄方。我不再蓋那條隨時提醒我身份和處境、深深刺痛我的囚被，心裏稍稍好受些，第二夜，才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

囚犯平時在小號子裏解手，每日僅早晚兩次放茅，而且每間牢房只准停留五分鐘，時間一到，鈴聲響起，犯人就得立即返回牢房。可是，要在五分鐘內解完大便確非易事，如果未能辦完這樁「公務」，那麼就要回到小號子裏完成。小小牢房裏，本已空氣污濁，若再有人「辦公」，散發濃烈臭味，則會招來同牢犯人的譴責，使自己處於一種狼狽境地。因此，幾乎每個犯人都學會了在五分鐘內迅速解完大便的特技，大便前先運好氣，一到廁所，便能立即順利地了事。可是，這項技能並非一日之功。

按理，監獄應每天給犯人放一次風，使他們能在空場上轉轉，吸收一點新鮮空氣，活動一下筋骨，以確保犯人的健康。可是，我在半步橋拘留所呆了一年零十九天，放風的次數，累計起來不到十次。有時一連數月不放風，根本無視犯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人死活。所以，一旦有放風的機會，犯人們均視為恩典，興高采烈，爭先恐後擁向風場。風場四周高牆林立，中間有塊空地。這裏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犯人們可以得到外界很不稀罕、而獄中最為缺少的兩件無價之寶——新鮮空氣和陽光。放風，一般只有二十分鐘，時間一到，犯人就得返回牢房。在牢房內，我有時能看到一些犯人在幹泥瓦活或搬運東西，儘管他們幹的是繁重體力勞動，但仍令我羨慕不已。因為他們可以在溫暖的陽光中自由地呼吸，比起我們三個人擠在一個斗室中，整天直挺挺地端坐着，勝過百倍。

在我的小號子裏，有一套《毛澤東選集》和一份《人民日報》，這些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糧。每日我只能在上午九點至十點這段時間內讀報和看《毛選》。因為，只有此時我才能借助牢房窗口透進來的光線，看清報上的小字，其餘時間光度不夠，無法閱讀。我就靠每天這一小時，從報上的字裏行間，了解社會上的動向。一次，我看到《人民日報》摘要轉載了《歷史研究》一篇文章，十分氣憤。它歪曲事實，無端攻擊一位老教授的史學論文旨在為篡黨奪權效勞。他的文風與革命大批判的文章如出一轍，可見這位作者也是「文革」文風的受害者。

初進監獄那晚，正當我與左右兩個犯人默默地呆坐着

「文革」獄筆沉浮錄

「絕食」往事

時，從門窗口塞進來兩個窩窩頭和幾片鹹菜，這就是我的晚餐。如何吃得下去呢？此刻，即使擺在面前的是山珍海味，恐怕也難以下咽，更何況是典型的牢飯呢。我一向注重營養，關心健康，即使在隔離審查期間，也一直選買最好、最可口的飯菜，從不吃窩窩頭、鹹菜之類的食品。次日晨，牢卒給我送來了早餐：一個饅頭、一碗稀飯和一個鴨蛋，這與同牢兩人的窩窩頭、鹹菜大不相同。據說，專案組考慮到我的飯量大，吃得多，為照顧我，改為病號飯，每月十八元的標準。所謂病號飯，即主食為米飯、饅頭，副食中有一點肉。偶而也吃點窩窩頭，這可能與專案組為了施壓，迫我交代問題有關。病號飯算是我享受的一項特殊待遇。此外，獄戶給我一隻熱水瓶，平時就可喝到開水，用點熱水，而其他犯人是沒有專用熱水瓶的。再有，獄方未給我剃光頭，仍然允許保留原先的髮型。這些就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監獄隊長常以此來論證我與犯人不同，屬「監護審查」，還算內部矛盾，尚未上升到「敵我矛盾」。然而，事實是我這個還算內部矛盾的監護審查對象卻與殺人犯、貪污犯、強姦犯、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同榻而卧，與他們一起坐牢，喪失一切自由。尤為令人氣憤的是他們為我拍攝了囚照。一天，監獄隊長把我叫到一間空房內，在我的脖頸上掛了個寫有范達人三

「文革」御筆沉浮錄

「榮茲」趣事

個字的牌子，拍下了一張囚照，作為在此關押的憑證。滑稽可笑的是，此時我還保留着公職和中共黨籍，每月妻子到北京大學代我領取工資和交納黨費。這種奇怪的邏輯，實在令人費解。

在我的小號子裏，已有兩名犯人關着，其中一人名叫王振華，六十多歲，房山縣農民。他是一個會道門頭子。「文革」期間，村裏兩派發生爭鬥，便拿他來開刀，誣為幕後挑動者，稀裏糊塗地把他關進了監獄。實際上，老頭與兩派鬥爭毫無關係，他的會道門問題也早已作過結論，後來一直奉公守法。他氣功修練達到較高水平，有時給我指點傳授，我常向他請教，得益良多。老漢在押已兩年有餘，學會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但每當談起兒子和兒媳杳無音訊時，他便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過了些日子，我們的小號子裏又來了一名犯人。他是個重罪犯，戴着腳鐐手銬，一舉一動發出刺耳的響聲，陡然增加了我們這間牢房的恐怖氣氛。我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按照獄規，犯人之間相互是不能詢問案情的，但這種規定形同虛設，很難想像，三個犯人同在一間窄小牢房內，整天呆坐在一起，互相不交談幾句。他說，原是個木匠，與人發生口角，進而上升為惡鬥，一氣之下，舉起斧頭將對方

「文革」御警流傳錄

「絕命」往事

砍死。這就是說，他是一個殺人犯。後來還聽說，他將死者衣袋內的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所以，人們說此號是謀財害命的殺人犯。我與這個殺人犯同睡一牢舖約一個月。後來，我們牢房內又來了一個新犯人。這人年紀很輕，「文革」初期是一名中學生，紅衛兵。其父曾留學蘇聯，其母是俄國人，他具有混血兒的特徵，雖然身材不高，但卻長着深凹的眼窩和高挺的鼻樑。他洋洋得意地向我講述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一言以蔽之：他打、砸、搶、姦、殺，無惡不作。這位「小將」在此關押一個月後也走了，據說去服刑了。

之後，又進來一個流氓頭子。此人曾在馬戲團工作過，會點武功拳術。他甚至向我炫耀在與人格鬥中，如何挖出對方的眼珠。最後進入我這間牢房的是一個貪污犯。其父是北京某郊區縣的副縣長，本人是做經濟工作的，主要罪行是受賄。據說，北京有名飯館的美味佳餚，他都品嚐過。說起五花八門的菜譜時，他猶如一個具有多年經驗的烹飪大師。

以上幾名，都是我的同號「獄友」。從這裏，人們不難看出，我的「監護審查」究竟意味着什麼？

後來，我發現在這個監獄裏還關押着北大其他一些人。原北大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孫蓬一就在我的隔壁，我聽到了他

「文革」柳華沉浮錄 「絕效」往事

與同牢犯人吵架的聲音。星期日，犯人可以洗衣服，洗完之後，一個個牢房按順序拿出去晾曬。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間北京大學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聶元梓。此時的她頭髮花白，行動遲緩，昔日「光采」蕩然無存。我從牢房的小孔中，還看見過北京市中學紅衛兵的頭頭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頭，時不時與牢卒爭吵。看到獄中有這麼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喪情緒稍稍減緩，我的心情也逐漸平靜下來。

在獄期間，我還參加過幾次「寬嚴大會」。我們當然不能去現場，而是在各自的牢房內收聽實況轉播。這種大會對一些所謂表現好的犯人減刑或提前釋放；對一些越獄犯人則加重判刑。每次「寬嚴大會」前，牢卒先訓話：「你們坐好了，好好聽！」我們就直挺挺地端坐坑沿上，洗耳恭聽「寬嚴大會」的宣判。

一九七七年底，為什麼決定對我從嚴處理，實行「監護審查」呢？為什麼要拿我開刀呢？對這個問題，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出獄後，我才慢慢地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來是審查「梁效」一年多，未找到真正過硬的反對周總理、反對華國鋒的材料，缺乏足夠的證據為「梁效」定案定罪。這時，上面傳下話來：北大的問題沒揭開，主要是「梁效」的問題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沒揭開。清查者認為，關鍵是我們這些「梁效」骨幹分子沒有如實交代陰謀詭計，因此決定拿我開刀，打破缺口，進一步揭開「梁效」的蓋子。在清查者看來，我是一個關鍵人物，起草過不少文章。在我參與起草的三十四篇文章中，後被定為「擾亂全國」的文章就有多篇。但是，在我的交代中，始終沒有令他們滿意的內容，因此，他們便決定對我採取嚴厲措施。據說，當時清查者曾警告「梁效」成員：「你們要以范達人為鑒，考慮考慮，交代不交代問題。」

我入獄後，他們便集中火力對我進行猛攻。專案組人員幾次三番到監獄來，對我軟硬兼施，威逼詐誘，無所不用其極，迫我承認反對周總理，反對華國鋒。有一次，他們將我拉到公安局的審訊大廳裏，我的專案組長等人坐在審判席上，令我坐在犯人的受審席上，搞模擬審判的把戲，製造恐怖氣氛，迫我交代。他們還威脅說：「如果你不交代，還要對你採取其他措施。」據我了解，所謂其他措施，無非就是上銬。銬分前銬、背銬、弓銬、腳銬等等，無論哪一種銬，都使人無法睡眠，難以進食，痛苦不堪。

聽說在我進牢房前幾小時，臨時從其他號子裏調來兩個犯人，要他們對我加以監視，以防自殺。進入監獄後，我雖然心灰意冷，但尚無輕生念頭。其實，在獄中要自盡亦非易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事，因為一切利器早已收繳。晚上睡覺前，連犯人戴的近視眼鏡和老花鏡均要放在牢房門外，以防犯人用玻璃碎片切割血管自尋短見。

我經常默誦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亞囚徒〉：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也不要哭泣！
在陰鬱的日子裏，
須要的是鎮靜：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必將來臨。

心兒永遠向往着未來，
而現在卻常是憂鬱：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將過去。
而過去了的，
將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這一滿懷深情、富蘊哲理的詩篇，給了我力量、信心和希望。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命」往事

在獄中每當夜深人靜時，我常常想到親人。患難與共的妻子由於我的問題，再次受到株連，使我深為內疚。每當回憶起與兒子范軍的一段對話，更使我悲從心來。那時，他剛從南方姨母家返回北京，關切地問道：「爸爸，你什麼時候再回來？」我說：「下一階段可能要隔離審查，恐怕回不來了。」他緊接着又問：「九月十一日是我的生日，你能不能回來？」「不知道。」我雖然這麼說，但心裏仍抱希望，總想盡量滿足孩子這一小小的要求。結果，事與願違，我失去了一切自由。更慘的是，在坐牢期間，我的妻子每月要到北大領取工資和繳納黨費，由於家居建國門外，與北大相距很遠，擠車往返一趟，需要三、四小時之久。一次，她回家較晚，我的兒子就在陽台上遙望着遠方，等候媽媽歸來。那天很冷，他一連數小時在室外受寒，引發了哮喘，病了一場。

在押期間，我與親屬、與外界失去任何聯繫。我的妻子曾問專案人員：「他在哪裏？我們要去看看他。」得到的是冷漠無情的回答：「暫時不能看。」這一「暫時」竟是一年零十九天。

一年多的鐵窗生涯，是我一生中一段難忘的經歷，它使我清醒，使我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真可謂受益匪淺。

走出大牆

約一九七八年秋，我發現《人民日報》不斷強調要團結大多數，要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專案組人員也不再來逼供。與此同時，經常與我談話的監獄隊長說話口氣，也比以往友善些。鑑於上述跡象，我隱隱約約地預感到還有出獄的可能。當時，我首先想到的是，萬一有一天放我出去，我那些東西怎麼拿呢？於是，我將自己一條軍綠色棉毯縫成一個長長的口袋，足以裝進我的全部家當。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好笑，怎麼首先想到的竟是這樣一個無足輕重而又非常實際的問題呢。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下午，監獄隊長突然告訴我：「你把東西收拾好。」我趕緊把所有的東西：衣服、被褥、臉盆、洗漱用具和紙筆等一並裝進我那隻自製的長口袋內，扛着這個約有兩米長的怪袋，走進隊長辦公室。這時，我的那位專案組長和北大保衛處一名幹部已在那裏等着。他們見到我，一言不發，領着我穿過一道道鐵門往外走。此刻，我立即意識到可能出獄。一直走到半步橋監獄門口，值班人員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錢」往事

退還入獄時扣留的東西後，我的專案組長才客氣地表示：「我幫你一起扛吧！」「不用，不用，我一個人扛就行。」我婉謝了他。我們繼續往前走，突然，看到不遠處停着一輛吉普車，我的夫人顧懋萱就站在車旁。此刻，我已確定無疑，將要告別這座 K 字樓，走出大牆。隨後，我們幾人一起上了這輛車。在車上，我和懋萱默默地坐着，雖然我們斷絕音訊已一年多，雙方均有千言萬語急待傾訴，但是，此時不知從何說起，且也不便說，因為專案組人員仍在嚴密監視着。

途中，說起我是先回校還是先回家的問題，雙方意見不一。我們想先回家，可是，專案人員堅持要我先回系裏，我只得從命。到了歷史系，黨總支一位副書記要我談談認識。由於能走出人間地獄、重見天日、見到親人、回到北大，我心情異常激動，不禁失聲痛哭。專案組起初還要我住校，接受監督勞動，繼續交代問題，後經商量，同意我回家住。一年多的囚禁，使我體虛力乏。我氣喘吁吁地與妻子一起將那個怪袋從車站抬到家裏。軍兒在家等候已久。一年多不見，他長高了不少，童音不再，已是一名中學生了。一家人重又團聚。此時，我暫時把一切煩惱拋到了九霄雲外。**那一夜，我們徹夜未眠，盡情暢談。**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及」往事

事後方知，我這次之所以能出獄，與當時形勢有關。粉碎「四人幫」後，出任黨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一次在講話中強調：我們與「四人幫」的鬥爭還是一次路線鬥爭，要接受歷史上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個別人。他特別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的個別人，就是修正主義頭子。胡耀邦以與張國燾的鬥爭為例，他說，最後我們就孤立張國燾一個人，把他身邊的警衛員都爭取過來了。一九七八年底，胡耀邦又提出「不要把那些人都關起來」。他還以原遼寧省委書記李某某為例說「可以把他放出來」。由於胡耀邦主張以黨內路線鬥爭來處理我們這些人的問題，又提出了一個像李某某那樣的人物都可以放的具體方案，因此，北京市委、北大才放我出了獄。胡耀邦同志的寬闊胸懷和過人膽略，令人敬佩。現在，江西省共青城胡耀邦陵墓前致哀的人和鮮花終年絡繹不絕，那麼多人深深地懷念他，決非偶然。我不禁想起發生在六十年代的一段往事。當時，一批以胡耀邦長子為首的歷史系學生秘密串聯起來，準備離開北大，走向農村。他們表示要走賀龍、卡斯特羅的革命道路，不願步翦伯贊的後塵，固守校園。他們這些思想和行動，不是偶然的，是為了響應黨中央關於反修防修、與工農兵相結合的號

「文革」御筆沉浮錄

「殺敵」往事

召而產生的。我當時認為他們的願望是革命的，但串聯起來立即開赴農村，似不合適，故未支持。此事漸漸鬧大。胡耀邦長子給其父寫了一封洋洋萬言的長信，論證自己到農村改造鍛練的必要性。胡耀邦看信後，邀請北大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徐華民、副系主任許師謙和時任團總支書記的我到他家中商談此事，徵求我們的意見。我按上述想法表了態，認為他們應在大學畢業後再到農村鍛練。胡耀邦支持我們的意見並講了很長一席話，他說，人生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間接知識為主，社會實踐為輔；第二階段是社會實踐為主，學習間接知識為輔。如果他主觀主義，不聽別人意見，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胡要我們對其子好好進行教育。回校後，我們就遵囑找這批學生一一談話，傳達胡耀邦談話的精神，勸告他們安心學習，不要貿然下鄉。此事就這樣暫時平息下來。「文革」一開始，舊事重提，竟成為我壓制學生革命要求的罪狀。

出獄後，我在家過了一個星期日，次日一早又返回北大歷史系。起初，專案組還要我一邊交代問題，一邊參加勞動。幸虧，歷史系黨總支負責人比較注意政策，沒有執行對我含有懲罰性的措施，未讓我幹打掃廁所之類的勞動。黨總支還通知我，回原單位世界史研究室參加活動，並允許回家

「文革」脚著沉浮錄

「梁效」往事

住。

當時，上面對「梁效」成員有「三不」規定，即一不能講課；二不能寫文章；三不能出頭露面。我的天啊！作為大學老師，在這三條禁令之下，還能做些什麼呢？看來，唯一可做的，就是整理資料。先我回到系裏的三位「梁效」成員周一良教授、田餘慶先生和何芳川已在做資料工作。如田在整理地震史資料。我做什麼呢？研究室讓我做《沙皇俄國擴張史》一書的人名、地名中、外文對照表。

對於「三不」規定，實際上我並未嚴格遵守。我想既然放我出獄，回到系裏，我就要工作，不能吃乾飯。首先，我找到本研究室的一位同事，商量合作撰寫《俄國的農民戰爭與皇權主義》一文。文章寫好後，我們首先請教周一良教授，周先生說文章把「皇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後來，我們又請中國史專家過目。他說關於俄國農民戰爭中的皇權主義問題是我們過去一直想弄清楚的問題，這篇文章在這一點上講得還是不錯的。然後，我們又徵求了幾位同事的意見，最後，便將文稿送到《北京大學學報》。當時北大學報的主編是蘇志中。他看後認為文章寫得不錯，決定要用，不久就着手發稿。清樣印出後，北大一些人有所議論，有些教員流露出不滿情緒，他們說學報怎麼又要登范達人的文章。為

「文革」脚著沉浮錄

「絕迹」往事

此，《北京大學學報》便與我們商量可否用筆名，我當即表示同意，旋即與合作者商定，他用「良俊」，我用筆名「紹雲」。後來，這一筆名一直延用至今。出獄後，我的第一篇文章，確切地說半篇文章，就這樣刊登在《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上。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的同事、世界現代史教研室的徐天新邀我給學生講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在「三不」禁令尚未明確解除的情況下，他敢於邀我講課，實在難得。我便給一九七七級學生上了三個課時，主要內容為一九四八年捷克二月事件的性質、一九五一年斯蘭斯基案件和一九六八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上完課後，學生反應不錯。這是我在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重返講壇。後來，漸漸地我們可以講課，可以署真名發表文章，那「三不」禁令終於解除。我還給學生講過幾個俄國史專題，即「俄國農民戰爭」、「十二月黨人」、「沙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等。

由於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科研，我便抓緊時間，撰寫學術論文。從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三年，每年《北京大學學報》均發表一篇我的學術論文。對此，又遭非議。北大文科教員近千人，而《學報》一年只出六期，每期版面有限，我

「大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的論文每年都見諸於《學報》，一些人發點牢騷，也不難理解。

一九八零年後，我開始思索一個問題，即如何能揚長避短使自己在學術領域做出成績。我與個別同事反覆討論，明確了一個方向：進行「比較史學」研究。為什麼要開闢這一新領域呢？因為我原本從事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學，在「梁效」期間，又接觸了一些中國史，看了一些中國史的原始資料，也閱讀了不少中國史著作，因此，擬將中國和世界歷史結合起來進行探討，從一個新角度來研究歷史。

我與一位同事商量，準備給學生開門課，首先講一講比較史學方法論，然後，再選講幾個比較研究專題，他欣然同意。我選了下列專題：「東方慕尼黑與西方慕尼黑的比較研究」、「皇權主義的比較研究」、「宗教色彩的比較研究」、「秦始皇與伊凡雷帝的比較研究」等。他也選了一些題目。商定後，我們便打算於一九八一年開課，這門課定名為「中外歷史比較研究」。上述設想得到了歷史系黨總支書記郝斌的支持，他認為我們「化腐朽為神奇」，開設新課的設想很好。這裏所說的「腐朽」係指我們在「梁效」寫的那些文章，而現在將當時掌握的史料用於今天的研究，便化作「神奇」了。當時，歷史系主任周一良教授也支持我們開設

「文革」脚本沉浮錄

「樂透」往事

這門新課。

我們開設新課的消息傳開後，歷史系有些人略有不快。其中既有老先生，也有同輩學人。原來，他們也有類似計劃，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打」出來，現在卻讓我們搶了個先。在此形勢下，我那位同事向我表示，作為老朋友，他可以承擔幾講，但不聯名開設此課。後來「中外歷史比較研究」這門課是以我個人名義開設的。他言而有信，果真也來上了幾堂課。前幾講較受學生歡迎，後幾講，由於準備不夠充分，效果欠理想，但畢竟這門新課開出來了。在上課過程中，我寫了一系列比較史學方面的文章，也翻譯了一批這方面的學術論文。之後，我就專開「比較史學」這門課，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社會科學院民族所、上海師範大學均邀請我去開設「中外比較史學」講座。中國文化書院特聘我為導師，到全國許多大、中城市講學。當時，中國文化書院創辦了一個「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班」，學員多達一萬二千人，少時也有八千人。我先後應邀到武漢、長沙、廣州、石家莊、鄭州、杭州、福州等地以及北京香山為中國文化書院學生講授「比較史學」。我的課受到學員們的歡迎，文化書院還特地為我製作了錄像。我的學術專著《當代比較史學》和《比較史學》(與易孟醇合

「文革」御筆亂浮錄

「總效」往事

著)分別於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一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湖南出版社出版。

後來，歷史系主任周一良教授又交給我一項新任務：在歷史系再開一門新課《史學概論》，作為研究歷史的入門課，我應承了下來。我在講授「比較史學」的同時，也上「史學概論」。這門課難度較大，首先，大家對「史學概論」究竟應講什麼內容，大家意見不一，分歧很大；其次，這門課應如何講，亦無很多經驗可供借鑒。因此，我只能一邊講課，一邊摸索、總結，就這樣，總算開出了這門新課。

一九八四年年底，我的夫人將赴華沙中國駐波蘭使館工作。根據當時的有關規定，我可以陪同前往。我們便分別向各自單位提出了同往的要求，北京大學黨委經過一番研究，批准了我的申請，同意暫時外借。

從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一九八七年二月在波期間，我除作一些專題研究外，還進行了一些學術交流，應華沙大學副校長耶日·斯科弗羅奈克和波茲南大學耶日·托波爾斯基教授的邀請，到上述兩所大學講課和講學；並結識了一些學術界朋友，曾撰寫一篇關於著名波蘭歷史學家耶日·托波爾斯基的訪問記；波蘭朋友施樂文和揚·羅文斯基還將我的兩篇學術論文譯成波蘭文發表在波蘭雜誌上。總的來說，在波蘭度

「文革」御華沉浮錄

「梁效」往事

過的日子比較輕鬆愉快，因為這是我首次常駐國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更為重要的是擺脫了長達七、八年之久的政治壓力。

從一九八零年起，我一心埋頭於學術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麼，「梁效」問題是否已經了結？否。一九八零年，當時的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代表北大黨委在歷史系全體教師大會上宣布：「一、周一良、田餘慶、范達人、何芳川



作者八十年代在波蘭革但斯克。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等同志參加「梁效」工作是由組織派去的；二、他們在『梁效』期間犯有錯誤，寫過錯誤文章，應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待，進行解釋，他們個人是沒有責任的；三、周一良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田餘慶同志在學術上很有造詣，范達人與何芳川是中青年骨幹，希望他們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為學校的教育、科研做出貢獻。」這三條的宣布，對我來說不啻第二次解放。這裏顯示出當時的北大校、系兩級黨組織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較高的政策水平。

儘管北大黨委宣布了上述三條，但是，「梁效」問題並未解決。對「梁效」成員最後如何處理，上面一直還在討論着，尚無定論。各種信息不斷傳來。據說，當時有一種處理方案，即遲群、謝靜宜算「梁效」頭子，屬敵我矛盾（遲後以反革命罪論處，被判十多年徒刑；謝被開除黨籍，發配北京郊區勞動，免予刑事起訴）。

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三人算犯有嚴重錯誤；
范達人、鍾哲民、楊克明、葉朗、湯一介等人屬一般錯
誤；

其餘成員，一律不予追究。

然而，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整黨決定稱要清查「三種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其中，「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指什麼人呢？中央後來發下一份補充文件，說是指「文革」期間全國有名的寫作組中那些擾亂全國文章的炮製者。這樣，「梁效」成員重新又成為清查重點，因為，「梁效」寫的文章很多，影響極大。一九八五年開始整黨，「梁效」成員再度受審。幸運的是，我已於當年元月赴波蘭，也就免於挨整了。

事後得知，在國內的「梁效」成員再次作檢查，等待黨員重新登記。就在這時，上面忽然一道令下：「梁效」所有成員暫緩登記。迎頭一棒又把大家敲得暈頭轉向。原來，上面對「梁效」的清查結果不滿，認為清查不徹底，要求重新審查。北大黨委雖強調審查已多年，問題基本查清。他們據理力爭，但依然無濟於事，只得按照上面的要求，重新組織人馬，再次審閱我們所寫的文章。據說，北大黨委在解釋中央補充文件中那句「擾亂全國文章的炮製者」時，堅持認為那是指提供思想、授意寫作者，而執筆者僅僅是執行者，兩者有別。

查完之後，「梁效」問題升級，又拋出新的處理方案。對「梁效」成員的處分，改為如下五個層次：

第一，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屬「三種人」，開除黨

「文革」御筆亂浮錄

「梁效」往事

籍；

第二，范達人、鍾哲民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第三，葉朗、楊克明犯一般性錯誤，記錄在案；

第四，湯一介、胡經之等組長一級成員犯一般性錯誤；

第五，一般成員不予追究。

據說，在處理「梁效」問題的過程中，北大黨委有關領導與北京市委、中央審查小組有過幾番爭論。北大黨委力求實事求是，對「梁效」成員採取慎重、負責的態度，據實陳情，為「梁效」成員申辯。北大黨委強調，「梁效」中有許多成員，在「文革」初期，是受打擊迫害的，他們後來成為「梁效」成員是當時的組織派去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共產黨員，服從了組織的決定，事後均作了檢查，有的還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等等。北京大學黨委的一番話，可謂合情合理，但上面某些人為維護自己的尊嚴，堅持既定方針，不肯實事求是地給「梁效」問題降調，硬性通過了上述五個層次的處理方案。

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中共北京大學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關於對范達人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全文如下：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范達人，男，一九三五年二月生，漢族，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學生，浙江省紹興人。一九五一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三次立過三等功。一九五五年到北京大學俄語系學習，後轉到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一九五七年考入北大歷史系，一九六二年畢業，留系任團總支書記，一年後任教。「文化革命」初期被作為「修正主義苗子」、「保皇派」受到揪鬥。

一九七三年十月經校黨委決定調「兩校大批判組」（「梁效」），任寫作小組長，臨時黨支部委員。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集中學習、揭發、交待問題。一九七七年三月被隔離審查，同年十二月由市公安局監護審查。一九七九年一月解除監護後回歷史系工作。

經北京大學紀律檢查委員會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討論：范達人同志在「梁效」工作期間的問題以嚴重錯誤予以結論，決定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我不同意上述處分決定，拒絕簽字，陳述了三點理由：第一，到「梁效」工作是服從黨委調動。在「梁效」寫文章並不知道「四人幫」的陰謀，以為都是按毛主席、黨中央部署做的。我犯了錯誤，已作了檢查。組織上應考慮我當時所犯錯誤的特殊歷史條件，不應過多追究具體工作人員的責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給效」往事

任；第二，由於「梁效」問題，我已受到三年的隔離審查、監護審查以至萬人大會的批鬥，懲罰之嚴厲已遠遠超過了我所犯錯誤的事實和性質；第三，粉碎「四人幫」十多年來，我的實際行動，可以證明我是擁護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對實踐證明已改正了錯誤的同志不應再給予處分。

為何啟用我

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受到清查以後，不少人常常問起：「為什麼啓用你？」對於這一點，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也許，回顧一下我的人生歷程，有助於弄清這個問題。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我生於上海市。祖籍是浙江紹興雙江溪。曾祖父范采晉中過文舉，在家鄉數十里方園內，很為人仰慕，家門口兩根旗杆，就是因他中舉而豎起的。祖父范幼蘭是個秀才，清朝末年在京城做過小官吏。父親范亦笙原在紹興老家教書，後到上海政法大學讀書，擔任過寧波縣代縣長和某師參謀長等職。父親四十歲時病故，那時我才九歲。孤兒寡母相依為命，靠父親留下的十二畝田和一些金器為生。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金器已變賣一空，田只剩下十畝，已是一個破落地主家庭。

一九五一年一月，當時我在紹興中學讀初三上，年方十五周歲，積極響應政務院「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幹部學校，揮淚告別了我唯一的親

「文革」御筆沉浮錄
「桀效」往事



作者五十年代在解放軍三野衛生部工作。

「文革」衛生部浮錄

「榮立」往事

人——母親。到部隊後，在三野衛生部系統學習和工作，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由於學習、工作成績優異，表現突出，我三次榮立三等功，後因病，復員回鄉，時年一九五五。

經過三個月的刻苦備考，功夫不負有心人，同年八月我接到北京大學新生錄取通知書。到北大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後，要我學捷克語，只得從命。兩年後，由於捷克語人才過多，我便轉入北大歷史系學習。從此，我的命運與北大的風雲，緊密相連，時起時落，曲折坎坷。

「文革」一開始，我就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保皇派」遭到殘暴批鬥和長時間勞動懲罰。我之所以首當其衝地被揪出，原因之一，與我家庭出身有關。家庭出身不好像一片陰雲，或隱或現地籠罩在我的頭上。記得我從部隊復員回紹興時，一位縣民政科長看了我的檔案，搖動了一下轉椅，自言自語地說：「哦，出身不好。」他沒有給我分配工作，令我回家等候。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時，我批評了一位黨總支幹部的過激言論，他不但不接受，卻反唇相譏道：「我是工人出身，范達人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的修正主義思想比我嚴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反動官僚地主子弟是我的一大罪名。

一九六八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他們在制止武

「文革」柳華沉浮錄

「樂透」往事

鬥、消除派性和推動革命大聯合後，開始了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其指導思想是北大「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這幅侮辱性對聯，原是歷史系一些紅衛兵在「文革」初期寫的。他們把它張貼在歷史系駐地三院門口，以攻擊歷史系的教師和幹部。後來此聯上報至最高統帥（指毛澤東——編按）處，獲得首肯，他把原文「池淺王八多」中的「淺」字改為「深」。清隊中，歷史系又揪出了一大批。原系文革主任，由於有人指責他挑動群衆鬥群衆，要他站在會場前面，與牛鬼蛇神一起，接受批鬥。他難以承受這種屈辱，次日自殺身亡。一位副教授被誣為反動小集團的成員，立即受到揪鬥。一名曾經擔任過三青團小幹部的講師，當成歷史反革命，列為清查對象。系裏的「黑幫」和「反動權威」無疑均屬清理之列。我在這次清隊中，幸免於難，未受整肅。

此時，我便主動檢查，清理自己的思想。「文革」初期，我思想上頗為抵觸，清隊以後，由起初的抵觸、委屈轉為懷疑和否定自己。當時，我以為毛澤東永遠正確，不會有錯，那麼自己就應該努力使思想和言行符合毛澤東的要求。一步步深挖下去，感到自己確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想當專家，想成學者，希望從事專業研究，不願做政治思想工作。而毛澤東強調政治是靈魂、是統帥，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走只專不紅的道路，不就是修正主義道路嗎？將我打成「修正主義苗子」並不冤枉，我還委屈什麼呢！接着，我又進一步分析錯誤思想產生的根源，心想它與自己的家庭出身、十七年的修正主義教育有關。過去自以為雖出身官宦之家，但是，父親早逝，未受不良影響。可是，現在看來，事情並非如此。記得在少兒時期，父親就向我灌輸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四句詩，我背得滾瓜爛熟，潛移默化，對我日後人生觀的形成產生很大影響。我在全系大會上作「鬥私批修」檢查，誠懇地檢討自己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說到沉痛處，不禁流下了悔恨的眼淚。我的檢查稿，北大校廣播站用了四、五十分鐘，全文播放。

清隊告一段落後，北大人分兩路。大批師生到江西鄱陽湖畔「五七」幹校勞動，條件極其艱苦。一小部分人繼續留在北大，但不在校園內，而是到北京郊區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歷史系軍宣隊、工宣隊將我留了下來，參與教育改革的實踐。

我們先到房山縣霞雲嶺龍門台大隊，這是北京的遠郊區，與河北省交界的山區。那裏山巒起伏，風景秀麗，空氣新鮮，我剛從城裏出來，又恰逢回歸革命隊伍不久，因此，

「文革」御筆沉浮錄
「榮校」往事



作者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留影。

「文革」鄉華沉浮錄

「染效」往事

環顧四周，感到心曠神怡，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在農村期間，名義上我是歷史系政工組成員，但是，實際上，主要任務是行醫。這裏偏僻貧困，缺醫少藥。由於家學淵源，受外祖父和大姨母影響，我從小就對中醫中藥很感興趣，後在三野衛生部又學過一些醫藥知識與技能，加上「文革」期間，一度當逍遙派時，讀了不少醫藥典籍，學了一些醫術。凡此種種，均為行醫準備了必要條件。當時，有關領導給了一個藥箱和不少中西藥品、醫療器械，要我當一名「赤腳醫生」。服務對象是北大歷史系師生和當地的貧、下中農兩部分。北大師生享受公費醫療，村裏的農民看病也免費。我不僅為山村的老鄉治病，還免費理髮。我想既然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為貧、下中農服務，那就應該完全徹底。因此，人們常見到身背兩個小箱的我，左邊一個紅十字藥箱，右邊一個理髮工具箱，足跡遍及整個山村。當時的范達人，不是范老師而是范大夫，深受大家的歡迎。歷史系在當地辦了一份小報，及時向各村各隊通報教改情況。二年級學生俞政寫了長篇通訊報導，對我加以讚揚，此稿稱我能嚴格要求自己，按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等。後來，北大要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系裏便選派我和王通訊兩人作為代表與會。

「文革」御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圖為清華大學陳列的毛澤東轉送的「芒果樣板」，師生手握小紅書（即《毛主席語錄》——編按）列隊「朝聖」。

不久，毛澤東關於教改的指示一項項傳達下來。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要從工農兵中吸收學員」。我們在農村呆了幾個月後，就返回校園。鑑於上述情況，領導上決定進一步使用我。當時一項重要任務是開展革命大批判，從思想理論上將舊教育體系、教育思想與教育理論批倒批臭。

「文革」抑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為此，要建立專門的無產階級理論隊伍。歷史系便將我調到系的大批判組，其任務是在史學領域裏開展革命大批判。

北大黨委選調我到北大、清華大批判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我與筆有緣，寫過一些文章，是所謂的筆桿子。早在大學一年級時，我就與畢業班同學郝斌、楊立文兩人響應史學革命、寫工農兵的歷史的號召，到部隊寫過「兵」的歷史。《猛虎連史》一書便是此次合作的成果。一九六二年，我的畢業論文〈論慕尼黑陰謀〉獲得好評，是當年世界史專業唯一一篇進行答辯的畢業論文。在此之後，我還寫過一篇關於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文章，此文後在北京史學會上宣讀過。

一九七一年「批陳(伯達)整風」時，北大將文科各系大批判組人馬集中到北大南閣，限期寫出文章。歷史系有朱耀庭、王通訊和我；中文系有孫慶升；哲學系有石堅等人。要求我們寫出史學、文學、哲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批判文章。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寫出一篇批判翦伯贊「讓步政策論」的文章。

翦伯贊是北大副校長兼我們歷史系主任，是全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人們尊稱翦老，是與郭沫若、范文瀾齊名的史學大師。據說，他當過馮玉祥的歷史老師，三十年代參加中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共，是一名地下黨員。對於這樣一位史學界大師級人物，毛澤東卻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杭州會議上給予嚴厲批評。他說，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又說，以前對知識分子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許多文化部門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着實權。許多文化部門要問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吳晗、翦伯贊是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對這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進行切實的批判。「文革」初期，翦伯贊遭到殘酷的批鬥。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澤東提出要對翦伯贊等人採取「一批二養」的政策。他說，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要解放歷史學家翦伯贊，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安排他們的工作。

隨後，北大部分地改善了翦的生活環境和條件。此後不久，翦伯贊夫婦在中央某專案組人員的威逼之下，雙雙自殺身亡。翦在上衣兩側口袋內留下兩張紙條。一張上寫着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另一張上寫着我走這一步，與杜師

「文革」柳華沉浮錄

「卷之三」往事

傅(服務員)毫無關係。據說，毛澤東獲悉後，爲之惋惜，遂決定派遣八三四一部隊盡快進駐北大，落實知識分子政策。

我們那篇批判「讓步政策論」的文章名爲批判翦伯贊，實際上主要是不指名地批判陳伯達。因爲我們後來發現陳伯達早在翦之前，就發表過「讓步政策論」。這篇文章寫出後，我就回系了。

一九七二年《紅旗》雜誌向北大約稿，要求寫一篇〈讀一點世界史〉的文章。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有所鬆動，毛澤東要求大家讀一點世界史，以適應當時的國際形勢。那時，我剛從學校大批判組回到系裏。由於在南閣與人合作寫出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曾在《紅旗》發展。因此，系領導便要我主持〈讀一點世界史〉的撰寫工作，我便成了此文的寫作組長。爲此，我從系內調來了四、五位筆桿子，其中有羅榮渠、徐天新、張培生，組成了寫作小組。

我們一起研究、詩論寫作提綱。小組中有一位成員，知識面寬、才思敏捷、筆頭也快，討論後，我便委託他起草一部分初稿，我自己起草一部分。草稿寫出後，由我執筆，幾個人再一起通稿。然後，將通稿交《紅旗》雜誌余征。余看後認爲文章內容豐富，但有點龐雜，需按他的一些要求進行修改。二稿由我改寫。改好後，我請那位組員過目，他看後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說：「這個稿子不行，我來重寫一篇。」一夜之間，他趕寫了出來，我將兩篇修改稿件一並交《紅旗》，由他們定奪。結果，他們選了我修改的那一篇。這篇文章，後發表在一九七二年《紅旗》第四期上，題目就是〈讀一點世界史〉，署名史軍。文章發表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放，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此文一炮打響，在全國引起轟動。《紅旗》接着約寫〈再談讀一點世界史〉，要求在第二篇文章中強調讀一點近代史。

這樣，原來的寫作組除留下我和上述那位成員外，又調來了近代史教研室的幾位教師，組成新的寫作組。這次，那位老組員發揮了很大作用，起草了初稿，我也起草了一份初稿，然後，由我執筆將兩稿通成一稿。他看了我的通稿，依然像上次那樣，表示不滿意，要另寫一稿，我則如法炮製，像上次一樣，將兩篇稿件一起送《紅旗》。這一回，《紅旗》還是選用了我修改的那一篇。

緊接着，《紅旗》雜誌再一次找到我們，要求再寫一篇，重點是寫讀一點帝國主義的歷史。這次由我獨自起草。初稿寫成後，徵求組內同志意見。大家認為還挺好，那位老組員看後，自己又要寫一篇。此時，我對他的傲氣固執，已難以容忍，因而未同意他的打算，將自己起草的那份稿子送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紅旗》。《紅旗》認為可以並立即採用。這就是〈讀一點帝國主義歷史——三談讀一點世界史〉。

《紅旗》還準備約寫第四篇〈讀一點民族解放運動史〉，將這一寫作任務依然交給我們。在撰寫前三篇文章過程中，我與那位組員之間產生了矛盾。歷史系工宣隊和黨總支認為出現這種矛盾應該從思想上找原因，要我們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此事竟然上綱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我成了按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辦事的代表，而他則成為突出個人、狂妄自大，按資產階級路線行事的人，對他進行了批判，對我則備加褒獎。其實，在工作中，出現不同想法是正常的，可是，當時一有分歧，容易上綱上線。憑心而論，他在起草前兩篇文章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此處理我們之間的矛盾，有欠公允。為此，他與我結下了疙瘩。

鑑於上述情況，撰寫第四篇文章時，我另找了何芳川等幾位同事。這篇文章未能連續發表，直到當年十一月，《紅旗》才刊出。

上述四篇文章發表後，因我是寫作組長，又是主要執筆者之一，贏得很大的聲譽，甚至可以說，贏得了過份的聲譽。四篇文章在國際上引起反響，蘇聯有人著文評論反駁，猜測史軍是何許人。我專門收集了蘇聯的評論，寫了綜合報

「文革」御筆沉浮錄
「榮遠」往事



作者七十年代攝於法國巴黎。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導。這篇報導發表在北大《國外社會科學》資料版上。不久，這四篇文章匯集成冊，譯成英、日等文字出版。隨後人民出版社還要我們對四篇文章加詳細註釋，形成新的版本，再次出版。與此同時，外地也有不少出版社將四篇文章加註出版，書名均為《讀一點世界史》。

「文革」中，「知識無用論」盛行一時，這幾篇文章對扭轉當時那股輕視文化知識的風氣，鼓勵人們學點歷史知識，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具體主持和參與撰寫這四篇文章，我有幸作為中國科學院考古小組成員，隨夏鼐所長途經法國巴黎，稍事逗留，後到文明古國墨西哥和秘魯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學術考察和訪問，參觀了印加帝國的首都庫斯科和墨西哥太陽、月亮金字塔等古代文明遺蹟，領略了絢麗多彩的拉美風光。秘魯的庫斯科大學還授予夏鼐、王仲殊和我三人榮譽教授證書。隨後不久，我被提名為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以上是我進「梁效」的背景和經歷，不知能否解開人們的疑團。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效」往事

附錄：旅美歲月

1. 應邀訪美

從一九七九年起，我一直致力於比較史學的教研，為加深對西方史學的了解，希望能有機會到美國進行一次學術性考察和訪問。一九八八年底和一九八九年初，我先後收到了美國四所大學的邀請。他們是：布朗大學的賈祖龍教授、哈佛大學的瑞達·斯凱切波爾教授、康州大學的海爾曼·馬斯特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西·依·布賴克教授。光有邀請函件還不能成行。我的訪美計劃之所以能實現，還得力於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一筆資助。當時，美籍匈裔金融家喬治·索羅斯每年向中國提供一百萬美元，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改革開放基金會。我便以考察美國比較史學為由，向該會申請資助。在申請過程中，我得到了周一良教授和湯一介教授的推薦，也獲得了該基金會執行委員梁從誠和另一位執行委員、北大哲學系年輕教師王守常的幫助和支持。最後，我的訪美之行，經北大校、系兩級領導同意和批准，以自費公派身份前往。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統」往事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晨，我乘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班機離開北京，踏上了旅美征途。第一站東京，首次來日，人地生疏，多虧一位美籍華人相助，才使我順利辦妥轉機手續。接着，飛機橫渡太平洋，直抵紐約。這次旅途雖長，但由於時差，所以仍於當日下午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我考慮到訪問的第一站是普林斯頓大學，因此，便到原北大學生傅雅方家暫時落腳，因為她家離普林斯頓大學較近。傅的住所座落於優美、幽靜的環境之中，頓時使我想起了波蘭南部的旅遊勝地扎科帕奈。

2. 拜訪名家

抵美次日，我便搭乘公共汽車到了普林斯頓大學。它是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十個長春藤聯盟大學之一。當年，愛因斯坦曾在此做過研究。

我首先拜訪了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教授，余先生蜚聲文壇。我讀過他的一些著作，如《歷史與思想》等。余教授熱情接待了我，談了許多比較史學方面的問題。接着，我訪問了西·依·布賴克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比較史學家，特別致力於比較現代化的研究。布賴克年愈古稀，退休在家。他撰寫的《現代化的動力》已譯成中文，頗受人們歡迎。布賴

「文革」御筆沉浮錄

「呆板」往事

克教授請一位助手將我接到家中，當時，他剛動過手術，頭部傷口尚未癒合，身體虛弱，但精神尚佳。他委託助手請我共進午餐。後來，他還想親自出面宴請我，終因健康原因，未能如願，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隨後，我拜會了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社會學教授吉爾貝爾特·羅斯曼，他一看我遞上的名片，立即高興地說，他知道我，並曾在其著作中引用過我所寫的〈論沙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一文的看法。羅斯曼教授還將引文的影印件贈我留念。在遙遠的美國，有人引用我的文章，且準確地譯成英文，令人高興。以上三位教授還分別送我一本自己的學術著作，留作紀念。余先生送的是一本新近出版的《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政治系有一位研究中國的年輕教授大衛·貝契曼，其夫人曾在北大研究過「四人幫」問題，對「文革」後期的情況了解甚多，現在一家公司當律師，工作很忙，無暇繼續研究，但她仍希望能完成此項研究計劃。他們夫婦二人邀我共進午餐，貝契曼還專門函告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所長馬若然關於我抵美的消息。

在此，我還遇到了原北大歷史系一位學生。在校時，她學習成績優秀，當過班長，現自費來美攻讀國際關係。她請

「文革」抑筆沉浮錄

「絕版」往事

我到學生食堂早餐，由於缺少經驗，我點了不少菜，使其大為破費。

在普林斯頓大學逗留兩周後，準備前往第二站，究竟去哪裏呢？猶豫未決。此時，恰好與哈佛大學方面的聯繫比較順利，我便決定前往波士頓。當時，曾想再返回普林斯頓，所以，走時只帶了一點輕便行裝，兩隻大箱子仍寄存在傅宅。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圖書館管理員劉興豐親自駕車到火車站，為我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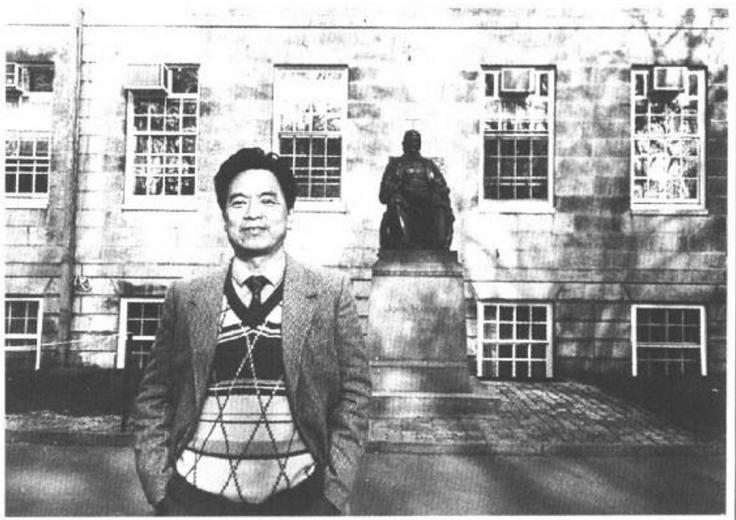
3. 結緣哈佛

一九八九年四月初，我安抵波士頓。次日是星期日，一早我便乘地鐵到哈佛大學熟悉環境。一進校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片綠綠茵茵的草坪、數十棵茁壯的參天古樹、一座座精美的建築和整潔、寧靜的校園。該校創始人哈佛的銅像座落於校園一側，不時，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與哈佛像合影留念。隨後，我找到了威廉·詹姆士大樓和著名的美國第二大中文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

星期一，我首先拜訪了瑞達·斯凱切波爾教授，她所寫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將中國、俄國和法國革命進行比較。據說，此書還曾獲獎。她本人還有一段故事：斯凱切

「文革」御筆沉浮錄

「怨忿」往事



作者八十年代末於美國哈佛大學校園內。

波爾在哈佛工作多年，頗有成就，但未能及時晉陞為正教授。後來，她上訴法院，狀告哈佛大學輕視婦女，獲得勝訴，因而升為正教授。在哈佛要當上正教授，相當困難。一旦升為正教授，若無嚴重過錯，就將終身受聘。斯熱情友好，贈我不少新著。接着，我到國際交流辦公室簽到，從此，成為哈佛大學的一名訪問學者。在領到該校工作證後，我就可以自由出入哈佛的各種圖書館，使用各種設備。

「文革」柳華流浮錄

「絕效」往事

不久，我向斯凱切波爾教授表示，擬將訪問時間延長至半年，她個人表示同意。後經她提出，社會學系同意，校方批准，我的訪問時間便延長到半年。據說，要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相當不易，有的學者自願交費，都未能辦成。我之所以能辦成，完全得力於斯凱切波爾教授的鼎力相助。

下一步的主要問題是進一步落實資助。來美前，湯一介教授曾向我介紹幾位美國朋友，杜維明教授便是其中之一。杜先生出生於雲南，台灣東海大學畢業，後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和柏克萊加大執教，一九八一年回哈佛任教，繼又出任該校東亞系主任。杜曾在北大和北師大作過訪問學者，還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海外兼職教授。我拜會了他。杜先生從北大學報和中國文化書院院刊中，對我已有所了解。我表示擬在美多留一段時間，問他能否幫助解決經費問題。他當即表示可以考慮，想想辦法。杜先生樂於助人，令我印象深刻。七月份，杜先生問我身邊的錢是否快用完了，接着告訴我，他先從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為我籌到兩千美元，分兩個月支付，要我去取。可是，我第一個月拿到的不是一千美元，而只有七百。辦事人員說，扣除了三百美元稅金。我為之一怔，怎麼稅金這麼重呢？後來，進一步打聽方知，按中美之間達成的協議，中國訪問學者可以

「文革」御筆沉浮錄

「雜談」往事

免稅三年，我便補辦了免稅手續。可是，辦事人員又說，三百元稅款可以退，但要待一年後退到北京。經過一番交涉，才最終解決了問題。這是我抵美後得到的第一筆資助。九月份，杜先生又告我，他為我申請到一筆羅斯基金。之後，由於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所長馬若然教授和瑞達·斯凱切波爾教授的推薦，從一九九〇年六月至十月和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又分別得到哈佛大學和紐約國際教育研究基金會的兩筆資助。一九九一年九月後，中國訪美學者愈來愈多，申請資助較為困難，從此，我便自謀生計。

4. 學壇拾零

來美後，我先後到紐約參加過三次學術會議。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五月，由余英時教授主持召開的海峽兩岸學者紀念「五四」運動學術座談會。我應余英時教授的邀請，與杜維明教授一同前往參加。與會的學者還有美籍華裔學者張浩和港、台學者陳其南以及幾位大陸學者等。在會上，我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會後，《中國時報》、《中國時報週刊》均在顯著位置發表了與會者的發言摘要和照片。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傳來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引起了與會者的高度關注。第二次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份召開的全美歷史學會，由唐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德剛教授和袁青教授主持。唐先生是紐約市立大學東亞系主任。袁青是俄亥俄大學歷史系主任，他與我在普林斯頓相識，這次，我是應袁先生的邀請而來的。會議期間，坐在我身邊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司徒鉅勳，他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系，後來美攻讀，現為牧師、神學家。會後他請我到家中小住。司徒牧師知識豐富、為人熱情，給我不少幫助。其妹在廣州市委工作，因此，他常回大陸，前幾年還赴杭州參加浙江大學百年校慶。第三次是一九九〇年二月份，紐約君王學院舉辦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座談會。在會上，我用英文作了大約半小時的發言，對中國和東歐的改革進行了比較，還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我應費正清研究所的邀請，在該所舉辦了一次關於「梁效」問題的講座。在此之前，我在圖書館內，曾看到一本德國留華學生撰寫的關於北大文革的書，書內有三處提到我。其中一處，係一九七七年底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萬人批鬥大會，該書作者說我拒絕承認錯誤，是從嚴對象。此書人名註釋稱我是歷史學家、四十多歲，曾為留學生開過課。此外，湯一介的夫人樂黛雲教授在其自傳中也有兩處不指名地提到了我。這次講座是由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研究員、波士頓大學教授戈曼·梅爾主持的。大約

「文革」禍肇沉浮錄

「梁效」往事

有二十人出席，其中，有馬若然所長，來自英國，當過國會議員、《中國季刊》主編、BBC 駐香港記者，專門研究中國，寫過幾本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書。到會的還有著名的貝·史華茲教授，他曾是杜維明和李歐梵兩位教授的導師。我如實地介紹了「梁效」的情況，並回答了一些問題。由於本人是「梁效」的主要成員，談談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頗受聽眾歡迎。

我還參加過位於大波士頓地區的《劍橋新語社》的一些活動。該社是趙如蘭教授和陸惠風教授於一九八三年創建的，他們約定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晚上輪流在趙、陸兩家舉行非正式的學術研討會，參加者主要是大波士頓地區的華人學者，還有到哈佛大學等學校訪問的華人學者。講座題材廣泛，既有社會科學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學領域的，一般先由一位學者主講，然後大家討論，最後是，主人以可口的八寶熱粥款待客人，在趙家是紅粥，在陸家是白粥，如遇感恩節，則有火鷄招待。

趙如蘭教授是著名學者趙元任之長女，對中國民族音樂和表演藝術頗有研究，其夫卞學璜教授是位物理學家，曾在麻省理工學院執教，並經常到中國講學。陸惠風先生從香港來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他是學術名家楊

「文革」御筆流傳錄

「樂效」往事

聯升教授的助手。趙、陸兩家均有寬敞明亮的客廳和豐富的藏書。

在《劍橋新語社》活動中，我參加過的有杜維明談新儒學、潘振聲論宇宙之奧秘和趙如蘭談中國大陸、台灣之行等講座。我在該社也作過兩次講演，一次是一九九〇年五月介紹當代中國史壇上的比較史學熱；另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五月，談氣功的修練。

在哈佛，我聽過不少課。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九〇年初，我聽了馬若然教授主講的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這是一年級的選修課。聽課者空前踊躍，大約有五百人。據說，上一年度多達八百人。馬對「文革」過程比較清楚，講課形象生動，富有情趣，在課堂上，他帶領學生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試圖以此增加學生的現實感。課間，他還放映了兩部短片，一部關於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另一部是他當記者時拍攝的採訪錄像。他自編了一套教材，給學生開列了一批參考書，主要是西方學者撰寫的有關「文革」的書。每次上課一小時，然後討論，助教進行輔導。

我聽過一門中國通史課。授課人是杜維明教授和其他幾位美國教授。這也是一門選修課，授課對象大多是東亞系學生。杜先生中國史造詣深，英語流利，效果很好。之所以選

「文革」御筆沉浮錄

「總效」往事

聽這門課，是由於我一直關注西方學者如何評論中國歷史。

在美國，我還參加了不少其它講座，聽過不少美國學者談中國問題，總的印象是他們均有自己的見地，但對中國的了解有時不夠貼切。

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經常舉辦各種學術講座，有時一周多次，但是，每周五下午三時的講座則是例行不變的。講座通常先由主持者對主講人作一扼要介紹，主持人多數情況為梅爾·戈曼教授。她也是新英格蘭地區中國問題討論會的召集人。演講一般不超過四十五分鐘，然後，再用四十五分鐘討論和評論。大約一個半小時後，與會者上樓參加一個招待會，就演講內容，相互交流看法。

我也參加過哈佛大學其他系的一些午間講座，通常中午十二點開始，與會者事先到食堂買來午餐和飲料，邊吃邊聽，演講者也可邊吃邊談。在中國人看來，這樣做有失禮貌，不甚雅觀，可是，美國人認為這也是一種會議形式。

近年來，我有志於中美風土人情、文化習俗的比較研究，為此，收集了不少資料，不時地進行思考，一九九六年，我的夫人與我合寫了四篇從比較角度評介美國衣、食、住、行四方面情況的文章。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了我的學

「文革」御寒沉浮錄

「染效」往事



作者九十年代於美國華盛頓。

術專著，其中一本《當代比較史學》還在該館櫃窗中展出過。

5. 打工點滴

來美後，我曾打過一些短工。第一次是在哈佛大學，做的是監考工作。一天，我從報上偶然看到哈佛需要監考人員的消息，便到考試辦公室報了名。工作人員查驗了我的證件，讓我填了表。不久，通知我已錄用。接着，招生辦對監

「文革」御筆沉浮錄

「船政」往事

考人員進行一番培訓，告訴我們如何發考卷，考生作弊如何處理等事項，然後介紹考試程序。一開始，我有點發怵，因為考生均為美國人，一切要用英語進行，能否勝任此項工作，心中無底。實踐表明，一切進行得還算順利，我做過監考助理，也當過主監考。偶爾也遇到過一點小麻煩，如一女生舉手要「體修」，我不知她要何物，此時，美國監考遞給她幾張口紙，原來她在流清鼻涕，所要的「體修」，即口紙(tissue)也。監考費每小時六美元，一天工作八、九個小時，可掙五十美元左右。

我還在波士頓語言學院教過中文。這所學院位於波士頓比肯大街，設有英、法、德、中、日、意、波、捷等多種語言專業。中文分普通話和廣東話兩個班級。該校創辦人西利康是一位猶太人，後皈依印度教，改名換姓，頭裹白布。我是由美籍華裔作家劉年玲女士推薦去任教的，她原在那裏工作，後讓位於我。普通話分初、中、高三個年級。該校薪金不高，每小時十四美元，但是，通過教學直接、間接地認識了不少人。

6. 遭人誣陷

一九九〇年三月五日，紐約《東方新聞報》發表一篇通

「文革」御筆沉浮錄

「梁效」往事

訊，題目是「民運分子致電本報 檢舉潛伏哈佛共謀」。原文如下：

一名從事民運的許姓大陸人士，日前致電本報，揭發以「博言」假名在《時報週刊》撰文攻擊江之楓及其作品《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一書的人是四人幫時代「梁效」寫作班子之一的范達人，此人不久前被中共派來美國，讓他以民運分子身份混入哈佛大學左傾的「中國不通」費正清手下，表面上協助費研究中國問題，實際上是在美國替中共幫腔，打擊有殺傷力的異議分子。

范達人以「博言」假名赤膊上陣，利用台灣中時系統故作中立，混充客觀的立場為他及中共傳聲，打擊江之楓及其作品，方便了中共在海外工作，這種表現，使民運分子至為反感，認為有向該報老闆余紀忠陳情的必要，希望余家在吃盡台灣好處之後，不要再出賣台灣二千萬生活得自由自在的中國人。

根據一般大陸人士了解，范達人的文風粗鄙，亂用典故，錯用成語，文革時無人敢對他抗議，使他「意氣風發」了很長一段時間，不料到了海外，繼續胡吹亂寫，並利用《時報週刊》為他傳聲。

「文革」抑筆沉浮錄

「樂透」往事



作者九十年代在美國波士頓。

當時，我在波士頓，對此事一無所知。紐約一位朋友偶然從報上看到這條消息，剪下寄給了我。對這種無端誣陷，我很氣憤。紐約那位朋友認為，既然不實，應該發表聲明，予以澄清。我又徵求了一位在美生活、工作多年的朋友的意見，他認為這種小報可以不去理會。因此，我也就未予理睬。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台灣《中央日報》一篇篇地連載了

「文革」御筆沉浮錄

「絕效」往事

《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在此之後，《中國之春》還將它出版成書。書發行後，有人在《時報週刊》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署名「博言」，題目是〈同志，你不能這樣幹〉，該文批評書中很多情節與事實不符，憑空杜撰，旨在賺錢。某些人誤以為此文的作者是我。

針對這一情況，我首先想弄清「博言」是誰。我分析他是博士研究生，根據編者按介紹，他來美已有五、六年，是中共黨史專家，因此，我估計此人是楊炳章。楊「文革」時曾在北京大學參加運動。粉碎「四人幫」之後，他考入北大哲學系學習，幾年後又到哈佛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一次，我巧遇楊炳章，談起此事，他承認〈同志，你不能這樣幹〉一文係他所寫。

那麼，《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一書的作者是誰呢？江之楓係筆名，真正的作者，友人告我是一位曾任中央黨校校長辦公室秘書的工農兵學員。在紐約一位朋友家，我會見過他，後來還一起參加一次夏令營活動。此人可能以為我知道他的底細，而撰文批他。《東方新聞報》的所謂投訴者估計就是此公或者他授意之人。後來，又有人斷言，《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一書的作者確是這位秘書。

在美國，某些人視我為中共間諜，可是在國內，又有某

「文革」御筆沉浮錄

「船遊」往事

些人對我持相反的看法，做着另外的文章。因此，家人戲稱我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7. 弘揚國寶

來美後，在進行史學研究、參與學術活動的同時，我也從事中華養生之道的教學和實踐。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為謀生計；另一方面，我也有志於將中華傳統文化這一瑰寶，身體力行，推向美國這片遼闊的大地。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養生之道，在保健和治療方面確有獨到之處，中西醫學應該互相融合，取長補短。

迄今，美國尚未正式認可中醫，但是，實際上中醫已逐漸為美國人接受，開始實踐。幾年前，哈佛大學一位學生寫了一篇博士論文，專門論述中醫在波士頓地區的沿革和現狀。據她介紹，現在該地區約有五百名中醫。與此同時，氣功亦漸漸地成為人們喜愛的養生之術。據報載，一九九五年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求助於非傳統的醫療方法，自掏腰包花了一百四十億美元。中醫和氣功即屬於非傳統醫療方法之列。

一九九一年初，經一位美國針灸醫師的推薦，我到新英格蘭中醫學院進修部授課，講授養生之道，頗受學生歡迎。

「文革」脚踏沉浮錄

「樂效」往事

校方繼又續聘，使我在該院的教學工作持續了兩年之久。我還應邀在一位美國醫生主持的醫療藝術中心工作過一段時間。此外，在塔夫茨大學醫學院、新英格蘭醫療中心、哈佛宗教系、東北大學健康中心、波士頓醫療藝術中心、戒煙戒酒中心、英泰爾費斯和布羅克蘭成人教育中心等單位，我均開設過有關中華養生之道的課程或講座。

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廣採各家之長，我匯編了五套功法：即經絡疏通功、五獸功、回春功、自我點穴推拿功和太極氣功，哈佛大學音像部為我製成錄像帶，受到學員們的廣泛歡迎。

一九九三年六月，《劍橋紀事報》記者對我進行採訪，同年七月八日，發表了題為〈東西方醫生的融合〉的長篇報導，並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我的大幅照片。波士頓地區的一些中文報刊，對我的教學也作過報導和評介。波士頓地區電視台第七頻道「亞洲焦點」節目主持人薛瑪麗小姐對我進行了專訪，該台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九日播出了這次專訪錄像。

多年實踐表明，使古老的中華傳統文化養生之道在大洋彼岸紮根並發揚光大，促進中美在這一領域的交流是一件值得倡導之舉。

「文革」抑華沉浮錄

「絕症」往事

8. 頻繁搬遷

到波士頓後，我多次搬家，居住條件逐步改善。初到時，我的學生朱彩霞熱情接待，為我在塔夫茨大學附近找到一個住處，約七平方米的小房間，每月只繳九十美元，相當便宜，可惜的是只能住六十天。兩個月後，我搬到了薩莫維爾市華盛頓街 386 號，這是一套二居室的住房，五位中國學者合住，其中有一位著名老作家的女兒夫婦，我與一名貴州省的訪問學者合住一室。每月房租一百五十美元。由於四、五人輪番煎炒烹煮，室內油煙瀰漫，又髒又亂，居住條件可想而知。

三個月後，我搬到劍橋市，與一位來自北大的訪問學者合住一套住房，每月房租一百六十美元。周一良先生訪哈佛時，曾在此與我們小聚。又過了三個月，我再次搬遷，這次住到了美國人的家裏。大約在一九九〇年初，我告訴一位哈佛的朋友，請他給我找個新住處，以提高英語口語能力和深入了解美國人的生活習俗。他給我介紹了幾位朋友，其中之一便是湯姆·埃諾。他是位牧師，略懂中文，曾在港、台工作，對我表示歡迎。他有一套兩層的小洋房，位於阿靈頓，環境優美。我住的是他家一間半地下室，二十平米，條件尚可。月房租一百美元，附帶條件是房東外出度假時，代為看

「文革」抑筆沉浮錄

「絕交」往事



作者八十年代末與周一良教授攝於美國哈佛大學東方藝術館。

家。他們家共四口人，夫婦二人和兩個兒子。大兒子在沙特阿拉伯當工程師，小兒子在大學讀書。我在此住了一年，相處比較融洽。這裏，冬季很冷，他們夫婦怕我着涼，特地修理門窗，增添電暖設備。剛來時，我不慎在樓梯上摔了一跤，次日，他們立即買橡皮墊釘上。湯姆夫婦還經常邀請我共進晚餐。有時，我也向他們露一手，顯示一下我的烹調技術，做些春卷招待他們。後來，我感到住在美國人家裏，對深入了解風土人情、生活習俗雖有幫助，但對語言水平的提

「文革」脚著沉浮錄

「絕版」往事

高，作用並不很大。因此，我決定另遷他處。

這次，我搬到劍橋市比紹普阿蘭街住了二年。五人合住一套公寓房，每人一間臥室，合用廚房和衛生間，每月房租約一百八十美元。此地離中心廣場很近，交通方便，但治安狀況較差，有時，我們可以從樓上窗口目睹攔路搶劫和警察逮捕毒犯的實況。據此，一九九二年九月，我搬到了劍橋市哈佛街 278 號。這是由二十平方米臥室和衛生間、廚房組成的一間套居室，單門獨戶，比之以往，居住條件明顯改善。此地治安情況較好，屬於好區。因此，一位三年，房租由三百美元漲到五百美元。

一九九五年，家人將來美探親，為此，我借助於銀行貸款，在劍橋市和薩莫維爾市交界處的比肯大街，買下一套二居室的公寓房，總面積約一百平方米，相當寬敞。由於居室位於八層，居高臨下，兩市的景色盡收眼底，令人心曠神怡，朋友來訪，均讚曰：「鳥槍換炮，今非昔比。」

來美後，大部分時間我住在波士頓，其間，亦曾赴美國其他城市作過短暫訪問。除多次赴紐約外，還曾應邀到羅德島州府所在地逗留數日，受到了韓素琴、洛費爾斯基和賈祖龍三位教授的盛情款待，訪問了布朗大學並到洛教授的島上別墅度周末。一九九〇年八月，我與一些中國學者一起赴首

「文革」御筆亂浮錄

「樂效」往事

都華盛頓旅遊一週，參觀了白宮、國會大廈、五角大樓和歷史博物館等等。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到名城舊金山遊覽一週，欣賞了太平洋海濱城市的秀麗風光，那裏的森林公園、大型動物園、規模宏大的中國城均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旅美期間，我曾到歐洲巴爾幹半島的阿爾巴尼亞，探望了我的夫人並進行了參觀訪問。在返美途中，我順訪了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和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到加拿大旅遊數日，觀看了尼加拉大瀑布，遊覽了多



作者與夫人顧懋萱九十年代在阿爾巴尼亞。

「文革」御筆沉浮錄

「繼效」往事

倫多市。一九九四年、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我曾三次返回北京探親數月。

一九九八年三月，當來美近十年之際，我作了一次大遷徙，從大西洋邊的波士頓，橫跨美國，搬到瀕臨太平洋的南加州。同年六月，遷入位於拉古那山莊著名的「休閑世界」。這裏氣候宜人，四季如春；綠樹成蔭，風景如畫；空氣清新，環境幽靜。堪稱理想的修身養性之地。

× × ×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同屆同學商定出一紀念文集，每人寫一短文，抒發人生感悟。應約欣然命筆，我作短詩一首〈生之旅〉：

營房、學府、會堂，
灰樓、鐵窗、異邦。
人生何謂幸運？
經風雨，百味嚐。



E042

中共開國將軍寫真——軍史檔案解密 吳東峰

軍人是一個獨特的族群。

中共開國將軍更是這個獨特殊族群中的一個異數。

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沒有受過正規軍事教育。他們的軍校就是戰場。他們是刀光劍影中出生入死、屢經磨礪而晉陞將階的。

他們是幸運的：作為職業軍人，可以為開國而戰；

他們又是不幸的：他們並不了解政治，卻又時常身不由己為政治而戰。

雙重戰爭不可避免扭曲了他們的人格。先天不足，註定了將軍們日後的悲劇。

當作者以忠於歷史真實的心態執筆時，我們有幸得以透過輝煌一窺背後的秘辛……

開國將軍——空前絕後的一個族群，值得好好欣賞。



E040

世紀末大預測——中國最新國情手冊 張西明

1999年，20世紀最後一年的中國將如何發展？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係等重大領域將有哪些變化？圍繞着這些變化帶來什麼機遇與挑戰？本書均一一作出全面分析和預測。

不僅對國企改革、金融證券、新聞出版、海峽兩岸關係以及中美、中日、中俄、東歐等對外關係的重大變化和未來走向進行了深入分析，而且圍繞信息產業、司法公正、機構改革、勞動就業、財政政策、環保與國家安全、反腐敗、打擊走私、房地產等最新重大國情變化，首次作出了全面的觀察和評價，對目前到今後一兩年內中國發展的重大脈絡，作了準確清晰的梳理和把握。



E041

歲月蒼蒼——我與兒子王丹 王凌雲

我兩次入獄期間，會一再告誡自己要堅強面對逆境，尤其是不要在公檢法人員面前流露出軟弱的表現。但兩次都沒有做到。而這兩次失態——在對方面前流淚——都是因為想到了母親。一次是一九九〇年春天，母親到北京市半步橋的公安局看守所看我，結束以後我在囚車上看到她拖着因坐牢而致殘的左腿在寒風中踽踽獨行的背影，淚水實在無法控制；另一次是一九九五年我第二次入獄，一次夜審中預審人員提到母親，我想起當年的十月是她六十歲生日，她曾表示多少慶賀一下，現在我不僅不能盡此孝道，反而又要拖累她，不禁潸然淚下。

——王丹



E038

跨世紀中國最新領導人手冊 華明

應社會各界需求，本社邀請國內著名青年學者領銜主編這本《跨世紀中國領導人手冊》，共收錄200多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最新資料，範圍涵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和各省/區、市黨政最高領導。

本手册資料詳盡、及時，具權威性；內文及目錄編排按主政者職能分類，指引明確，便於檢索查閱。

本手册可與《中國大陸領導人辭典》互為參照，前後補充，相得益彰。

郵購表格

編號	書名	定價HK \$	數量	合共
E042	中共開國將軍寫真 －軍史檔案解密（吳東峰）	84		
E041	歲月蒼蒼－我與兒子王丹（王凌雲）	68		
E040	世紀末大預測 －中國最新國情手冊（張西明等）	98		
E039	中國富代神話錄（楊魯軍）	88		
E038	跨世紀中國最新領導人手冊（華明）	84		
E037	第四座豐碑（彭明）	98		
海外郵費(平郵掛號/空郵掛號) \$				
				總額/港幣 \$

海外郵費：

1. 海外郵費由讀者負擔，請於郵購時註明郵運方式
2. 平郵郵費約為書定價：亞洲區兩成，亞洲區以外（包括日本）三成
3. 空郵郵費約為書定價：亞洲區四成，亞洲區以外（包括日本）五成
4. 每件海外郵件，須付掛號費 \$13，保障書籍安全送達

姓名：(中文)

(英文)

日間郵寄地址：

(中文正楷)

聯絡電話：

(日間)

傳真號碼：

付款方法：

- 附劃線支票（香港適用）
(抬頭請寫「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 信用卡付款（本港及海外適用）
 VISA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郵購請寄：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明報出版社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

傳真郵購：(852)2898 2646
只適用於信用卡付款

有效期至：

有效簽署：

(必須與信用卡上的簽名相同)

網上郵購：<http://www.mingpao.com/mpp/>

* 有關郵購價以出版社最新調整價為準

「梁效」文章一出，神州萬馬齊喑！

天下從此多事，舉國爭說爾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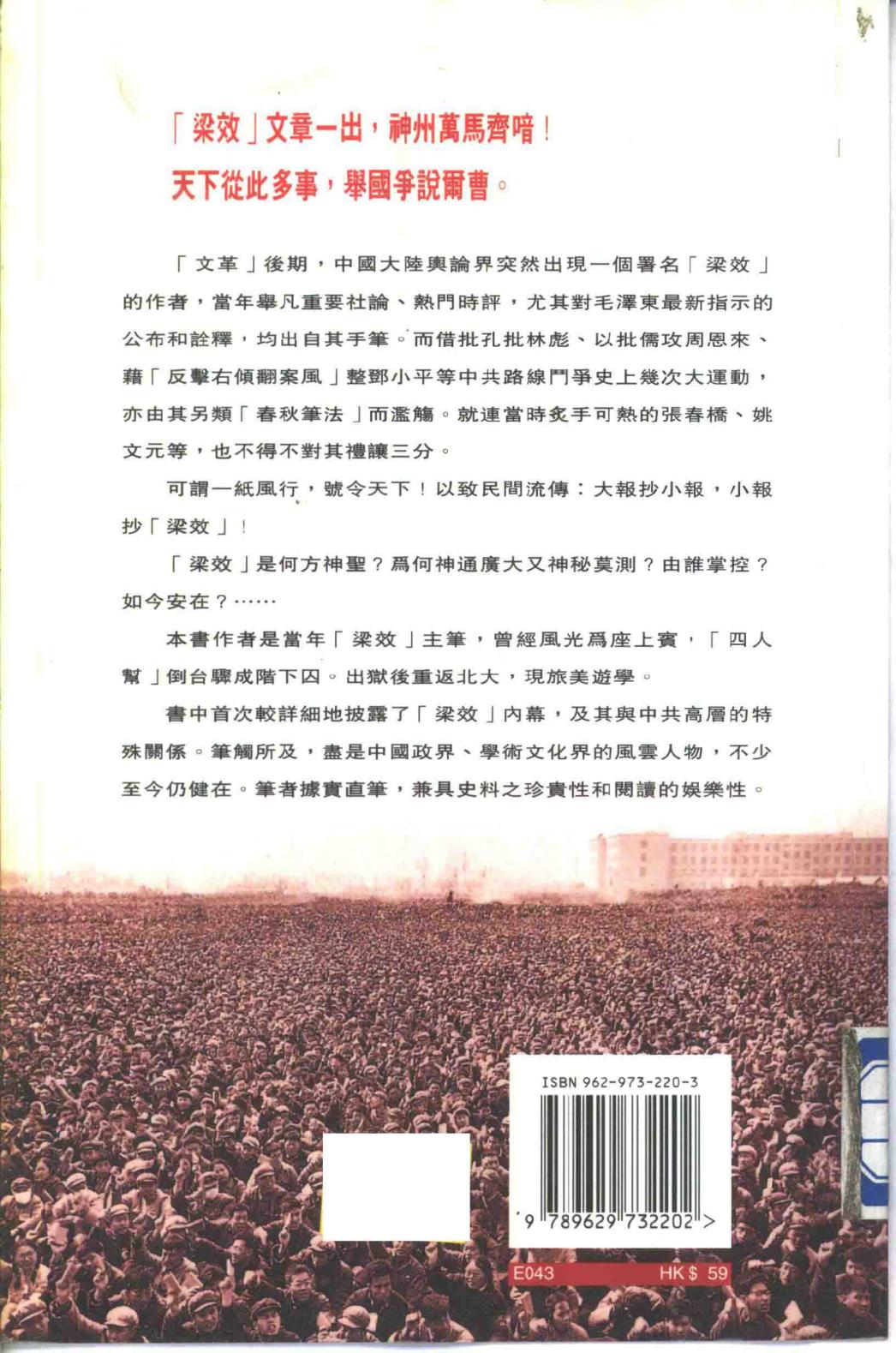
「文革」後期，中國大陸輿論界突然出現一個署名「梁效」的作者，當年舉凡重要社論、熱門時評，尤其對毛澤東最新指示的公布和詮釋，均出自其手筆。而借批孔批林彪、以批儒攻周恩來、藉「反擊右傾翻案風」整鄧小平等中共路線鬥爭史上幾次大運動，亦由其另類「春秋筆法」而濫觴。就連當時炙手可熱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也不得不對其禮讓三分。

可謂一紙風行，號令天下！以致民間流傳：大報抄小報，小報抄「梁效」！

「梁效」是何方神聖？為何神通廣大又神秘莫測？由誰掌控？如今安在？……

本書作者是當年「梁效」主筆，曾經風光為座上賓，「四人幫」倒台驟成階下囚。出獄後重返北大，現旅美遊學。

書中首次較詳細地披露了「梁效」內幕，及其與中共高層的特殊關係。筆觸所及，盡是中國政界、學術文化界的風雲人物，不少至今仍健在。筆者據實直筆，兼具史料之珍貴性和閱讀的娛樂性。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nse, grainy photograph of a massive crowd of people, many wearing hats and dark clothing, filling the foreground and middle ground. In the distance, a long, low building with multiple windows is visible under a clear sky.

ISBN 962-973-220-3



9 789629 73220 >

E043

HK \$ 59